

亞太研究論壇

21期



中央研究院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03年9月

台灣·台北

目 錄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一期

2003 年 9 月



專題研究：南韓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鞏固

- 韓國社會運動的動員模式與政治社會性格：以新興社會運動為分析對象 / 朴允哲 1
- 南韓民族主義對韓國民主化的影響 / 李南周 17
-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Political Change of South Korea / 曹喜昫 28
- Labor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Korea: Gains and Losses / 李允卿 43



研究論文

- 十八世紀華人海外移民活動的一些特質 / 孔復禮 64



新生代研究

- 多元族群國家原教旨主義政黨理念之探討 - 以馬來西亞伊斯蘭黨為例 / 陳中和 69



東南亞政經大事記 (1900-2000)

- 新加坡 101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辦公室報導 119



會議報導

- 「亞太中產階級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 123
- 「馬來世界的宗教與文化：衝突？融合？」研討會 125

2003 年 10 ~ 12 月亞太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	126
-----------------------------------	-----

Contents



Asia-Pacific Forum No.21

Sept. 2003



Special Issue: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 Korea

<i>The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and Soci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South Korea</i> By Yoon-Chul Park.....	1
<i>The Effect of Nationalism on Democratization in Korea</i> By Nam-Ju Lee	17
<i>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Political Change of South Korea</i> By Hee-Yeon Cho	28
<i>Labor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Korea: Gains and Losses</i> By Yoon-Kyung Lee.....	43



Research Papers

<i>Chinese Social Experience Adaptable to Emigration</i> By Philip A. Kuhn	64
---	----



Research of the New Generation Researchers

<i>Religious Fundamentalist Party in a Multiethnic Country: A Review of Pan Malaysia Islamic Party (PAS) and its Political Ideal</i> By Chong-Foh Chin.....	69
--	----



Chronology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1900-2000)

<i>Singapore</i>	101
------------------------	-----



News from CAPAS Office..... 119



Conference Calendar

<i>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rioritizing the Middle Class Research in Asia-Pacific” (Oct. 31 – Nov. 1, 2003)</i>	123
<i>Symposium on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the Malay World”(Nov. 12, 2003)</i>	125
<i>Oct. ~ Dec. 2003 Calendar of Conferences and Meetings on Asia-Pacific Studies</i>	126

韓國社會運動的動員模式與政治社會性格： 以新興社會運動為分析對象*

朴允哲

韓國湖西大學中國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在韓國民間社會透過由下而上的民眾¹性民主化運動推翻專制的軍人政府以後，新成立的「金泳三」文人政府保障程序上的民主主義，提供了合法及和平的社會運動空間。從而韓國人民逐漸認識到暴力性社會運動手段的非民主性，要求社會運動採取合法及和平的運動手段。另外，文人政府採用「論述霸權（discourse hegemony）」的策略來控制或操作民間社會。但傳統的民眾運動因其運動策略的單純性格而再也不能有效地應付國家的新型支配策略。

另一方面，隨著民主主義的制度化，與後期工業化及經濟全球化的進展，在民主化的大旗之下，被壓抑的各種不同階級利益如洪水般爆發出來了，同時超越階級關係的市民權也成為社會的主要議題。換言之，社會衝突的形式已不是獨裁及民主或資本及勞動階級之間鬥爭的單線模式，而其形式已展現出相當泛層結構化（overstructured）的特徵。

在這種社會環境的變遷下，韓國民間社會為取代傳統的民眾運動並呼應新的需求而極力推動新興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因此，新興社會運動為將自己和傳統民眾運動區隔開來，而採取合法及和平的運動手段。然而，新興社會運動因為深受民眾性民主化運動的傳統影響，所以也呈現出不少民眾運動的特徵。這種複雜的性格使它有別於西方的新社會運動。西方的新社會運動是為了克服西方舊社會運動的制度化抗爭模式所遇到的困境，常採取相當激烈的抗爭手段（Offe, 1985）。

本文在上述的問題意識下，分析如下三個問題。第一，韓國新興社會運動如何不同於其舊社會運動—民眾性民主化運動，又區別於西方的新興社會運動。第二，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為何在運動手段、改革目標、及對象的選擇上，呈現出使它區別於其他社會運動的特徵。第三，韓國新興社會運動如果在動員策略與政治社會性格上確實相當不同於其他社會運動，就到底何種歷史及社會結構的條件，塑造或導致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的獨特性格。

二、韓國民間社會形成的歷史軌跡

韓國民間社會一如台灣等其他東亞國家，深受儒家的文化傳統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衝擊。但在民間社會的發展軌跡上卻呈現出相當不同的歷史經驗。韓國民間社會在很久以前就

* 此論文曾發表於「台灣與南韓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鞏固」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3年7月23日。

¹ 民眾一詞涵蓋著多重意義。首先，民眾基本上由勞工、農民、學生以及進步取向的中產階級所構成，它在威權體制下被排斥在政治過程外。其次，在意識型態上民眾保持著抗爭現有支配體制的集體歷史意識。以民眾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便是民眾運動。

醞釀或形成抗爭的社會文化傳統，從而在近代歷史過程中，可以持續抵抗國家的威權支配體制。尤其，在 1970、1980 年代的壓迫性威權國家體制下，韓國民間社會展現出令人佩服的抗爭運動與抵抗精神。這種民間社會的歷史傳統繼續延續到民主化以後的韓國民間社會。因此，1990 年代的韓國社會運動仍或多或少受到傳統的影響。

(一) 國家與民間社會的關係

從朝鮮時代以來，韓國社會即使在中央集權的國家支配體制下，民間性抗爭運動仍相當活躍。這種抗爭運動的傳統為日後民間社會的形成或擴張，提供了有效的社會資源。因此，在七、八十年代的壓迫性軍事政府時代，韓國民間社會不但沒有停留在 Gramsci (1971) 所說的「被動革命 (passive revolution)」的狀態，反而持續累積社會的抗爭力量，以創造自主及獨立的民間社會。

韓國從幾千年前起，維持了中央集權的國家支配體系。在這種強而有力的國家體系下，民間社會早就多少經驗到對體制的抗爭運動，並累積了抗爭經驗與力量。尤其，從十九世紀末以後，民眾為改革或推翻根深蒂固的身份(階級)制度，陸續起義。這種起義經過「洪景來之亂(1811年)」與「晉洲民亂(1862年)」，及至「東學革命(1894年)」達到了顛峰。東學革命明確地主張政治及社會的改革，同時是典型的由下而上的革命。它雖然是失敗的農民革命，但其意義不容忽視。在它提出來的 12 條要求中，一半都是關於廢止身份(階級)制度的。它的確已為近代社會關係的確立鋪路。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之間，在韓國社會出現了市民權的要求。「獨立協會」與「萬民共同會」等社會組織公開主張保障集會、結社以及言論自由，實施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確立地方自治制度，這些都呈現出市民民主主義的理想(慎鏞廈，1994)。

在日據時代，殖民政府利用軍隊與警察等暴力手段，徹底監控韓國民間社會，所以很不容易喚醒民眾的政治社會意識或者凝聚集體力量。雖然如此，但民間社會持續推動「3.1 獨立運動(1919年)」、「6.10 萬歲運動(1929年)」、「光州學生運動(1929年)」、1920 年代的「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²以及 1930 年代以後的「國外抗日運動」，以抵抗日本的殖民體制。這種抗爭的歷史經驗累積成為日後民間社會抗爭傳統的基礎。

在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告終之後，隨即出現廣泛的民眾的政治參與，在民間社會成立了無數的社會團體與眾多的政黨。其中，「朝鮮勞工全國評議會」與「朝鮮建國籌備委員會」更廣設地方支部。³另一方面，在民間社會中形成所謂的民主公共領域，以公開討論未來的政體、南韓單獨政府的建立、土地改革、歷史清算以及美蘇的信託統治等國家大事。

在 1948 年「李承晚」政府成立以後，雖維持了威權主義的強制性統治體制，但 1949 年在「濟州島」與「麗水、順天」兩個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起義。1960 年學生所領導的「四月革命」完全推翻了李承晚的獨裁政府，重新恢復了雖然短暫、但非常開放且自主的公共討論的場域。然而，這種自主的公共領域因「朴正熙」的軍事政變而被消滅了。

在 1960 到 1970 年代，朴正熙的軍事政府動員軍隊、警察以及情治單位嚴密地監控民間社會，同時事前封鎖集體力量的凝聚。然而在這種壓迫性支配體制下，學生與知識份子所領導的抗爭運動仍陸續出現在民間社會中。例如，「韓日建交會談反對運動(1964年)」、「總統

² 依邊太燮(1982: 415)的研究而言，從 1921 到 1931 年之間總共發生了 1,080 件的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糾紛，其參加人數達到了 37,541 人。另外，發生了 540 件的勞資糾紛，其參與的勞工人數高達 47,858 人。

³ 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在 1946 年具有了 235 個支部與 1,680 個支會。另外，朝鮮建國籌備委員會在 1945 年率領了 145 個支部。

三任修憲反對運動（1969年）」以及不少勞工運動等。到了1972年，朴正熙政權透過修憲建立了所謂的「維新體制」。⁴因維新體制的成立而增加了國家的暴力性，但民間社會的抗爭力量未完全被消滅。學生、知識份子、勞工以及教會之間形成了較鬆散的民主聯盟⁵（鄭哲熙，2003：129；趙大燁，1999：127-30）。另外，在野黨也參與了這個民主聯盟，從而構築了相當有組織動員的力量。民間社會在其鬆散的聯盟策略下，持續推動了「學生運動」、「知識份子的學術批判運動」、「言論運動」、「宗教運動」以及「勞工運動」。到了維新體制末期（1979年），終於發生「YH貿易工會的經濟及政治鬥爭」與「釜山、馬山的大規模民眾抗爭」，使朴正熙的維新體制垮台，並又恢復了極為短暫的民主時代，也就是「漢城之春」。

然而，軍事強人「全斗煥」透過軍事政變掌握了政權。1980年為了反對全斗煥的軍事政府，在光州發生了全市規模的民眾抗爭（「光州民主抗爭運動」）。1980年代初，民主抗爭運動因國家的暴力鎮壓而進入了低潮，但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民間社會又推進了「學生運動」、「反美示威」以及「在野運動」等。1987年6月，學生、在野人士、勞工以及在野黨發動全國性的民主化運動（「六月抗爭」）。在六月抗爭中，連新中產階級也大量參加示威。此全民性的民眾運動終於推翻了長達三十年的軍事政府，揭開民主時代的序幕。

（二）抗爭運動的社會基礎

韓國的民間社會在威權支配體制下如何持續動員，以不斷地進行民主化運動呢？韓國的民間社會從朝鮮時代末期以降，不間斷地培育及保持社會基層的運動能量。尤其，1970、1980年代大量出現了「抗爭取向的小集團」。這種小集團一方面發展抗爭意識型態，另一方面透過小集團之間的聯盟來推動抗爭運動（McAdam，1988；鄭哲熙，2003：93-96）。其代表性的組織就是大學與教會內的自願性結社團體。這種大學與教會內的非正式組織，相對而言，容易擺脫國家的直接監控，所以較能透過意識教育等方式將新進成員訓練成社會運動的領導份子，以持續擴大運動空間。進而，將其透過意識教育訓練出來的運動領導人，持續供應給在野、勞工以及農民等其他運動部門。⁶大學的小集團⁷以「三民理念」（民族、民主、民眾）為抗爭意識型態，挑戰支配意識型態，並支持社會的弱勢階級，以期改變現有的社會不平等體制。教會的小集團以「解放神學」為理念，改善社會的不平等結構，並保護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的弱勢者。

另一方面，這種小集團之間持續建立抗爭運動的聯結網絡，以增加力量，並形成社會運動力量的下層結構。到了特定時期，它們吸收社會的其他勢力，以發展成有規模的社會運動組織。這種社會運動組織直接動員小集團或操作小集團的聯結網絡，再擴張其運動力量。另外，它們扮演兩個重要角色。一方面，聯結小集團，以整合並動員小集團的運動力量。另一方面，創造不同的小集團所能接受的抗爭意識型態，以引導小集團的文化整合（鄭哲熙，2003：121）。

韓國民間社會的抗爭傳統與民眾性民主化運動的社會動員基礎，仍或多或少延續到民主化以後的新興社會運動。因此，新興社會運動雖然是為取代民眾性社會運動而出現的，但仍

⁴ 維新體制相當類似於拉丁美洲的「官僚—威權體制（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軍人、官僚以及資本案形成一個支配聯盟，而扼殺了民眾部門。

⁵ 當時韓國社會將這種民主聯盟（學生除外）命名為「在野」。這意味著支配體制以外的所謂反對勢力，相當類似於台灣的「黨外」。

⁶ 在1980年代，不少學生領導人以假名隱瞞身份，進入工廠領導勞工運動。

⁷ 大學的小集團並不是從現有的正式學生組織中發展出來的。學生自發地組織地下的或非正式的極小規模的團體，也就是非正式的學習組（study group）與社團等，從此逐漸發展成體系化的學生運動組織。

呈現出政治、全民以及運動取向的社會運動模式。

三、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的結構與運作方式

(一) 組織的結構特徵

韓國的新社會運動組織可以分成「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與「特殊專業性社會運動團體」(曹喜昞, 1989)。屬於前者的是「經濟正義實踐市民聯合(Citizen's Coalition for Economic Justice)」(以下簡稱「經實聯」)、「參與連帶(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YMCA」等。屬於後者的是「環境運動聯合(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綠色聯合(Green Korea United)」、「韓國女性團體聯合(Korea Women's Associations United)」,以及其他小規模的團體。但後者常常超越自己的運動目標,積極參與「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所發起的社會運動。因此,韓國社會運動可以說是由綜合性社會運動組織所主導。

「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呈現出如下三個主要特徵。其一是,「財團式」的組織結構。其二是,「百貨公司式」的經營型態。⁸其三是,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式的組織文化。這種特徵相當類似於國家機關或政黨機構。換言之,「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套用國家或政黨的組織安排,如國家或政黨般都介入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等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兩大「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的組織安排來推論這種組織的特徵。例如,「經實聯」成立僅僅5年之內,其會員已達到12,000人,並成立了27個地方組織。另外,其中央組織的專職聘僱職員已超過了70餘人。到了2001年,在中央組織中除秘書處及企劃處等常態機構外,另設了10個協議會及委員會、5個獨立運作的機構以及4個附設機構,⁹同時其地方組織增加到35個。另外,「參與連帶」在剛成立時,其會員只不過是200餘人,但2001年已增加到13,638人了。其組織規模也相當龐大,除基本機構外,有9個獨立的活動機構與5個附設機關。¹⁰

另一方面,在韓國有最影響力的「特殊專業性社會運動團體」,如「環境運動聯合」、「綠色聯合」以及「女聯」等的團體雖通常將其運動力量集中於特殊專業性的目標上,所以相對不需要龐大的組織結構。但其組織結構仍然非常龐大,而且是中央集權式的。其實,它們在熱門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議題上常常與其他綜合性社會運動組織進行聯盟運動。在此,我們觀察一下「環境運動聯合」的組織規模與結構。在1993年4月僅僅由全國8個主要環境組織聯合成立的「環境運動聯合」已發展成亞洲最大的環境團體。其會員數已超過8萬人,其地方組織也擴增到47個,而且除基本組織外,還設了5個專業性機構。¹¹

這種「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與一部份的「特殊專業性社會運動團體」所呈現的結構特徵是由以下兩個社會條件所造成的。第一,為應付或對抗極為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¹²極需具

⁸ 其特徵很類似韓國「大企業財團」(Chaebol)。韓國大企業不是專門經營特定行業而發展的,而是無限制地將其經營領域擴大到有利可圖的其他行業。從而其組織變成一個大財團型態。

⁹ 「經實聯」的主要附設機構如下:社團法人經濟正義研究所、社團法人經實聯統一協會、社團法人經實聯都市改革中心、貪污腐敗驅逐運動本部以及月刊經實聯等。可參考網址; www.ccej.or.kr

¹⁰ 「參與連帶」的附設機構如下:乾淨社會建設本部、司法及立法院監督中心、納稅人運動本部、小權力恢復運動本部、市民科學中心、參與社會研究所、參與社會 Academy、公益法中心以及月刊參與社會等。可參考網址; www.peoplepower21.org

¹¹ 市民環境研究所、市民環境資訊中心、公益環境法律中心、環境教育中心以及能源替代中心等。可參考網址: www.ktem.or.kr

¹² 韓國除1950年代極為短暫的時期外,幾乎都未施行「地方自治制度」。所以韓國的社會問題無論其內

有綜合力量的社會運動組織。第二，韓國的政黨因其地域化、私有化以及封閉化的性格，而無法反映或處理民間社會的需求。在此，韓國民間社會有必要成立具有政黨功能的社會運動組織。

然而，綜合性社會運動組織所具有的巨大組織型態難免產生寡頭（oligarchy）的支配結構，所以會阻撓成員的踴躍參與。因此，這種組織在重要決策上無法反映由下而上的意見。其實，主要社會運動組織幾乎都為少數專業知識份子所壟斷，從而造成「市民沒有參與的社會運動」，並可能淪為缺乏草根性的官僚組織。

（二）運動目標、對象及手段

進入 1990 年代以後，隨著民間社會內部的社會階級或階層分化，不容易推進激進及單一的改革運動，所以 1970、1980 年代積極參加學生及在野運動等民眾性民主化運動的知識份子，都轉移到新社會運動的領域。但他們因深受民主化運動時代的政治社會觀念的影響，仍希望透過政治改革來達成社會的民主化。因此，主要社會運動組織有不少仍沿襲著民主化運動時期的運動目標與運動模式。

1. 運動目標與議題

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基本上提出兩項運動目標。其一，如西方新社會運動般強調去中心化與生活世界的主題。其二，仍關懷社會正義、民主以及社會公平等問題，但它們並不只瞄準國家機器，而是致力於約束市場力量，以期達成公平的社會。

主導韓國社會運動的「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幾乎都參與社會上主要議題的討論。觀察兩大主要「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也就是「經實聯」與「參與連帶」，使我們瞭解新興社會運動的基本目標是如何。「經實聯」提出如下六個基本目標：公平社會、乾淨政治及地方自治、自然與人類共存的健康社會、無腐敗的乾淨社會、保護弱勢者及團體、以及與全人類化為一體的社會。「參與連帶」公開主張透過市民的自發性參與和實踐，來推動監督與牽制國家及市場權力的社會運動。因此，「參與連帶」提出了如下強調市民參與的四大活動方向：市民參與、市民連帶、市民監督以及市民提案。

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所提出的議題的確是無所不包。新興社會運動的各個組織不論其組織固有的目標如何，只要它們認為某種議題會吸引多數人民的呼應，就將它納入成為自己的議題。因此，主要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在議題上重疊性很高，有時我們如果光看它們提出的議題，是無法辨識出此議題屬於哪一個新興社會運動組織。

根據表一，綜合性社會運動組織的議題幾乎包攬社會各領域的主要問題。從國家與市場問題到環境等生活世界問題，它們都要干預或仲裁，連國家統一的問題也要關照。不過，特殊專業性社會運動組織，例如「環境運動聯合」，在運動議題上呈現出與綜合性社會運動組織不同的面貌。其議題較集中於環境問題上，但它也提出一些政治性訴求。另外，它以聯盟運動的方式參與不少熱門的社會議題。

表一 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的主要議題（1998年—1999年）

運動組織別	運動主題或訴求	
	政治性	社會經濟性
經實聯	政治制度的改革 撤換高級公職人員 政府資訊的公開 政府機構及預算監督 反對提名及落選 ¹³ 特別檢察官制度 統一問題	金融結構改革 公平課稅 反對財團的不公平交易 改善財團的所有結構 租賃者保護 發票發收 反對廢止電影配額制度 反對建設水庫 反對開墾工程
參與連帶	政治制度的改革 反腐敗法案 撤換高級公職人員 政府資訊的公開 政府機構及預算監督 反對提名及落選 特別檢察官制度	金融結構改革 公平課稅 反對財團的不公平交易 改善財團的所有結構 小股東保護運動 集中投票制 發票發收 反對廢止電影配額制度 反對建設水庫 反對開墾工程
環境聯合	撤換高級公職人員 特別檢察官制度 廢除警察特殊隊 反腐敗法案	反核運動 反對建設水庫 反對建設滑雪及高爾夫球場 反對開墾工程 水質保護 野生動物保護 都市綠地保護 national trust 運動 國民年金 財團監督
聯盟運動	政府機關及預算監督 撤換高級公職人員 反對國家安全法 反對同胞歧視法案 反對提名及落選	垃圾問題 保護綠色帶 反對生命複製 新聞界改革 支持醫藥分工

資料來源：筆者的調查資料。¹⁴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的準政黨功能。在表一中所列出的議題，特別是政治性議題，大部分都是應為政黨所推動的議題。但韓國的政黨因其先天性的限制¹⁵而無法扮

¹³ 此運動指，先反對政黨提名某些候選人，但若那些人仍被提名，就再對那些人進行落選運動。

¹⁴ 本文的實證資料來自政權輪替後兩年的期間（1998年2月至2000年1月），關於「經實聯」「參與連帶」以及「環境運動聯合」等三大社會運動團體所發起的社會運動之報導。這些報導取自三大全國性報紙（朝鮮日報、中央日報以及東亞日報）。首先在這些報導中抽出中央組織所主導的，然後把三大報紙對同一活動或事件報導的內容加以彙整、綜合、核對並歸檔，建立了248筆的新聞稿檔案。

¹⁵ 韓國的政黨都是由一個強人所支配的，所以其組織結構與運作方式都是由上而下的。其次，韓國的政黨都無法擺脫地域性的支持及動員基礎。因此，它們根本無能力為社會問題發揮抒解與調整的功能。

演進民主政黨的角色，在政策提出、社會問題的調整、與對國家機構的監督等諸問題上，根本沒有發揮著政黨應有的功能。因此，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為彌補這些空缺，自然而然地代替政黨扮演了準政黨的角色（朴炯俊，2001：195），所以呈現出過度政治化的取向。

另外，在議題上雖然出現有關國家統一的議題，但三大新興社會運動組織都不把它視為優先考慮的主題。在韓國社會裡，國家統一的議題基本上是燙手山芋，同時是激進的民眾運動所選擇的議題。依新興社會運動所採取的輿論化策略來看，國家統一的議題不容易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因此，它們將此議題擺在後面，這意味著其議題的選擇依社會輿論化的程度而定。

2. 運動的改革對象

1990 年代之前，韓國的社會運動，也就是傳統民眾運動，不論何事都直接瞄準國家機器為抗爭對象。但新興社會運動除政治權力的民主化外，又擔憂著資本勢力對經濟的壟斷，又關懷著後期工業社會所導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韓國社會，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市場勢力逐漸壟斷整個經濟領域並滲透到人民的生活世界，進而利用經濟力量來試圖控制政治權力。因此，新興社會運動除國家權力外，還選擇以財團為主的市場勢力為抗爭對象。例如，財團所有結構的改善，企業管理的專業化及透明化，公司外部董事制度，小額股民運動以及集中投票制等，都是抗衡或約束財團的運動。另外，一些與環境或生活有關的運動也表現出它們對生活世界的關心。

依表二，社會運動組織在改革對象上明確地呈現出與傳統民眾運動不同的面貌。傳統民眾運動除勞工運動外，都不直接攻擊市場勢力。儘管社會運動組織也將國家視為主要抗爭對象，所以其仍保持著相當政治取向的運動性格，但它們將市場勢力（財團）當成另一個主要抗爭對象，並且其運動目標也與勞工運動相當不同。在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的案件中約三成以市場勢力為抗爭對象。¹⁶由此可知，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很擔憂資本主義市場勢力對經濟及政治的壟斷與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表二 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的改革對象

(%)

新興社會運動組織		改革對象			
		國家	市場	其他	合計
經實聯	1998	30 (86)	5 (14)	0 (0)	35
	1999	27 (66)	13 (32)	1 (2)	41
參與連帶	1998	26 (63)	15 (37)	0 (0)	41
	1999	37 (63)	21 (36)	1 (2)	59
環境聯合	1998	12 (75)	4 (25)	0 (0)	16
	1999	28 (88)	3 (9)	1 (3)	32
聯盟運動	1998	5 (100)	0 (0)	0 (0)	5
	1999	15 (79)	2 (11)	2 (11)	19
總計		180 (73)	63 (25)	5 (2)	248 (100)

資料來源：筆者的調查資料。

¹⁶ 在表三中，雖明確地區分抗爭對象，但其實在不少議題上，國家與市場兩者都有一定的關係。所以不容易區別特定的抗爭對象，兩者都成為抗爭對象。

3. 運動手段

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在其手段的運用上與傳統社會運動截然不同。它們首先利用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搶先引發社會對該議題的關注，然後通常採取制度化的運動手段來貫徹其運動的目標。新興社會運動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專業知識份子，所以他們在論述領域中可以製造出抗爭意識型態，以利用輿論來牽制國家權力與市場勢力。因此，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在抗爭策略上，為獲得輿論的支持而使用溫和及制度化的手段，即聲明、記者會、發表會、公聽會、討論會、宣傳活動、調查、監督、請願、告發告訴、訴訟以及仲裁等手段來喚醒輿論。這種策略較適合民主化以後多數人民的期待。換言之，隨著民主化的進展，韓國人民逐漸傾向於接受嚴格遵守民主主義程序的社會運動，同時排斥激進或非法的運動手段。

表三 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的運動手段（1998-1999年）

單位：次數（%）

		經實聯		參與連帶		環境聯合		聯盟運動		
		98	99	98	99	98	99	98	99	
手段的制度化程度	制度化 (溫和)	聲明	18	18	9	20	5	12	0	4
		記者會	2	7	4	12	1	2	0	2
		發表會	0	5	3	3	1	2	0	0
		公聽會	0	0	0	0	0	0	0	0
		討論會	1	0	0	1	0	2	0	0
		宣傳活動	2	1	4	2	4	2	1	0
		調查	1	5	1	2	2	8	0	2
		監督	0	1	2	2	0	0	0	4
		請願及請求	5	4	3	4	0	0	0	0
		告發、告訴	1	1	5	3	3	1	0	0
		訴訟	4	2	5	8	0	1	0	1
		憲法訴願	2	0	4	1	0	0	0	3
		仲裁	0	0	0	1	0	0	0	0
		小計	80 (95)		99 (93)		46 (94)		17 (59)	
		非制度化 (激烈)	署名	0	1	0	0	0	0	0
不服從	0		0	0	0	0	0	0	1	
怠工	0		0	0	0	0	0	0	0	
集會或示威	1		2	2	5	0	3	4	4	
絕食	0		0	0	0	0	0	0	0	
圍堵	0		0	0	0	0	0	0	0	
暴力	0		0	0	0	0	0	0	0	
小計	4 (5)		7 (7)		3 (6)		12 (41)			
合計	84 (100)		106 (100)		49 (100)		29 (100)			

資料來源：筆者的調查資料。

依照表三，新興社會運動組織所採取的運動手段大多數是較溫和的制度化手段，極少使用激烈的非制度化的手段來與抗爭對象對抗，而且，根本未使用過最激烈的絕食、圍堵以及暴力等的手段。三大組織在運動手段上呈現出比西方新興社會運動組織還要溫和的態度。

三大組織在其所採取的手段上，的確一面倒地傾向於較溫和的制度化手段。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為突顯出與傳統民眾運動的差異，而有意通過論述（discourse）競爭來達成其運動目標。¹⁷此時，制度化的運動手段較有效地發揮作用，這是因為制度化的手段才為論述競爭提供有效的空間。但這種手段為吸引多數人民的支持而需要新聞媒體的正面報導。同時，新聞媒體也因自己的需要¹⁸而支持新興社會運動。由此，在韓國新興社會運動所採取的論述競爭或輿論化的策略上，其與新聞媒體之間的默契成為最有效的運動手段。

另外，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基本上是議題中心的社會運動。所以它們必須有效地應付頻繁、且同時出現的許多議題。制度化的手段才可以為同時發生的各種議題發揮適當且有效的作用。

最後，1990年代末期以後，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在遇到較急迫但可以號召全民支持的議題時，為結合所有社會運動組織的力量而常採取聯盟運動模式。以聯盟的方式推動的社會運動，雖然其議題大多數具有急迫性與全民性，但其運動對象總是保持著不妥協或頑固的態度。因此，聯盟運動則常常採取較激烈的署名、集會、及示威等手段來強烈地向抗爭對象施壓。

四、動員策略與聯盟模式

韓國新興社會運動在動員策略上呈現出幾項有趣的特徵。新興社會運動與文人政府及新聞媒體之間顯露出相當強烈的選擇性親近（elective affinity）。另外，為動員資源而同時採取新型策略（資源動員的市場化）與舊型策略（聯盟模式）。

（一）新興社會運動與新聞媒體的共生

¹⁷ 依金浩起（2001：79-80）的研究而言，最近新興社會運動與舊社會運動（傳統民眾性運動）之間，在運動手段上的確呈現出一些差距。舊社會運動相對傾向於採用集會及示威，與聲明及署名等激烈手段。依下面的表四而言，新舊社會運動之間未展現出那麼顯著的差異。其原因可能是，進入1990年代以後，舊社會運動也為獲得輿論的支持而盡量放棄原有的激烈抗爭方式。但激進的運動手段在新舊社會運動之間會有質量上的差別。舊社會運動的激烈手段會顯露出相對非法及暴力的傾向。

表四 新舊社會運動方式的比較

	婦女運動	環境運動	人權運動	社會福利運動	舊社會運動
討論會	8.3	13.5	5.1	20.1	7.6
集會及示威	10.4	10.2	8.4	8.7	13.0
聲明及署名	9.2	11.2	9.4	15.4	22.6
報紙及雜誌發行	14.9	8.9	27.9	18.0	11.8
會員教育	30.2	7.5	16.6	24.1	14.8

資料來源：金浩起（2001：80）。

¹⁸ 可參考下節的討論。

韓國的新興社會組織在其社會動員的方式上展現出另一種特徵。民眾運動組織以階級利益或民眾利益為號召，動員群眾來與國家機器或資本勢力抗爭。相對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極少動員群眾，通常利用新聞媒體來喚醒人民，以形成輿論施壓抗爭對象。

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基本上都有其原有的設立目的。譬如，「經實聯」與「參與連帶」在設立目的中，除牽制國家機器外，還強調必須約束市場勢力的蠻橫、扶持弱勢團體以及建設自然與人類共存的健康社會等，從而顯露出新興社會運動的基本性格。但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不論其原來的設立目的如何，都願意介入社會上的所有重要議題。於是如上節所述，不少組織都變成如「百貨公司」般無所不包的運動組織。因此，它們不得不對傳統民主化的議題發言。但其運動手段並不是傳統的大眾動員的抗爭方式，而是通過論述競爭而動員不特定的多數人民。所以在其策略上，需要搶先提出吸引多數人民關心之議題。為此，新興社會運動組織需要積極拉攏新聞媒體，以利用它們來宣傳其運動的宗旨與目標。

另一方面，自 1990 年代以來，隨著民主化的進展，新聞媒體的地位與其對社會的影響力迅速增大，進而在輿論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著主導角色。然而，韓國的主流新聞媒體遇到了一個困境。具體而言，它們都承認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同時支持民主改革運動，以包裝自己為改革的引導者。但因為它們在意識型態上都仍保持著相對的保守主義性格，所以它們無法繼續支持激進的民眾性社會運動，在支持對象的選擇上呈現出一種偏向性。就是說，韓國的主要新聞媒體因自己相對保守的性格不支持激進的民眾運動，但支持與鼓勵溫和改革取向的新興社會運動。

無論如何，新興社會運動組織與新聞媒體之間，的確因兩者的需要而保持著相當程度的默契與合作。實際上，新聞媒體有時故意忽略或大題小作民眾運動組織的主要活動，但是，主要新興社會運動的小動作卻成為媒體的報導焦點。因此，基於論述競爭的議題中心運動較容易利用新聞媒體達成其輿論化的目標。然而，這種策略或運動模式使新興社會運動的組織逐漸專業化，以致於喪失社會運動原有的草根性或戰鬥性。

（二）新興社會運動與國家的交換關係

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在與國家的關係上仍沒有完全脫離傳統民主化運動的模式，它基本上仍將其主要抗爭或交涉的對象視為國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韓國國家機器雖逐漸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但仍掌握著中央集權的政治權力；其二是新興社會運動領導人的社會背景，因為其領導人大多數都來自傳統民主化運動組織。另一方面，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一個重要因素是國家對社會運動的分割支配（divide and rule）策略。國家為了使激進的民眾或勞工運動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有意識地一方面壓抑激進的民眾運動，另一方面助長甚至支持新興社會運動介入政治社會的諸多問題。這三種原因會使新興社會運動透過與國家的直接互動而實現其運動目標。

新興社會運動雖將國家視為其主要的運動對象，但它並不是將國家視為直接敵對的對象，而是視為互相交涉或合作的對象。這種策略會使它迴避與國家的直接衝突，同時確保自主性的空間。換言之，此策略為它提供了更廣闊的政治機會。其介入的模式主要是：先批判國家的政策或監督國家機構的政策推行，再提出替代性政策。此模式使新興社會運動扮演著仲介的角色。這種仲介角色有二種型態：其一是將民間社會的政治訴求反映到國家；其二是國家通過新興社會運動組織抒解民間社會的複雜衝突，並間接控制民間社會（朴炯俊，2001：194）。另一方面，國家在有限的範圍內將社會運動組織的議題與要求制度化，以確保其統治的正當性。此外，國家時而利用新興社會運動的力量來約束或牽制日益茁壯的市場權力。因

此，在國家與社會運動組織之間形成一個密切的交互網絡。由此可知，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的確展現出 Tilly (1978) 所言的政體成員型 (polity member type) 的特徵。

例如，金大中政府因為願意與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繼續維持在野黨時期的合作關係，同時需要彌補其政權的結構性限制，也就是地域情緒所導致的支持基礎的片面性，¹⁹所以它將新興社會運動組織視為政治上的戰略性資源。另外，它也察覺到新興社會運動組織會變成可以間接支配與控制民間社會的有效管道。因此，在金大中政府的初期時，提拔很多新興社會運動的領導人擔任政府或總統秘書室的重要職務，從而政府與新興社會運動組織之間形成了固定的溝通及合作的管道。另外，政府依據「市民團體支援法」將相當數目的基金分派給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經實聯」與「參與連帶」等兩大新興社會運動組織以保持政治中立的理由拒收政府支援基金。但它們仍以研究及調查計畫等型式領收相當數目的政府基金。在這種政府的安排下，一些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在金大中政府初期的一段時間中傳送定期性的建議報告（朝鮮日報，1998.11.10），以表明公開支持改革取向的金大中政府。

在上述的條件之下，溫和改革取向的金大中政府與新興社會運動之間呈現出較明確的「選擇性親近」。政府與新興社會運動組織之間原有的緊張或對立關係逐漸轉化為合作依賴關係。金大中政府在推行主要政策時，常常與新興社會組織事先溝通，或讓它參與在決策過程裡。有時，在新興社會運動組織與政府的默契之下，它們針對社會的主要議題推動一些社會運動，以暗中支援政府。典型的例子就是在 2000 年初的「反提名與落選運動」。

在 2000 年 4 月國會議員選舉（相當於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時，「參與連帶」與「環境聯合」等所領導的聯盟組織「二千年公民聯盟」，在與金大中政府的默契下，推行了「反提名與落選運動」。「公民聯盟」表面上反對那些腐敗、反民主以及保守的候選人，所以它提出客觀的標準來批評那些被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但實際上受到打擊的大多數候選人是剛下台的第一大反對黨候選人。在「公民聯盟」所公布的反對候選人名單中，執政黨的候選人有 16 人，聯合執政黨²⁰的候選人有 16 人，第一大反對黨的候選人則高達 30 人（朝鮮日報，2000.2.19）。因此，第一大反對黨與聯合執政黨公開強烈譴責「公民聯盟」的「反提名與落選運動」。反之，執政黨不強烈批評反提名與落選運動。無論如何，執政黨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政治利益，同時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得到了多數人民的歡呼，並得到了空前的成果，從而擴大了其對社會的影響力。

（三）資源動員的市場化

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基本上都依靠專業知識份子來運作。但除這種專業知識份子領導人外，其成員如市場上的消費者般都是原子化的個人。原子化的個人指的是，無論地域、地位、職業等，都可以成為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的會員。換言之，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的會員就是其運動的消費者。因此，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在動員策略上均採取市場取向的模式。就如同市場上的企業在商品競爭的挑戰中要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般，透過突顯自己運動的優點或參與所可能帶來的好處，以吸引運動的成員。由此可知，運動的成員，即會員，似乎是一種運動的消費者，運動的領導人好像是運動的推銷者。這種動員方式很類似於「市場管理類型

¹⁹ 執政黨「國民會議」（後來改稱民主黨）的支持及動員基礎是非常片面的，侷限於全羅南北兩道的整體選民與大漢城地區的部分選民。所以它在國家政策的推行上常遇到困境。

²⁰ 金大中政府本來是一個聯合政府。在 1998 年總統大選時，第一在野黨「國民會議」為彌補選民基礎上的片面性而拉攏相當保守的金鐘泌所領導的第二在野黨「自由民主聯合」，因而在組閣時成立了聯合政府。「自由民主聯合」雖是一個聯合執政黨，但它是一個典型的保守政黨，所以改革傾向的社會運動組織都排斥它。

(market managerial type)」的資源動員模型(Lo, 1992; 趙大燁, 1999)。

細言之,第一,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以會員的名義動員原子化的消費者,因而其運動組織與會員之間建立的是市場式的交換關係。在此,發生一件有趣的事。它們在收取會費時,先要求會員自己選擇繳納金額,然後依據會費的多少而提供不同的運動商品或服務(趙大燁, 1999: 216-8)。另外,它們為提供這些服務而在其組織裡建立一個專業化的管理系統。第二,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表面上強調會員或人民自發性的參與,但實際上其資源動員的重點有二:其一是,招聘重量級的專業人士,以提高組織的知名度或吸引人民的注意力。因為明星級專業人士較容易與新聞媒體打交道,便於擴大運動的力量;其二是,它們著重於確保管理專業組織所需要的基金,因為它們設立許多專業組織需要龐大的基金。

上述的市場取向的運動模式充分體現了以議題為中心的社會運動所可能採取的動員形式。多元化的韓國社會裡會產生多樣的社會議題,新興社會運動組織運用相對靈活的專業組織,敏捷地搶佔社會上的主要議題,並比民眾性社會運動組織迅速且持續地創造出新的運動議題。

(四) 大眾動員與聯盟策略

西方的新興社會運動基本上是提出多種議題的運動,其在推展運動時,並沒有保持著緊密的連帶,只不過維持著鬆弛的關係。因此,西方新興社會運動缺乏各個運動之間的緊密聯盟,只不過是追求多種議題的各個運動之單純總和。

然而,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呈現出與西方不同的面貌。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如上所述,不論其設立目的如何,無所不包地介入社會的各種議題,所以這種運動型態會使社會運動組織在很多議題上重疊。這種條件為新興社會運動組織提供了不少的聯盟運動的空間。在九十年代末期以後,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在社會主要議題上多次採取了聯盟運動模式。這種聯盟運動策略並不是韓國新興社會運動固有的運動模式,而是來自傳統民眾運動的經驗。民眾運動出身的新興社會運動領導人早就體認到聯盟運動的有效性,所以進入新興社會運動圈以後,主動地推動聯盟運動。

主要聯盟運動議題如上節所述涵蓋著相當廣泛的問題。例如,保護綠帶(green belt)及垃圾問題等環境保護運動、反對國家安全法及撤換法務部長等政治性運動、改革新聞界及支持醫藥分工等社會性運動、以及監督政府機關及市場等監督運動等等。其議題表面上是無所不包的,但其實大部分都是全民所關心的急迫性議題,同時是國家或市場不會一下子或主動地讓步的議題。因此,為達成運動目標需要動員群眾,同時採取較激進的手段,也就是集會及示威等,從而可以有效地向抗爭對象施壓。

在2000年春天,四百多的主要社會運動組織共同成立「二千年公民聯盟」而發起了空前絕後的「反提名及落選運動」。無數的社會運動組織公開聲明為落實政治民主化而必須改革選舉制度,同時使保守及反民主的政治人物從政治舞台中退出。這雖是一個急迫及全民關心的議題,但也是對巨大政治勢力的艱難挑戰。因此,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積極籌組了一個幾乎包含所有主要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的龐大聯盟。它採取較激進的手段來施壓主要政黨,甚至非法地公開反對候選人名單,²¹以號召人民。這些策略絕不是單獨的一個社會運動組織所能做得到的。由此可知,聯盟運動的消長將是依議題的急迫及全民性與抗爭對象的反應程度而定的。

但在聯盟運動的推動上逐漸出現一些問題。社會運動組織雖在其組織成員的構成與背景上保持同質性,但在某些議題上仍存在歧見。例如,在分開運作的國民年金組織的合併問題

²¹ 根據選舉法規定,市民團體不能參加對特定候選人表示贊成或反對的一切選舉活動。

上各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張。另外，聯盟運動本身產生一些問題。因為聯盟組織的規模過大，所以容易官僚化，並在內部控制上出現不少困難。因此，最近它們較傾向於採取依個案而合作的方式。

五、韓國民主化運動傳統下的社會運動性格

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因其特殊的社會背景而呈現出非常複雜的性格。其雖然標榜與傳統社會運動不同的運動主體與目標，但實際上仍表現出一些傳統社會運動的特徵，同時也展現出與西方的新興社會運動相當不同的面貌。在此，將以對比的方式從不同角度分析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的獨特性格。

（一）政治取向或生活世界取向

韓國民間社會進入 1990 年代以後，隨著民主化的進展，民眾取向的傳統民主化運動面臨了危機。傳統民主化運動逐漸呈現出傾向於左派意識型態的性格，同時追求極端主義的政治目標。在這種激進化的情勢之下，傳統民主化運動漸漸喪失了人民的支持，並被孤立於下層階級之中。由此，韓國民間社會逐漸察覺到另一種社會運動的必要。但它又認識到，韓國社會在 1987 年全民所發起的「六月抗爭」以後，雖實現了程序民主主義，但社會的民主化還未落實，所以仍需迫切地推行民主鞏固的任務。這些社會的民主化，進而連生活世界的微觀問題都直接牽涉到國家體制的改革。因此，民主化以後的新興社會運動也仍無法拋棄政治性的運動目標。

另外，新興社會運動的領導人大部分都是從民眾性民主化運動界中轉移過來的。它們不容易抹去民主化運動時代深受的經驗與觀念。因此，新興社會運動難免呈現出一些民眾性民主化運動的主要特徵，也就是強烈的政治取向。換言之，新興社會運動的領導人認為社會的主要問題都來自非民主的國家制度與政策。

另一方面，人民對政治或政黨的不信任使社會運動組織扮演準或擬似政黨（quasi-party）的角色。現有的韓國政黨都可以說是保守政黨。它們都積極利用地緣主義或地域情緒來壟斷並再生產政治權力，同時依地域的差異而區隔人民，以區隔政黨的社會基礎並破壞民間社會的團結（玄載浩，1998）。政黨內部文化的非民主性、中央黨部中心的科層式的政黨結構、以及以大老闆為中心的私有化的政黨性格，也就是政黨的垂直結構與威權性格，無法將基層黨員或民間社會的各種意見反映到政黨的政策上，反而阻撓政治及社會的民主化。尤其，公職人員提名過程的非民主性格，使社會運動直接介入公職人員的選舉。

（二）全民取向或弱勢集團取向

隨著階級或階層的分化，激進及單一的民眾運動路線曝露出其運動目標的侷限性與擁護特定階級利益的性格，所以以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主的菁英們開始體會到傳統民主化運動無法繼續受到昔日的全民性支持。在這種困境之下，專業知識份子主動動員中產階級成員而組織起了新興社會運動團體。這些新興社會運動組織特別強調它們有別於傳統的民眾性或階級性社會運動組織，並且它們的社會基礎在於全民性的目標與利益。其運動目標並不是追求階級利益或民眾利益，而是實現公共或全民利益。也就是說，透過公共利益的追求而擴大社會上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同時使國家跟隨公共領域的邏輯。但這並不意味著將國家視為敵對的對象，而是將它視為批判及合理溝通的對象（朴炯俊，2001：127）。

新興社會運動組織將其運動目標定位在全民性訴求上，已經獲得了空前的成功。「經實聯」在對自己五週年的評價與展望中明確地表示，因為它提出了維護全民利益的口號並採取了溫

和及合理的抗爭手段，所以它可以使厭惡極端對立性政治鬥爭的多數人民支持其運動。

韓國的新興社會運動將其動員對象鎖定在多數人民或全民，所以它特別提出了可以避免階級性動員的口號，就是說它公開主張自己追求「合理的進步勢力與良心的保守勢力之聯盟」。這種雖然籠統但溫和且中立的目標較容易吸引多數人民的支持。在此，我們需要考慮一個問題。新興社會運動的領導人都是有固定職業與社會聲望的專業知識份子，例如，教授、律師、會計師、牧師、神父等。他們確實顯露出中產階級的基本屬性，因此他們很怕失去現有的社會身份或地位，所以不敢選擇激進的運動目標與手段。這反而為新興社會運動擴大了支持範圍。

（三）中央集中取向或在地化取向

韓國新興社會運動仍受到以中央政府為主要抗爭目標的民眾性民主化運動之影響，並且因為中央政府仍然壟斷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所以它們將社會問題都視為中央政府的制度及政策所導致的問題。另外，韓國在進入一九九五年以後，才施行地方自治制度，所以韓國人民沒有機會經驗到地方性的政治運作與社會動員。因此，甚至連地方性的問題也要到漢城去解決。此外，韓國的新聞媒體在與主要社會運動組織的默契下主動炒熱政治性的及全國性的議題，但不願意多關照「地方」及「生活世界」的議題。

這些社會條件使主要社會運動組織集中於漢城，同時使其組織型態走向大型化。舉環境運動的例子而言，環境運動相對更需要「在地化」與「草根化」。但韓國環境運動的「在地化」程度很低，地方性環境運動團體大部分都是中央環境組織的下設組織。因此，在韓國不容易出現草根性環境運動團體所共同建立的區域性組織。另外，因為其「在地化」或「草根化」很薄弱，所以相對少發生受害地區居民所發起的地方性抗爭運動。

（四）運動取向或非運動取向

韓國民間社會透過由下而上的民眾抗爭獲得民主化，所以在日後的民主鞏固階段中所蓬勃發展的新興社會運動，也呈現出以大眾動員為手段的運動取向。如前所述的政治取向聯盟運動，會傾向於以大眾動員的方式向國家與大財團施壓。

另外，韓國新聞界已成為社會裡的另一個權力集團，所以它們不願意只報導或反應社會議題與輿論，卻要自己主導或創造新的社會輿論。因此，它們通常不大關心社區運動或其他草根性非營利活動（朴炯俊，2001：197），但會支持或捧紅大眾動員性社會運動，以企圖成為社會輿論的引導者。

（五）專業性組織取向或草根性組織取向

韓國社會運動組織可分為「專業性組織」²²與「草根性組織」。在 830 個韓國主要民間非營利組織與市民團體中，草根性組織只有 110 個。這表示韓國社會運動是為專業性組織所主導的，這其實是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的議題中心與論述競爭的運動模式所造成的結果。

這種專業性組織在決策過程中常呈現集權的決策模式。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為將自己區別於民眾運動而特別強調市民連帶、多元主義以及決策的民主化等概念。為此，它們表面上願意採取開放及鬆散的網絡性組織型態，但實際上因其大型組織型態而為知識份子提供隨意壟斷其組織的機會。然而，另一個原因也造成決策的中央集權化。新興社會運動傾向於採取以議題為中心的論述競爭之運動方式，並因這種運動方式而使知識份子繼續提出取代性的政策

²² 專業性組織指學者、律師、會計師以及醫生等專業知識份子所主導的組織

方案。因此，其決策模式不得不逐漸轉變成為少數具有專業知識的知識份子所主導的集權型態。

六、結語

進入 1980 年代以後，韓國新興社會運動在民主鞏固或社會變遷過程中無庸置疑地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這種新興社會運動因其成長時空的差異而呈現出與其他社會運動不同的特徵。韓國新興社會運動是，在新的社會環境變遷下為取代其舊社會運動而出現的，所以它們有意識地選擇與舊社會運動不同的路線，如合法及和平的運動手段、論述競爭的運動模式以及市場化的資源動員等，以使自己區隔於舊社會運動。然而，首先在韓國的特殊歷史條件下，連新興社會議題也有為泛政治化的問題。其次，韓國新興社會運動的第一代與第二代領導份子大體上都是從舊社會運動圈轉移過來的，這兩個因素使韓國新興社會運動仍保持著不少舊社會運動的傳統。另外，上述的社會條件又使韓國新興社會運動與西方新興社會運動保持一段距離。

另一方面，國家的「論述霸權」策略與新聞媒體的「新興論化」策略，為新興社會運動提供了與民主化運動時代不同的政治社會環境及發展空間。就新興社會運動與國家的「論述霸權」策略而言，首先，文人政府放棄既有的暴力性控制手段，而利用「論述霸權」的方式控制民間社會。所以社會運動也有必要採取「論述競爭」的方式，而制衡政府。再者，文人政府適當地接受或操作合法及和平的新興社會運動，以抒解民間社會的不滿，同時獲得其統治的合法性。其三，文人政府借用新興社會運動的力量來約束大財團與勞工組織的過度擴張。其四，在文人政府與新興社會運動共生關係下，新興社會運動部門變成為政府的人才庫，一方面新興社會運動部門用這種方式來擴大其對政府的影響力，但這可能會反過來降低其自主性。

對新興社會運動與新聞媒體的「新興論化」策略而言，以「議題中心」與「論述競爭」為主要特徵的韓國新興社會運動極需新聞媒體的報導與支持。韓國的新聞媒體在民主化以後，逐漸變成為另一個社會權力集團。它們為一方面約束或控制國家權力，另一方面掌握與主導民間社會的意識型態領域，而企圖適當地利用新興社會運動來創造或操作社會輿論。因此，新興社會運動與新聞媒體之間顯露出較強烈的選擇親近性（elective affinity）。

最後，上述的韓國民間社會對社會運動的新要求、民眾性民主化運動的傳承、國家及新聞媒體與新興社會運動的共生關係、以及市場化的資源動員模式等，這些因素都直接型塑或影響了新興社會運動的性格。換言之，新興社會運動所呈現出來的政治取向、全民取向、中央集中取向、運動取向以及專業性組織取向等這些性格，都或多或少受到韓國的特定歷史時空及社會結構性條件的影響。日後，是否會繼續保持著原有的獨特社會性格，或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逐漸受到西方新興社會運動的影響以失去其原貌。此需要有待觀察。

參考書目

- 玄載浩，1998，〈地域政黨結構的現實與變化〉，《經濟與社會》，40號。(韓文)
- 朴炯俊，2001，《省思的民間社會與市民運動》，漢城：義巖出版社。(韓文)
- 朴喬弼，2002，〈解析韓國民間社會的形成歷史〉，《「亞洲民間社會的比較研究」計畫之中間報告》。(韓文)
- 金浩起，2001，〈新社會運動與韓國的市民運動〉，曹喜昞編，《NGO 指南：市民、社會運動與 NGO 活動》，漢城：韓民族(HanGyeoRe)新聞社，頁70-82。(韓文)
- 崔章集，2000，〈韓國的民主化、民間社會以及市民運動〉，環境運動聯合編，《共生的路》，第82號。(韓文)
- 曹喜昞，1999，〈綜合性市民運動的結構性格與其未來的展望〉，《當代批評》，1999年秋季號。(韓文)
- 慎鏞廈，1994，《韓國近代社會的結構與變動》，漢城：一志社。(韓文)
- 趙大燁，1999，《韓國的市民運動：抵抗與參與的動學》，漢城：Na-Nam出版社。(韓文)
- 鄭哲熙，2003，〈韓國市民社會的軌跡：1970年代以後市民社會的動學〉，漢城：Arche出版社。(韓文)
- 邊太燮，1982，《受檢韓國史》，韓國：法文社。(韓文)
- Cho, Hee-Yeon. 2003. "Changes in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Korea," 「台灣與南韓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鞏固」國際研討會，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Cohen, J.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4).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Lo, Clarence Y. H. 1992. "Communities of Challeng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n A. Morris and C.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 McAdam, Doug. 1988. "Micro-mobilization Contexts and Recruitment to Activism,"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25-154.
- Offe, C. 1985. "New Social Movements -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no. 52.
- Tilly, C.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 A.: Addison-Wesley.

南韓民族主義對民主化的影響*

李南周

韓國聖公會大學中國學系副教授

一、南韓大選與反美情緒的爆發

2002 年末南韓反美情緒的發展達到一個高潮。這一次反美浪潮的爆發是由一個不幸的事件引起的。2002 年 6 月，美軍在軍事訓練中壓死了兩名南韓女中學生。最初，由於在南韓正在進行世界杯足球比賽，關注這事故的人不是很多。可是，同年 11 月駐韓美軍軍事法院判對這一事故有責任的兩名美軍士兵無罪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全國各地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和悼念活動。從 11 月到 12 月底在漢城市政府廣場進行的抗議和悼念活動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並且，參加這次反美活動的人數和範圍遠遠超過過去由激進的民族主義運動主導的反美運動。特別是，像初中，高中學生等青少年也積極參與了這次反美活動。

這一系列活動給當時進行的總統選舉帶來了很大變化。在 12 月 16 日進行的總統選舉中原本不被看好的盧武鉉當選為南韓的新總統。當時老百姓普遍認為盧武鉉是對美國敢說敢做的政治家，相反地，當時最有力的候選人李會昌是親美派。所以反美活動的強化只會有利於盧武鉉。並且，在兩個主要競選人之間票數差距不到一百萬的情況下，這一變數為盧武鉉的當選起到關鍵作用。表面看起來這些變化是很突然的，但這實際上是在過去 20 年中逐漸積累的結構變化的表現。

其一，1980 年的光州民主抗爭事件以後，南韓的民主運動勢力開始提出反美主張，於是在南韓民主化運動中民族主義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本來南韓民主運動勢力與美國的關係是比較好的，南韓民衆認為美國是在韓國戰爭中支持自己的朋友。特別是 1970 年代後期美國政府在人權外交的旗幟下支持了一些民主運動。但是，在 1980 年光州民主抗爭這一事件上，美國明顯地支持鎮壓民主運動。特別是 1981 年初對鎮壓光州民衆負有重大罪責的全斗換成為美國總統雷根 (Reagan) 首次接待的外國首腦。這使南韓民主人士看清了美國對韓政策的真面目，而逐漸把美國看作是阻礙民主化和民族統一的勢力。這種變化最初由學生運動主導。特別是自從 1986 年以後，反美鬥爭在學生運動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反美運動十分激烈。¹雖然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體制崩潰以後學生運動的影響力逐漸下降，但 1980 年代的反美運動在提高民族主義情緒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二，在進入 1990 年代後南韓民衆對北韓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南韓民衆一直把北韓看做是對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脅。但是，東歐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和北韓的經濟危機給

* 此論文曾發表於「台灣與南韓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鞏固」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3 年 7 月 23 日。

¹ 當時，在學生運動中開始出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之間關係的激烈爭論。民族解放派主張應該以民族問題為鬥爭的重點目標。民眾民主派主張以階級問題，特別是以工人運動為鬥爭重點。但總體來說，在學生運動中前者一直占主導地位。比如說，在韓國最大的學生運動組織，全國大學生代表協議會（1987-1993 年）和韓國大學生總學生會聯合（1993 年—）都屬於民族解放派。

南北韓之間的力量對比帶來很大變化。對南韓來說，北韓已經不是威脅力量，而是為了維持生存需要南韓幫助的脆弱對象。特別是 2000 年 6 月南北韓首腦會談開闢了走向南北合作的新道路。雖然在南韓圍繞前總統金大中的陽光政策出現了不少爭論，但是南韓民衆普遍認為南北韓關係的好轉不僅使韓國擺脫戰爭危險，而且可以給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機會。可是，小布希上台以後，美國和北韓之間關係陷入僵局，甚至出現了發生軍事衝突的危險。因此，美國對北韓的高壓政策引起了韓國人的不滿，並在南韓民衆的印象中美國逐漸變成一個阻礙民族統一並且威脅韓半島的勢力。²

這些情況都明確說明了去年在總統選舉中出現的南韓民衆對民族尊嚴的激烈要求不是偶然的。以反美為主要旗幟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影響未來南韓命運的一個重要潮流。雖然上台以後的盧武鉉改變了原來的態度，如在訪美中的保持低調態度，但最近興起的民族主義不會因盧武鉉的新政策而弱化。相反，盧武鉉的對美政策已經引起了南韓民衆的不滿，而成為在上台以後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那麼，民族主義的強化對南韓政治變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根據去年的情況來判斷，我們可以說民族主義的強化對南韓社會的民主化起到了比較積極的作用。為什麼可以這麼說呢？其一，在大選中盧武鉉獲得了在社會經濟結構中處於下層的弱勢群體的支持。一直被排擠在決策過程之外的這部分民衆認為盧武鉉能打破由保守勢力壟斷政治的局面而支持他。其二，盧武鉉在上台以後提倡「參與政府論」。新政府正在大大擴大市民社會參與政府決策的渠道。

但是，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發展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相反，民族主義有時會起到阻礙民主主義發展的作用。所以，不能簡單地下結論說南韓的民族主義可以推動民主化。最近在南韓出現的圍繞民族主義問題的爭論也反映了這種情況。這些爭論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南韓的現代性問題，民族主義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等等都成為這次爭論的主題。這次爭論由一些認為民族主義不僅起著壓制個人自由的作用，而且威脅國際和平的學者引發的。他們主張只有擺脫民族主義的束縛，才能真正實現民主化並促進世界和平。³但是，南韓還是面臨著很多民族問題，如南北統一，調整韓美之間不平等的軍事同盟關係等等。如果民族主義的目標與民主化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南韓現在就會面對兩難選擇的困境，要麼選擇民族，而犧牲民主；要麼選擇民主，而犧牲民族。所以，另外一些人雖然肯定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但對否定民族主義的積極作用的主張提出批評。

下面，我想探討的就是：有沒有能使民族主義和民主化二者的目標結合在一起的道路？我認為在南韓存在兩種民族主義。一個是統治集團的民族主義，一個是民衆的抵抗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在南韓的民主化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差別很大。所以，在探討民族主義和民主化之間的關係時，不能混淆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區別。民衆的抵抗民族主義對民主化的進程產生了比較積極的影響，但是，也要承認抵抗民族主義也在對應新的時代趨勢和社會問題，如全球化、婦女問題、環保等問題時顯出很大的局限。因此，今後南韓民族主義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對應這些新的挑戰。在第二節中，首先簡單地總結一些學者對民族主義的批評，作為展開論述的出發點。

² 根據一些問卷調查的結果，2001 年到 2003 年間韓國人對美國的認識出現了很大變化。對美國具有好感的人從 36.1% 減少到 25.4%。同比在 20 歲年齡層中從 35.2 減少到 16.5%，在 30 歲年齡層中代青年中從 33.3% 減少到 15.0%。相反，對北韓具有好感的人從 19.2% 增加到 26.5%。（Hankyoreh Daily, 2003 年 5 月 15 日）

³ 對民族主義提出批評的南韓學者，也像 Hobsbawm 和 Anderson 那樣，把民族國家看做一種想像的集團，而試圖用個人，性別等的其他標誌解體民族。

二、對民族主義的批評

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開始，民族主義就一直在韓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占據一個重要位置。二戰結束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從韓半島撤出了，但是在韓半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韓民族分裂為以資本主義為發展方向的大韓民國和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的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雖然存在制度方面的區別，但都將民族主義作為國家的統治意識形態。並且，兩個國家的統治勢力都利用民族主義的旗幟來壓迫國內的反對勢力和個人自由，以加強自己的統治。

可是，民族主義不單單是統治集團的武器，也是反對獨裁政權的民主力量的武器。他們為了擴大影響力也把民族主義作為主要鬥爭綱領。在他們看來，當時南韓的統治集團沒有資格主張民族主義，因為南韓統治集團的主要成員大部分來自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的親日派，並且只能依靠美國和日本等帝國主義勢力而生存。他們在反共旗幟下實際上是反對民族統一。所以他們認為只有他們的抵抗民族主義，才能算是真正的民族主義。直到最近，南韓的民主力量還是普遍接受這種說法。但是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這種看法受到了不少人的質疑。

首先，北韓的經濟危機給 1980 年代主導民族運動的勢力以很大的打擊。在 1980 年代南韓的民族主義運動逐漸走向激進化道路。民族主義激進化主要表現在他們對美國和北韓的態度上。韓國戰爭以來，反美和北韓在政治上一直是一個禁區。可是，1980 年代的民族運動突破了這個禁區。他們以爭取民族自主為最重要的鬥爭綱領，把所有的政治勢力以民族和反民族的界限加以劃分。按照這種劃分，美國是反民族勢力的核心，成為最主要的鬥爭目標，而北韓是民族運動的主要夥伴。但是，北韓的困境與悲慘的人民生活被曝光以後，對北韓採取比較肯定態度的民族主義運動勢力逐漸失去了影響力，甚至被認為是落後於時代發展。

其二，全球化趨勢的加速也對民族主義產生了消極影響。在經濟全球化的步伐下，很多社會經濟問題已經超出一個國家的領土和主權範圍的框架，而且這些問題不是依靠某一個國家的決策所能解決的。當然，全球化趨勢正在引起以反對新自由主義為主題的國際行動，而這些活動的一些要求接近於過去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民族運動的要求，如反對外資引進，市場開放等等。但是，在一個國家這些活動的影響力還不足於限制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大部分國家繼續接受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依靠個別國家的力量對付經濟全球化的做法無濟於事。

最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民族主義對新的社會問題的遲鈍反應。比如說，民族主義始終給人們留下這樣的負面印象：對環保，外籍勞工，婦女問題重視不夠。有時甚至出現民族主義與這些新問題之間的衝突，經濟發展論和環保運動之間的衝突，即是最典型的例子。以前的民族運動始終以民族統一、民族自主等的集體目標作為最主要的鬥爭綱領，而在這些口號下卻忽視了與民衆個體的具體生活條件有密切關係的問題。在韓國，這些空白逐漸被新興的市民運動填補了。從市民社會的角度來看，只關注作為一個統一體的民族的狹隘觀點不但很難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而且有時反而會起到阻礙作用。

以上述情況為背景，一些學者提出要對民族主義進行反思。他們以期刊「當代批評」為主要論壇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如林志弦和權赫範。雖然進入 1990 年代以後民族主義逐漸被看成是落後於時代的思潮，但對民族主義正面挑戰的人還是很少。並且，像他們那樣對民族主義進行系統批評的人更少。本來他們的主張焦點並不在於民族主義本身，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約束個人自由的各種各樣的文化、政治因素。在他們看來，雖然南韓在政治制度方面民主化進步比較快，但約束個人自由的因素還普遍存在。民族主義即是其中一個。

他把民族主義分為兩種類型。一個是以歐洲初期民族主義為代表的市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市民民族主義追求以自由的個人或市民為主題建立自由的民族國家。這樣的民

族主義本身絕不是與個人自由和權利相互衝突的。民族不僅是反對封建主義的等級身分制的思想武器，而且是擴大個人自由和權利的空間。但是，由於發展階段的不同，在東歐和亞洲的後發國家中出現了的另外一種民族主義。他把這種民族主義稱為有機體民族主義（organic nationalism）。這種民族主義與市民民族主義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以什麼因素為紐帶形成民族概念。前者以人民主權論等近代政治思想為基礎，但後者以血緣、語言等傳統因素為基礎（林志弦，2002：116-117）。⁴

由於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弱小，東歐和亞洲等地的後發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由封建社會的傳統勢力來主導。他們所關心的不是個人權利的擴大，相反是用民族主義的旗幟對抗現代化的趨勢，特別是政治制度方面的現代化。為此，他們的民族主義不能與資產階級的理性主義相結合，而是用血緣、語言等種族因素來加強凝聚力。也就是說，有機體民族主義以抽象的民族概念來替代作為個人解放武器的民族主義。

林志弦認為在二戰以後，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民族主義沒有擺脫這種局限性。社會主義最初就被認為是走出民族主義和現代性之間的矛盾的道路。但是，實際上社會主義用國家發展的旗幟，使民眾變成動員的對象，失去了國家和民族的主體地位（林志弦，2002：173-174）。這種現象在非社會主義的後發國家中也普遍存在，南韓的抵抗民族主義也不例外（林志弦，2002：192）。在他看來，雖然在1987年六月民主抗爭之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進展得比較快，但這也很難清算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民族主義的負面影響。這主要是因為這些作用不是通過明顯的渠道表現出來的，而是通過基礎?育等隱性渠道來實現。所以，為了進一步推進南韓社會的民主化，需要對民族主義的負面作用進行更徹底的批判。

林志弦並不完全否定民族主義。他對民族主義的批評集中於以民族或國家的名義壓制民眾的民族主義，而對於初期市民民族主義在推動民主方面的作用則是肯定的，也提到應恢復初期民族主義的面貌。但是，由於他在現實中發現的民族主義都屬於前一種，他實際上是否定了民族主義的積極作用。目前，他關心的是如何恢復被民族意識壓制的社會的多樣性。

權赫範雖然沒有對民族主義進行系統性的批判，但也強調民族主義的消極影響。他特別重視由民族主義和發展主義結合產生的消極影響，因為他是從生態主義角度對民族主義進行批評（權赫範，2000：76-77）。他還認為隨著南韓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變化，南韓的民族主義逐漸喪失了過去抵抗民族主義的健康性。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南韓，民族主義容易變成對外擴張和壓制婦女、環保等問題的工具（權赫範，2000：76-77）。他還主張民族主義本身不應成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思潮。這是因為以增加集體利益為最高目標的民族主義很難擺脫與以擴大個人自由為主題的人類普遍理想相互衝突的命運，有時會造成很大的悲劇。

樸魯子對民族主義採取更加否定的態度。他對民族主義的批評不只是針對韓國民族主義的，而是以一種全球現象的民族主義作為批判對象。在他看來，民族主義不過是在近代統治階級鞏固對被統治階級的統治的新發明。目前，人類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不是加強民族主義，而是限制民族主義所帶來的破壞性。在南韓的歷史上民族主義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性，但民族主義的消極性總是大於積極性。更重要的是明確民族主義所追求的一些目標不一定需要民族主義概念。（樸魯子，2002）

對民族主義提出批評的學者都堅決反對以集體的名義壓制個人自由的做法。他們認為民族主義忽視，甚至壓制在一個民族國家裏面存在的多樣性。這不僅包括個人自由，也包括階級，種族，性別等範疇。所以他們都主張為了進一步推進民主化，更需要能夠保障個人自由

⁴ 這種分類源於Hobsbawm。Hobsbawm是世界大戰之前的民族主義分為市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和種族—語言民族主義(ethno-linguistic nationalism)(Hobsbawm, 1990)。

和尊重一個國家內部裏存在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不能被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取消。確實，這些想法反映了在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南韓社會面臨的新問題。

直到 1980 年代，南韓民主化運動以推翻民族獨裁政權的統治和建立自主的民主政府為最重要的鬥爭目標。並且，當時很少有人懷疑以民族自主為宗旨的民族主義的正當性。但是，進入 1990 年代以後，很多人認識到單靠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特別是，環境問題、婦女問題、外籍勞工問題等新的社會問題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的學者開始強調民族主義和新出現的社會問題之間的矛盾。

上面被引用的學者一般把民族主義看作是與民主主義的要求相對立的意識形態。他們對民族主義的批評具有兩個含義。其一，民族主義一直對民主化產生消極影響。他們承認民族主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只強調在對抗侵略方面的作用，而不提民族主義在推動民主化方面的作用。其二，民族主義的思維方式不能適應於今後社會發展的趨勢。民族主義的思維方式與環保、性別、少數集團問題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雖然他們也承認民族主義在歷史上起過推動民主化的作用，但是這些論點是值得商榷的。民族主義在過去南韓民主化運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並且，在理論上不能把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對立起。林志弦也承認初期市民民族主義對自由、平等思想擴大產生的積極影響。所以，需要對民族主義與新社會問題之間的關係進行進一步分析。下面著重探討這兩個問題。

三、南韓民主化進程中的民族主義

對民族主義提出批評的學者一般認為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的關係方面統治集團的民族主義和抵抗民族主義之間不存在區別。這等於說我們要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作出選擇，而不存在能夠使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相結合的道路。這種邏輯把民族主義過於簡單化了。雖然關於民族主義的爭論進行了很長時間，但民族主義還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這意味在分析民族主義的作用時，應該重視具體的事實，而不能只用幾個抽象的概念來下結論。

對否定民族主義在民主化中的積極作用的主張，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提出批評。一些人堅持主張雖然民族主義具有與民主化相互衝突的缺陷，但現在南韓所面臨的一些重要問題只能通過加強民族主義來解決。堅持這種主張的人常常把鬥爭的重點放在反美和統一運動，因為他們認為在沒有建立完整的民族國家的情況下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換句話說，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實現民主主義的前提條件。比如，國家保安法是以防範北韓為理由限制思想自由和政治活動的自由。他們基本繼承了在南韓現代歷史中以建立獨立統一的國家為宗旨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傳統。在沒有解決南北分裂局面的情況下，這樣的傳統民族主義可能對南韓政治繼續發生影響。最近，新自由主義影響力的增加和美國的霸權主義外交政策也給了這種民族主義新的發展動力。他們主張為了抵制這些趨勢，只能依靠民族國家的作用。

但是，他們對民族主義的理解還沒擺脫在傳統帝國主義時代下的說法，因為他們所說的民主從屬於民族主義的目標。他們把民族自主和民族統一看作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的前提條件，而且所有的鬥爭為反美的鬥爭目標服務。韓美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的確是制約擴大民主的重要因素。這種看法是導致過去第三世界的抵抗民族主義在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以後大部分變成壓制個人自由的工具的主要原因。但是，民族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多個目標中的一個，決不能壓倒其他社會發展目標。因為現在不論國際社會還是韓國都和過去幾十年之前的情況存在很大不同，所以在帝國主義時期的民族主義很難適應於現在的發展趨勢。與民主主義的價值趨向對立的民族主義很難得到民衆的認同。這中變化反映在民族運動對南北統一問題的態度方面。過去韓國的民族運動主張在承認社會制度、政治思想的差異的前提下實現南北統一。

可是，最近什麼樣的統一國家的問題比能不能建立統一國家的問題變得更重要。⁵

但是，傳統民族主義的局限性不意味民族主義已經喪失了積極意義。這是因為隨著地區和時代的不同，民族主義的內容和作用也發生變化。林志弦也把民族主義分為市民民族主義和有機體民族主義。只是他在現實民族主義中看到的是後一種。但是，不能把現存的所有民族主義簡單地歸納為後一種。所以，另外一些人專門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批評意見。他們都認為民族主義與民主化之間的衝突不是不可調和的，民族主義也在民主化進程中起到了積極作用。比如，金東春比較系統地探討了民族主義與民主化、市民運動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在現實條件下民族問題和市民社會的問題是不可分割的，而且特別強調以下兩個問題（金東春，2002，80-89）。

其一，不僅民族的自主，並且市民權利的保障也只有在更平等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之下，才能真正實現。他特別強調，只注意一個國家內部的公民權利，而不關心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這種態度不能說是真正的自由主義。所以，民族主義也應該成為實現自由主義設計的一個指導方針。但是，他在強調民族主義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主張民族主義應該更重視和提高與公民權利有關的社會政治目標，而糾正只重視抽象的民族權利的做法。這是針對將所有問題歸納為反美或統一等政治目標的民族運動提出的批評。

其二，民族主義不一定是以國家之間的對立為前提的，或者具有排他性的。相反，這樣的特點能使民族主義為民主化提供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動力。當然這樣的動力源於民族主義所具有的集體意識。林志弦等把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看成壓制個人自由的主要原因。但在金東春看來，這種集體意識不是以自己為主的，而是以具有積極意義的大同意識為主的。在法國革命前後的歐洲，民族主義是打破血緣、地緣等的界限實現以自由、平等為宗旨的政治共同體的武器。所以，市民運動為了自己的發展也應該積極接受民族主義的這些成分。

尹建次強調民族主義是可以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繼續變化的思潮。在他看來，過去韓國的民族主義的傳統雖然具有不適應於時代變化的局限，但還是具有進步性和健康性。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指責過去的民族主義所具有的局限性，而在於讓民族主義成為以性別，環境，少數集團等後現代性問題為己任的思潮（尹建次，2002，86-87）。

這樣，他承認民族主義在推動民主化方面的積極作用，反對把民族主義與民主化對立起來的想法。他們雖然承認民族主義或民族運動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但認為這些缺陷並不能成為否定民族主義的根據。確實，民族主義的思維方式具有以集體的目標壓制個人權利的危險性。但可能與必然畢竟是不同的。個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而需要能夠保護他們權利的集體單位。目前來看，最有效的單位還是民族國家。所以，使民族主義更適應於新情況比使民族概念解體具有更加現實的意義。⁶

特別是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關係方面由統治集團主導的官方民族主義和由民衆主導的抵抗民族主義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別。我認為不僅在過去民族主義的遺產中可以找到對民主化產生積極影響的因素，並且民族主義本身也在實踐中經歷了不小變化。這一問題在關於民族主義問題的討論中一直被忽視了。現在，韓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具有不少初期歐洲民族主義

⁵ 在韓國民族主義運動一般為了加強南北合作，對北朝鮮的人權問題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但是，隨著北朝鮮的人權狀況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民族主義在這一問題上陷入被動。特別是今年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北朝鮮人權問題的決議以後，怎麼處理人權與民族合作之間的關係成為韓國進步勢力所要面對的新的焦點。

⁶ 任和權也在批評民族國家對個人自由的壓制的同時，承認民族主義或者民族國家的一些積極作用。從這一角度來看的話，他們不是否定民族主義，而是否定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等級關係。也就是說，他們對民族主義的批評時着眼於民族主義在社會運動中占主流地位的現狀。但是，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這種論調等同於對民族主義的否定，缺乏現實性（鄭鉉柏，2003）。

的特徵，是反對封建主義身分制和鼓勵個人自由的武器。

像林志弦主張的那樣，在發展中國家，民族主義容易被統治集團壟斷，而成爲官方民族主義。但是，遭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以後，南韓原來的統治集團屈服於殖民主義勢力，而不能主導民族主義運動。特別是擺脫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統治以後，韓國統治勢力的民族主義還是很脆弱的，因爲他們爲了彌補薄弱的國內統治基礎，只能依靠親日派勢力和美國的影響力。所以，在南韓統治集團的民族主義一直沒有獲得抵抗民族主義勢力的支持，而且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直互相對立。也就是說，抵抗民族主義不能站在官方民族主義和由他們主導的國家主義一邊，相反要與他們進行激烈的鬥爭。所以，抵抗民族主義比較順利地與民主化的要求相結合，而在民主化運動中作出不小的貢獻。1960年代反對韓日建交協商的運動，80年代統一運動在推動民主化方面起到很關鍵的作用。

拿民族主義和民主化之間的關係來說，抵抗民族主義本身經過了幾十年的激烈鬥爭以後，顯示了很大的變化。林志弦主張第三世界的抵抗民族主義在掌握政權以後容易成爲動員群眾服務的統治意識形態，而完全喪失作爲解放意識形態的意義。他把這樣的歷史經驗作爲批判現在的抵抗民族主義的依據。但是，韓國的抵抗民族主義和世界二戰前後的民族主義之間存在重大的區別。在他們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有沒有受到民主主義的薰陶這一點上。

一般來說，在二戰前後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很少經歷過民主主義的洗禮。所以這種民族主義雖然能成爲主導從傳統封建社會轉變到工業化社會的意識形態，但在政治制度的層次上一直缺乏推進民主化的動力。這使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的距離日益拉開。可是，南韓的民族主義的情況有所不同。雖然在政治目標方面民族運動和民主運動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但在運動的群眾基礎和動力方面這兩種政治運動之間的區別不是很大的。因此，南韓的民族主義運動一直與民主化運動一起發展，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廣泛地被民主主義的價值趨向感染。最近的反美運動中也證實了這樣的特徵。去年總統大選前後的民族主義運動沒有被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支配，而主要依靠普通老百姓的自發性，保持著在運動中的多樣性。⁷所以，可以說現在很難想像與民主主義的價值趨向形成對立的民族主義。

當然，這樣的變化不意味南韓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爲能夠對應新出現的社會問題的意識形態。但是，在過去實踐中可以發現南韓民族主義朝著這樣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以後的問題在於，如何將民族主義適應於過去不存在或很少引起注意且容易與民族主義的價值傾向衝突的新問題。

四、在後民主化時期民族主義所面臨的新問題

雖然南韓民族主義在民主化進程中基本上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但我們也應該承認現在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無法在民族主義的框架裏得到解決。這並不意味只有拋棄民族主義，才能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但是，爲了有效地對應新的挑戰，我們要對民族主義進行徹底的反思，而不斷將民族主義改造得更適應於擴大民主化的要求。

林志弦主張只有回到初期民族主義的精神，才能使民族主義適應於時代的要求。但是，他的主張與其說是肯定民族主義的積極作用，不如說是重視限制民族主義的負面作用。因爲他試圖用個人，性別，其他少數集團問題代替民族問題。這種邏輯在上面說明的權赫範，樸魯子等的論說中也有出現。對他們來說，民族已經是落後於時代和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概念，只有性別、環境少數者的權利才是反映實際問題的概念。確實，民族主義很難對應這些在政

⁷ 在世界杯期間的啦啦隊活動主要由青少年主導。但是，目前這一代人的文化具有很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而很少受到某種意識形態的約束。並且，在抗議美軍壓死中學生的活動中很多人始終與激進的反美傾向保持距離，並出現這兩種思想傾向之間的爭論。

治制度的民主化以後開始引起關注的新問題。並且，對民族主義進行批評的人認為自由、平等的普遍理想比像民族那樣的狹隘概念更能正確地處理個人自由的問題，以及國家之間出現的各種各樣的不平等問題。在他們看來，以民族為主的想法只能滋長國家之間新的對立。

但是，雖然現在世界政治經濟結構與以民族國家為唯一的國際行為者的世界政治經濟結構有很大不同，但民族國家對國際和平和個人自由仍具有很重要的意義。目前，民族國家還是能夠為個人自由提供保護的最有力的單位。民族國家的解體不是保護個人自由的有效方法。問題在於如何使民族國家能夠成為實現自由、平等等價值的空間。我在前三節中已經簡單地指出過如下事實：在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成為壓迫個人權利的主要原因的情況下，糾正不公正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本身是實現自由主義理想的重要前提。

其實，從歷史經驗來看民族主義本身具有兩面性（鄭鉉柏，2003）。所以，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並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實現這些理想的工具。但是，在現實社會中除了民族國家以外，很難發現能夠保護這種普遍理想的工具。與其拋棄民族國家的作用，不如把民族國家作為實現普遍理想的工具。為此，民族主義需要更積極地探索與民主主義形成良性循環的道路，特別要注意防止使個人、性別、環境、少數集團等問題從屬於民族問題的做法。

南韓在進行民主改革之前，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建設民族國家的目標不是互相對立的。當時民主主義雖然追求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擴大，但在實踐上以顛覆獨裁政權作為最重要的鬥爭目標。民族主義在鬥爭對象方面與民主運動沒有很大矛盾。這兩種運動都把權力問題的解決當作首要目標。因此，在過去反獨裁鬥爭中，民族主義能夠為民主化作出貢獻。

但是，民族主義和前面提到的新出現的社會問題之間關係就有所不同。民族主義傾向於從民族國家的利益角度看問題。但環保運動、婦女運動、保護少數集團權利等運動其動力、目標、對象都與民族運動存在不少矛盾。比如，在國家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環境下，以國家集團發展為導向的思維方式明顯與環保思想發生衝突。從性別政治的角度來看，民族國家只不過是壓迫婦女權利的工具。⁸因此，從新的社會問題的角度來看，只有改變民族國家的思維邏輯，才能找到徹底解決這些新問題的道路。面對這些新問題，以民族國家為唯一參照單位的民族主義的缺陷變得更為明顯。

但是，這不一定是民族主義的本質特點。林志弦也承認初期民族主義在從封建主義的等級社會轉變到以個人自由與平等為特點的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起到過很積極的作用。其實，壓抑個性是所有的集團性運動所具有的局限，而我們所面臨的選擇是要不要集團性運動的問題。按照林志弦等人的邏輯進行思考的話，可以得出否定所有集團性運動的結論。但是，這種結論很難被人們接受。正像人類的所有的問題不能歸納為集團性問題那樣，人類的所有問題也不能被僅僅歸納為個人問題。⁹問題在於能不能在追求集團性目標中盡力避免壓抑個人的危險。一句話，解構民族國家決不能保障婦女、環保問題的解決。我們只能尋找集團性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平衡。¹⁰

但是，為避免集體權利和個人權利的衝突，民族主義一定要把擴大民主主義也作為自己的目標，或者從擴大民主的角度看民族問題。也就是說，民族主義運動不應該再在提高民族

⁸ 比如，在日本殖民主義時期發生的慰安婦問題引起民族運動和女性主義之間的爭論。女性主義批評民族運動只問日本的責任，而忽略國家裏面男性壓迫女性的社會結構。在他們看來，根深蒂固的家長制也對這些問題重大責任。並且，在去年的抗議美軍犯罪的活動中，不少人批評為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了強調「女」學生的死亡的做法（鄭有真，2003：257-259）。

⁹ 林也承認他還沒有找到替代民族國家的權力形式（林志弦，2002：201）。

¹⁰ 柳在建認為對民族主義的批評者只看微觀層次的問題，但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重視微觀層次與宏觀結構之間的關係（柳在建，2002）。

利益的民意下壓制民主主義的發展。民族國家的建設和加強不是民族主義的最終目標。我們應該把民主、自由、平等普遍理想作為更高的目標，並且把民族看作實現這種理想的空間。民主化的程度越低，民族主義壓制民主主義的情況越容易發生。

可是，由於過去十幾年南韓已經進行了比較廣泛的民主化運動，這種情況很難出現。比如，以前南北統一往往成為被統治勢力加強自己的權力基礎的藉口，但現在這種邏輯已經很難被人接受。2000年南北首腦會談前後的情況很好地說明了這樣的變化。這個消息在國會議員大選的前一天發布，但卻出乎意料地給執政黨帶來了消極影響，執政黨反而敗給了反對黨。這種情況意味著普通老百姓能區分抽象的民族利益與民衆利益之間的不同，而不會為了增加抽象的民族利益無條件地支持執政勢力。南北統一已經不是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而只有在能夠推進民主主義的條件下，才會被接受。現在作為南韓民族主義最主要表現的反美運動也不應使民族之間的對立絕對化，而批評的重點應放在美國政府的政策。

但從實現集體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平衡狀況的角度來看，南韓的民族主義還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在韓國還存在著對其他人種的各種歧視行為。在全球化的加速趨勢中，國家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加大，南韓為彌補在一些行業中出現的勞動力不足問題，從東南亞幾個國家中引進了很多外籍勞工。但是這些外籍勞工的基本權利在南韓未能得到充分保護，而且一些南韓人對他們的歧視行為不亞於其他國家。這種情況往往成為對民族主義持批評態度的重要依據。在他們看來，南韓的民族主義由於具有很濃厚的有機體民族主義的色彩，容易引起對少數者的文化、宗教的歧視行為。在韓國的經濟地位已經上升到加入 OECD 的條件下，南韓的民族主義有可能成為對外擴張的工具。所以，南韓民族主義在維護自己利益的同時應為保護別的民族的利益作出更多努力。

但這些歧視現象不一定是民族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反而在缺乏健康民族主義的情況下，會發生更激烈的種族衝突。而發展健康民族主義可使人們更容易認識到應像要求自己的尊嚴那樣保護其他民族的尊嚴。而且，民族主義在一個國家如具有推動民主化的作用，這種精神也是可以對外產生影響的。同時，要注意改變在過去提到民族權利的時候只重視整個民族的權利，而忽視構成民族的民衆的具體要求的做法。這種做法往往會幫助統治集團壓制不同政見。比如說，反對美國的對伊戰爭時，我們既要反對美國的侵略政策，又要反對伊拉克的統治集團對民衆的壓制。

其二，在南韓還是廣泛地存在以集體的名義壓抑個人或各種各樣的少數集團的文化。在南韓，單一民族的說法具有很廣泛的影響，並且形成這種意識形態一定程度上與民族主義的興起是有關係的。在韓國，從宏觀政治層次來看，民族主義的這種消極作用已經大大減少了。但從微觀政治層次來看，這種文化的消極影響還廣泛地存在。在很多人看來，強調民族主義是只能對民主化產生消極影響的文化因素。當然，在集體單位的特徵比個人的特徵更被重視這一點上，兩者是很相似的。並且，有機體的民族主義確實加強兩者之間的關聯。

但是，民族主義也起過弱化這種傳統因素的作用。初期市民民族主義已經用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來代替了以血緣或者宗族為紐帶的傳統社會關係。現在，民族主義可以繼續起到擴散這種普遍理想的作用。目前來看，南韓民族主義在實踐中逐漸往市民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但從理論角度來看，沒有完全擺脫有機體民族主義的影響。所以，在提倡民族主義的時候，要明確民族主義不是以為血緣、種族特徵為紐帶的，而把擴大同一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自由作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應該積極引進環保、女性主義的觀點，再構成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概念。

在南韓，還需要能起到積極作用的民族主義。比如說，在以後進行南北統一的過程中，

為防止民族內部出現新的對立，還要依靠民族主義。¹¹只是這時候需要的民族主義不應該具有壓抑個人自由的作用，而要與民主，自由等普遍理想同步發展。所以，以後的民族運動要放棄將民族矛盾當作主要矛盾的想法。這種想法容易把抽象的民族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壓抑民衆的具體利益。如果存在主要矛盾的話，這應該是提高個人自由。民族運動也應為這個目標服務。

五、民族主義在東亞

目前，關於民族主義的爭論中的一個空白是民族主義對東亞地區和平的影響。其實，我認為在東亞地區，民族主義的對外表現往往比對內表現更危險。這源於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在互動中容易陷入有機體的民族主義的誘惑，因為這些國家大部分在種族，文化，宗教，歷史方面保持很高的同質性。因此東亞的民族主義與其他民族相比極具特色。這種特點使東亞的民族主義離開自由、平等的普遍理想，而具有加強不同民族之間對立情緒的傾向。其二，在東亞地區，從未有過建立以平等為宗旨的國際秩序的歷史經驗。過去，東亞的國際秩序是以中國為首的等級秩序。進入 19 世紀，傳統的等級秩序垮台了。為了彌補這些空白，日本試圖建立以自己為首的新的國際秩序，但這也以失敗而告終了。二戰以後，東亞地區始終沒有擺脫各種各樣的對立和不平等關係。

這樣的歷史背景是讓很多人為東亞民族主義興起而憂慮的重要原因。東亞國家在內部遇到很大困難的時候，容易想到利用民族主義滋長民族之間的對立以度過內部困難的做法。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民族主義對內部起到積極作用，我們也應該把民族主義看成是一種危險的思潮。對整個東亞地區來說，限制這種民族主義的影響力可能是減少對地區和平威脅的關鍵。

但是，如果在各個國家促進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相結合的話，那就可以大大減少這樣的危險。也就是說，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民族主義對東亞地區的和平也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民族主義本身也給國際和平帶來了比較積極的影響。健康的民族主義能夠使我們對地區的不穩定因素的增加保持警惕。如果我們把所有的社會政治問題歸納為個人自由的問題，很難對應由上述的傳統因素造成的民族或國家之間的對立。健康的民族主義在限制威脅地區和平的勢力，比如東亞地區各種各樣的軍國主義勢力方面可以起到很積極的作用。也就是說，東亞地區的民族主義要擺脫被國家主義束縛的局面，而為實現地區中的國家或民族之間的和平共處而推進民主發展。

參考文獻

¹¹ 林志弦主張追求和平共處比統一更為重要（林志弦，2002：200）。

- 權赫範，2000，《民族主義和發展的幻想》，Sol。(韓文)
- 金東春，2002，〈市民運動和民族、民族主義〉，《市民與社會》，創刊號。(韓文)
- 樸魯子，2002，〈挑戰民族主義的神聖不可侵犯〉，《當代批評》，夏季號。(韓文)
- 柳在建，2002，〈統一時代的改革與進步〉，《創作與批評》，夏季號。(韓文)
- 尹建次，2002，〈民族、民族主義論述的光與影〉，《當代批評》，夏季號。(韓文)
- 林志弦，2001，《意識形態的內部》，Samin。(韓文)
- 林志弦，2002，〈再說一遍：民族主義是背叛〉，《創作與批評》，秋季號。(韓文)
- 鄭鉉柏，2003，〈和平運動與民族運動〉，《2003年和平會議（韓國人權財團）》。(韓文)
- 鄭有真，2003，〈反美和反戰是不是相衝突？〉，《當代批評》，春季號。(韓文)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 Hobsbawm, Eric.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98.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8.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Political Change of South Korea*

Hee-Yeon Ch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Sungkonghoe University

1.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Complexity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Battle Line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ivil society concept became a quite popular one. In this process, many presupposed that the civil society is quite a homogeneous entity. The civil society, formed 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 to the modern society, has dual characteristics: one is public sphere which has been liberated from the pre-modern state's control and has autonomy against the state, and the other is bourgeois society in which the market and capital have been liberated from it. The former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market society, while the latter as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narrow sense. Considering these dual characteristics, civil revolution has been an incident of birth of 'public' civil society¹ on the one hand and a market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liberated from the absolutist state's grip. The freedom as a main slogan of the civil revolution meant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market from the state and political-social freedom of civil society from the state. In this sense, a modern individual is a bourgeois individual and a public citizen as well.

The civil society is a complex reality. In a sense, it covers all the residual area excluding the political society (the state). In the civil society, there are divers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 think there are three battle lines: the battle line around democracy, around class, and finally around the life world.

The modern democracy is a new political regime emerging from such a new condition as the citizen and civil society has got an autonomy independent from the state. The separ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from the (absolutist) state comprised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al regime. After the civil revolution, the democracy has become a standard political regime and a universal principle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regime. However, thereafter, the modern democracy has been threatened by the repressive state, presiding over the people as a monarch and regulating the civil society in its way, although democracy remained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Korea and Taiwan Compared.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 Academia Sinica, July 23, 2003 Taipei, Taiwan.

¹ The public character implied in the civil society was paid attention to by A. Gramsci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nd later J. Habermas in his early discussion on the public sphere (Habermas, J. 1986. "Public Sphere," in Steven Seidman ed., *Jurgen Habermas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A Reader*, NY: Beacon Press).

politics. The authoritarianism, left or right totalitarianism, Fascism and other repressive regimes tried to refut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and ‘feudalize’ the civil society in its way.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is formed between the state inclined to threat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autonomy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civil forces organizing struggle against the violence and repressiveness of the state. When the state emerges to threat democracy, citizens become an oppositional subject and perform the struggle to defend or recover it.

However, the civil society is not a homogeneous entity. The civil society is divided along the class line and, in its result, the state has a class character towards the class division within the civil society. As Marx said, the modern society is the first one, which argued its autonomy from the state but is one which is always divided into hostile relation of capital and labor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vil society.²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20th century, the people’s oppositiveness and dynamism has been expressed in the diverse forms against this class division and inequality. I call this expression class activism. This class activism has been expressed such forms as the social-democratic stream and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stream as well in the 20th century context. This kind of battle line can be called ‘class battle line’. By the help of struggle in this class battle line, the democracy has gradually changed to become an economic democracy and social democracy, going beyond a simply political formal regime. Democracy became reinterpreted as not only political procedure but also social-economic contents of equity.

In addition to this class cleavage, in the civil society there are diverse kind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scriminations, which cannot be reduced to class ones. Around this line, the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groups are in conflict and tension. These kind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the life world are conditioned and reproduced by the economic market situ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state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find examples in such cases as ethnic conflict, patriarchic relation, homosexuality, ecology and so on. Around these issues, the subordinate group has struggled against existing discrimination or social establishment. In this proces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subordinate group and individuals has been empowered. I would define the field in which these kinds of struggle happen as ‘life world battle line’, that is battle line over life world issues.³ This battle line has remained marginalized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in which democracy battle line and class battle line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front. However, the May revolution in 1968 and civil right movemen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in America. In this period, the civil activism has been expressed in diverse forms and over diverse issues untouched in existing social movement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above, the modern civil society has democracy battle line over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lass battle line over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within the civil society, and life world battle line over other soci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diverse social groups. These three battle lines are an area in which strategic actions for hegemony

² Although Karl Marx admitted that the civil society is a complex entity, he defined 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e civil society as dominant one predominating the individual’s life. The commodity relation conceals the real essence of the civil society, which stands on the class-exploitative rela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To him, the main task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dissect the civil society (MECW, Vol. 5, 50, 89).

³ I borrowed the life world from Habermas,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 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and counter-hegemony conflict each other in Gramscian sense. (See Table 1)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Battle Lines in the Civil Society

	Character of the battle line	Character of the conflict
Democracy battle line	Democracy regarded as a universal principle of modern political regime and politics. The state inclined to authoritarianism and civil society trying to defend democracy	Authoritarian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struggle of the civil society against it, union of the diverse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ces cross-cutting class cleavages
Class battle lin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Class activism over economic inequality, social-democratic and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stream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Life world battle line	Diverse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discriminations	Struggle of the subordinate group over a certain discrimination and repression. diverse civil activism

The social movement is organized type of expression of activism in the civil society. Diverse social movements problematize issues related to these battle lines and organize the people's activism around these battle lines. When a certain social movement receives popula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a certain issue can be brought to the front and can be put into an urgent agenda to be resolv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las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civil society can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 civil society is 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Third World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Western societies. As a result, democracy itself can take a different content,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activation or de-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its consequent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Unless there is activated civil society standing against the state and regulating the inclination of the state towards authoritarianization, democracy can sustain itself well.

In the Third World,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don't develop themselves from endogenous origins. To the contrary, democracy is transplanted into the native context by the overwhelming power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For example, Korea was liberated from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1945 and was put under the rule of U. S. A. In the process, South Korean constitution was legislated, following that of U. S. A, which included basic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chieved through hundreds of people's struggle from below. Considering this, we can say that the formal and legal sense of the civil society was formed around the period of Independence. However, the empowerment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which sustain the democra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was not mature. Thereafter the civil society existed only in the formal and legal sense and was continually nullified and dwarfed. In this sense, we can say abou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formal and legal sense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substantive one. As I will describe below, the formal and legal sense of the civil society was repressed and refuted under the authoritarianism, being recovered in the process of struggle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2. The State-Civil Society Rel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after Independence

After the Independence in 1945, Korean society ran into harsh struggle between diverse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ces over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nation-state. This struggle developed to become the civil war. After the armistice of the Korean War, Korea was divided into socialist North Korean and capitalist South Korea in which anticommunism became a kind of pseudo-consensus and people could be regulated in the name of defeating communism. I call this kind of a new situation, based on distor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by anticommunism, ‘the anticommunist regimented society’.⁴

The anticommunist regimented society means that oppositional potential was destructed and the power of the civil society sustaining democracy was disintegrated. In this process, the self-sustaining power of the 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was weakened. In the name of anticommunism, the formal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have been ignored and the civil society and citizens are de-activated. As a result, the state recovered its power inherited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A kind of over-developed state emerged.⁵ In this period, the market society as one aspect of the modern civil society has not developed and the weak economic base has been destructed during the Korean War. In this sense, the relation among the state, market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narrow sense in the 1950s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strongly repressive state-undeveloped market (society)-extremely dwarfed civil society’

Under this kind structure, there has been a low level of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in the 1950s. Only low level of political issues including corruption of the high level public officials and unjust election, which can be raised even from the transplanted democracy’s viewpoint, not from radical viewpoint, has been tackled by people in an ‘unorganized’ way. The class battle line couldn’t be brought to the front, because progressive social movements including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has been harshly repressed in the name of anticommunism. Progressive discourses touching on class issues or ideological issues and hinting radical implication have been punished or marginalized from the public discourse area. As a result, in the case that there are not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ces representing and problematizing class issues, the class battle line could not be existent. Many issues related to the life world battle line were not even raised and totally marginalized. General people did not even think such issues as problematic.

In a short, the transplanted democracy was nullified and has existed only as a formality of the political regime, not substantive rule regulating the state’s power abuse or violation of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because the civil society has been dwarfed and de-activated by the anticommunist regimented social situation.

⁴ Hee-Yeon Cho. 1998. *The State,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Dangdae* (in Korean); Hee-Yeon Cho and Bob Jessop. 2001. “The Listian Warfare State and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 Mobilization Regime in the East Asian Anticommunist Regimented Society,”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In Search of East Asian Modes of Development: Regulationist Approaches, University, Taichung, April 19-20, 2001.

⁵ H. Alavi. 1972. “The State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New Left Review*, July and August.

3. The State-Civil Society Rel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under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The Korean political regime has changed to authoritarian one in the early 1960s. The civilian government, albeit authoritarian in many ways, was overthrown by the military coup de' tat in 1961. The new military regime was inheriting the 1950s' regime in that it has used anticommunism as a main ruling ideology. However, it was different in that it brought development to the front in the dominant discourse. In a sense, it tried to organize a new rule in a way of combining existing anticommunism and a new developmentalism. It conserved the former regime on the one hand and 'innovated' it with developmentalist ide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from the early 1960s continued to repress and try to dwar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name of anticommunism and mobilized the whole society in the name of growth, which in turn provided a favorable condition to capital and market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enforced a developmentally oriented policies, giving every kinds of subsidies to incipient industries and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allocating the economic resources, especially finance, to the 'strategic' industry areas, and encouraging the growth of undeveloped market in its result and so on.⁶ We can say that the regime in 1960s was a repressive and mobilizational one to the civil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and supportive and encouraging one to the market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there has been a friendly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market and an opposi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is sense, we can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a unique relation of 'strongly repressive state-rapidly growing market supported by developmental state-highly repressed civil society by dictatorial state' during authoritarian period from the early 1960s to 1987.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Korea enjoyed high autonomy of policymaking coming from the 'over-developed state' reproduced by strong anticommunism and colonial state traditi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uld control finance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y tools, because all banks have been under the government' influence.⁷

In addition to control of the civil society by the help of anticommunism and its co-optation by the help of developmentalism, the great growth under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has been helped by 'external' condition. Under the so-called 'umbrella of Cold-War',⁸ Korea could get enjoy to low-price market of U. S. A. and foreign finance.

Like this,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civil society has been dwarfed by the dictatorial state armored by anticommunism and co-opted by developmentalism, democracy could sustain itself even on the formal level.

⁶ The so-called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found a good example in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in 1960s and 1970s. Johnson, Chalmers. 198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Frederi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⁷ Refer to Johnson, Chalmers, *ibid*.

⁸ Arrighi. 1996. "The Rise of East Asia: World Systemic and Region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16(7).

However, this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began to be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by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The civil society began gradually to be mobilized in an opposition to contradictions of development and dictatorship.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was headed by organized anti-dictatorial social movements, including militant student movement, intellectual movement, labor movement and so on.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came to crisis of disintegration.

The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giving impetus to crisis of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has been expressed on the three battle lines. Firstl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has been activated against increasingly dictatorial and repressive developmental state. People said in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that democracy does not feed people. They were ready to sacrifice democracy in return for rice. However, people began to change their attitude to dictatorship and say that we could not live only with ric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on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expanded to various classes and strata, including urban poor, working class, students, intellectuals, peasants and even upper middle class. In this democratic movement, institutional politicians, including former Assemblypersons like Kim Dae-Jung and Kim Young-Sam, began to join. In the process of opposition against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huge sacrifices were made.⁹ The general picture of such sacrifices can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2.

Table 2. The Dead and Missing in Gwangju People’s Uprising and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in the 1960s, 1970s and 1980s

	Dead		Missing	
	Gwangju People’s Uprising	Other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s	Gwangju People’s Uprising	Other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s
	270	161	12	64
Subtotal	431		76	
Total	507			

Source: Deliberation Committee on Honor Restoration and Compensation for Those Involved in the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Civil society repressed under the anticommunism and developmentalism began to be activated popularly along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and threaten the military regime towards retreat. Now the demand such as recovery of democracy became a popular spirit and everyday life discourse. Because demand for the recovery of democracy has overwhelmed other issues, we can say that, in a sense, three battle lines converged over democracy battle line.

Secondly, the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was also a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of the class movement. The repressive developmental state intervened even in the strike and collective

⁹ The more concrete can be referred to Hee-Yeon Cho, 2002, “Sacrifices Caused by State Violence under Military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Dynamics of Settling the Past during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Korea Journal*, Vol. 42, No. 3, Autumn).

behavior demanding wage raise and betterment of the working condition and repressed them 'politically'. As a result, even economic struggle became politicized and developed to be a kind of polit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A new contradiction of development itself ironically gave rise to growth of class movement against it. In Korea, we called it 'people's movement' (Minjung movement). In this sense,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movement, not only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against dictatorial regime but also class battle line against developmental regime emerged and strengthened.

Around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in this period, we could see such phenomena as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ians, excluded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arena, in the street fighting and, as a result, merge of the so-called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d movement politics, emergence of radical dissidents and class division in the social movement, and convergence of diverse oppositional movement onto anti-dictatorship under the hegemony of radicals. I called it 'centripetal deepen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 sense, three battle lines were converged onto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as central, because people regarded dictatorship as preserving the class inequality and other social discrimin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opposition against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a new opposition movement emerged and developed against a new contradiction of the life world, which development brought newly with it. Women's movement, environmental movement, movement against cultural conservatism,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omosexuality and so on, would be examples. Although these kinds of movement began to emerge, they were marginalized and were overshadowed by the urgent necessity of opposition against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In this sense, we can say that the life world battle line stayed as a marginal movement in the authoritarian period.

This multi-layered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put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on the verge of breakdown.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challenges to dictatorship came also from the market society. Many market actors, especially Korean big Chaebol, which already fully grown, challenged the arbitrary and dirigiste control of the market and business by the state. As above-mentioned, the civil revolution represented two demands such as strong control of the market by the state on the one hand and repressive control of the civil society by the state on the other hand. In South Korea,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cluded the market's demand for more autonomy and de-regulation, in addition to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We could see a new relation among 'the state losing, albeit strong, the existing power of control-expanded and strongly grown market under the special privilege-oppositionarily activated civil society' in the mid-1980s. Contrary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old landed oligarchy was weak, bourgeoisie was not developed and working class and popular sector were not activated in the 1950s, bourgeoisie became strong, the working class and popular sector were strongly activated in the mid-1980s.¹⁰

¹⁰ Hee-Yeon Cho and Eun Mee Kim, "'State Autonomy' and its Social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Eun Mee Kim ed., *The Four Asian Tig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8.

4. The Rise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climax of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was Great Democratic Struggle in June 1987. In this upsurge for recovery of democracy, democratic movement became a nationally popular movement, which meant that formerly submissive civil society became subjectified and mobilized oppositionarily. Before I divided formal and legal sense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substantive sense. Through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experience of Great Democratic Struggle, the civil society could exist in the substantive sense. In a sense, Korean people were reborn as modern individuals in this process. Aftermath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the citizens were not what they used to be. They refused all-mighty repressive dictatorial state and power abuse and violation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y became already politically conscientious to demand the universal rights recognized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is meant empowerment of the civil society against authoritarian state to sustain democracy.

After the Great Democratic Struggle, the former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began to change to democratic regime. So-called democratization 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started. The road or way of democrat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is that of ‘conservative democratization from above’, in which the authoritarian forces did not lose the initiative in democratic reform and has kept the state power in a certain level, while the other is ‘radical democratization from below’, in which the opposition forces defeat the authoritarian forces and dismantle the former authoritarian ruling regime, performing the radical reform of the state and market. In the South Korean case, the way of conservative democratization from above has become dominant. In concrete, the former military forces have defeated the opposition forces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December 1987. The military coup d'e-tat government changed to electoral military government led by Roh Tae-Woo.

Briefly introducing the Korean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military regime changed in 1987 to electoral military government. In 1990, the military dominant party merged with two opposition parties, so-called ‘Three Party Merger’. In this event, Kim Yong-Sam, opposition leader, could become a candidate of the new dominant party, Democratic Liberal Party, and finally defeated opposition candidate, Kim Dae-Jung,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1992.

Kim Yong-Sam government, the first electoral civilian government in 30 years, has enjoyed nearly 90 % support in the early stage of its reign. However, it has got confronted with oppositions from both the conservative and progressive forces in the mid and late stages. Helped by being confronted with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nd gone under the IMF bailout system, Kim Dae-Jung could w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December 1997. It meant that, after nearly 30 years’ authoritarian period, the first opposition party government emerged. If we divide the stag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fter 1987, the first includes Roh Tae-Woo government (1988-1992) and Kim Yong-Sam government (1993-1997), in which the former authoritarian forces did not lose their initiative in the democratic reform. However the second stage includes Kim Dae-Jung government (1998-2002) and the present Roe Moo-Hyun government (2003-), in which the former opposition forces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ones. In this second stag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and relations within the civil society has changed more comprehensively than in the first

stage.¹¹

With retreat—albeit done in the way of conservative democratization from above—of the military forces in 1987, more freedom to people, more provision of basic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direct vote of the president and so on were given after the Korean civil revolution. Thi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fter 1987 implied dual aspects. One is weakening of repressiveness of state over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the other is weakening of dirigiste control of the state over the market(society). If the former can be calle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latter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is parallel to dual aspects of the civil revolution in Western societies. Of course, weakening of the state's repressiveness did not mean dismantling of all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and personnel. To the contrary, if we see the Korean case, the former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and personnel have been reserved.

Benefits coming from weakening of the state's control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provision of more freedom in every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were not given not only to social movements but also to interest group, conservative media, occupational groups and so on; not only to progressives but also to conservatives. The latter tries to preserve their own status quo and establishment, including occupational interests, utilizing the new condition of freedom. In Korea, conservative media tried to preserve establishment on three battle lines and encourage ideologically conservative forces on all levels.

After recovery of formal democracy after 1987, there are two conflicting streams. One tried to expand democracy to diverse areas, e. g. economic and social democracy, confron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other tried to conserve the establishment with minor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democracy. These two streams conflicted each other on three battle lines.

Table 3. Dual Aspects of Democratization

	Sub-process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creasing autonomy	Weakening of the state's control of the civil society, expansion of autonomy of the 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creasing openness of the state to demands of the civil society, expans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oads and space by which demands of the civil society are accept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creasing autonomy of the market	From the formerly dirigiste way of state intervention to increase of market autonomy, expansion of privatization and lift of political limit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and so on
	Opening to foreign world	Removal of limitation on entry of foreign capital to domestic market, opening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the Primary Industry as well

One important point in transition after 1987 is that democratization on the domestic scene went

¹¹ Concerning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post-1987 transition and changes, refer to チョ・ヒヨン (曹喜詒), 2003, 〈盧武鉉政權成立の歴史的意味—市民社會運動の視點から〉, 《世界》, No. 717, August.

along with globalization. Formerly the developmental polic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had an orientation of protectionist developmentalism. From the 1980s, this policy changed to a kind of ‘open developmentalism.’ Although this policy was pressed by America and foreign capital, this policy was regarded as an exit from debt crisis and over-investment and malfunction of Korean economy from domestic viewpoint in the late 1970s.

Let us analyze changes in the three battle lines aftermath democratic transition. Unlike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we can define dynamism of the civil society occurring in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as its ‘subjective activation’. Formerly the dynamism of the civil society has been expressed in oppositional energy against dictatorship. However, new dynamism of the civil society has been expressed in the way of problematization of untouched issues, expansion of organization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to every social areas(including public officials), increasing collective behavior to achieve demands or interests and so on. As people began to be liberated from the fear of association, public interest-oriented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oriented organizations increased sharply. This change can be described as subjective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The subjective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wa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movement for reform of former authoritarian or dictatorial regime. Because target of struggle on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was recovery of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procedures, intensity of such a battle line was weakened after recovery of democracy. However, even after the formal democracy was recovered, reform of the former dictatorial regim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f a new regime were not tasks solved at one time. As a result, the dynamism of the civil society on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was expressed in movement pushing the more fundamental reform of the former regime. However, because the institutional space and passage have expanded, the dynamism of the civil society for reform wa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utilizing legal measures like public litigation, petition to Constitution Court, administrative suit and so on. In a sense, we can say about institutionalized dynamism of the civil society.

After 1987, this activation spread to diverse social areas and, as a result, diverse kinds of so-called 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organized; Korea Women’s Association United in 1987, Citizen’s Coalition for Economic Justice in 1989, 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1994, Korean Fe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in 1994, Lawyers’ Association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1988 and so on. After the democratic upsurge,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was expressed in activation of association. As you can see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he 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unded after 1987 is 55.8% in the NGO Directory 1997 and the ration after 1980 is 78.1% in the NGO Directory 2000. This shows that democratization brought with it high increase of association activities.¹² (See Table 4)

¹² 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PSPD), which I, by myself, have been involved in its founding, started only with 5 full-time staffs and now it includes about 60. It signifies activation of the Korean civil society (Refer to Hee-Yeon Cho and Park Won-Soon, 2002, “Democratic Reform and Civic Movements in South Korea,” *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 Vol. 12).

Table 4. Foundation Year of Korean NGOs

		NGO Directory 1997	NGO Directory 2000
pre-1960s		7.7	5.7
1960s		10.3	7.2
1970s		11.0	9.0
1980s	80-86	15.0	29.4
	87-89	14.4	
1990s	90-92	17.7	56.5
	93-96	23.7	

Source: Cho, Hee-Yeon, 2000, "The History,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Korean NGOs," what is NGO, Arche (in Korean).

Secondly, we can see a subjective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around the class battle line in the form of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movement including the labor movement. Under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the state violence mainly targeted militant people's movement, along with student movement that stood at a forefront in opposition against dictatorship. According to weakening of the state repressiveness and provision of relatively free spac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by the help of democratization, formerly illegal movements became semi-legalized or legalized on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aspect, Korean trade union movements developed to found Korea Nation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in 1990, covering mainly blue-collar workers' unions, and 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1995, covering the big company unions, middle class unions and blue-collar workers' unions. This would be a 'benefit'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brought with democratization. However, people's movement has to be confronted with another aspect of democratization, that is 'disast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hich was more strengthened by the global stream of neo-liberalism. With the concept of disaster, I would indicate new phenomena such as flexibilization and irregularization of labor forces up until reaching 58% in 2002, 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ies and so on. With fundamental opening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the agricultural self-reliant base broke down. Progress of UR and establishment of WTO gave strong pressure for more opening and removal of barrier to free movement of capital to Korean economies. The famous general strike in the early 1997 against detrimental amendment of the labor law, which was aimed to ease lay-off and dispatch of labor force to business, could not stop the neo-liberal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policy orientation of Korean government.

Thirdly, the subjective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was sharply expressed around the social cleavages. Along with expansion of free political and social spaces,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could get more easy access to public discourse area. Many unproblematized issues were re-problematized in this process and began to get public attention; human right issues, homosexuality, patriarchic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 of the handicappe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life world, issues related to consumption and life and so on. Diverse 'civic activism' has been expressed in this life world battle line.

5. Second Stage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Change in Civil Society Battle Lines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the emergence of Kim Dae-Jung government in nearly 50 years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IMF bailout in 1997 were a turning point to the second stage of democratization. New establishment of opposition party government in nearly 50 years gave a chance for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o be upgraded with the result of more autonomy and partial institutionalized coopt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demands, shown in the Table 5. However, this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ent along with expand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precipitated by necessity of overcoming economic crisis. On the one h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ivil society could mobilize more uninstit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demands. The space for agendas of the civil society to be realized expanded. Government was more open to civil society's demands and agendas.

Table 5. Change in the Battle in the Civil Society after 1987 and 1997

	After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After opposition party government/economic crisis
Democracy battle line	Expansion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by the help of increasing autonomy of the civil society. Expression of demand of reform via institutionalized road	De-activation and de-politicization of some part of the civil society movement(co-optation). new expression of dynamism by the help of heightene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Class battle line	Tension between 'benefit'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disast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upgrading itself to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mitigation of militancy of the former movement by the help of co-optation of some issues and a partial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against expansion of 'disast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Life world battle line	Marginalized issues paid attention to more and more, utilizing the space given by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Many marginalized issues being a main issues of social movement, sometimes becoming hot issue publicly

Let's see what kind of change is happening under this new situation. On the democracy battle line, we could see de-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and its new acti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start of Kim Dae-Jung government, many civil society agendas were absorbed to become government policy agendas, enforced from the above. In these agenda areas, social movements could not but support the government reform policies and, in return for support, demanded more fundamental reform to the government. Some NGOs, covering formerly militant oppositional figures, were regarded as new pro-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example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done under the Kim 'government, we can suggest examples such as establishment of Ministry of Women's Affairs,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ripartite Com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labor, Truth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suspicious deaths under the dictatorship, legislation of Anti-Corruption Act and so on. Even Act on honor restoration and compensation for those involved in the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was legislated. In addition, Kim Dae-Jung government tried to reform Korean big conglomerate and enforced reform package policies on Chaebol. According to this acceptance of the former agendas of the civil society,

we could see a partial de-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such areas. This is a kind of dilemma to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¹³

However, along with this, the civil society was newly activated around new issues by the help of expanded free political and social space of activities. Blacklist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 politicians received strong popular support.¹⁴ Media reform movement, campaign for disintegrating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universities, medical reform to institutionalize a new divis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harmacist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specialized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the latter in sale of medicine. These kinds of new campaign were paid hot attention to from the general people.

Secondly, in the class battle line, a complex situation was made. In its early stage, Kim Dae-Jung government founded a new institution, that is Tripartite Commission as a kind of 'corporatist' one. This institution was made not only by the help of reformative character of opposition party government and but also necessity of capital-labor conciliation to overcome the urgent economic crisis as well. In this commission, legalization of Teachers' Trade Unions and expansion of social security infrastructures and flexibilization of labor market were trade off unfortunately.

Kim Dae-Jung government tried to sell many public-owned enterprises to the private capital and invite foreign capital in the way of lifting possibl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 the name of overcoming the foreign debt crisis. Privatization and opening of Korean economies were advanced highly under Kim government. We can say that high-level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has been driven by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addition, emergence of opposition party government brought with it effect of mitigating militant mobilization of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Because of this, in its early stage of Kim government, the labor movement could not show militant activation which continued to be one of its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according as neoliberally oriented economic policies gave rise to miserable consequences such as '20 vs 80 society', lay-off of millions of laborers with nearly 10 % of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being put in a unstable irregular laborer in the name of labor market flexibilization and so on, the militancy began to be recovered in the mid and late stage of Kim government. As definition of Kim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ies as dependent neoliberal has been accepted in the labor movement camp, the struggle was identified as

¹³ Under the Roh Moo-Hyun government(the second opposition party government) inheriting Kim Dae-Jung government, social movements get confronted more and more with high level of dilemma of this kind.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is kind of dilemma, I argue that social movement should be more radicalized in their view responding to 'normal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means that 'liberal' 'democratic'—of course rationalized capitalist—state is replacing the former authoritarian state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Hee-Yeon Cho, 2003, "Normal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Radicaliz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Citizens and the World*, No.4).

¹⁴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April 2000, 86 politicians were blacklisted as corrupt and 59 were defeated among them. The rate of defeat was 68.6%. I define this kind of active role of the civil society movement as 'proxy representation' in response to 'political lag'. That is, the civil society movement is doing a role of the pseudo-party, because the political parties are not doing their proper representative role. Refer to Hee-Yeon Cho, 2001, "The Political Reform Movement in the Civil Society and Nakchon-Nakseon Movement," Pal-Moo You and Jeong-Hun Kim eds., *Civil Society and Civil Movement* (2), Hanul (in Korean).

struggle against neo-liberalism. On this mood, 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defected from the Tripartite Commission symbolically. These two aspects, partial de-activation as a result of ‘benefit’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new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labor movement as a result of ‘disast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co-existed under Kim government.

Thirdly, under Kim government, many marginalized issues in the life world began to be brought to the front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and within social movement camp. Actually issues in the life world could not receive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media and populace. However, under Kim government, many issues were widely reported even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accepted as problematic from the general people. Such issue as public shirking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freedom of conscience could not be raised publicly and paid attention to before. Many examples such as conscientious refus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lift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universities, protection of privacy right, critique of digital divide, campaign to conserve screen quota in the name of ‘cultural exception’, medial reform including anti-Chosun campaign, campaign for civic participation righ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and so on, could be found under Kim government, that is under the second stage of democratization. According as anticommunism and developmentalism which existed as pseudo-consensus has weakened, repressed issues under their influences increasingly became problematized and brought to the public discourse area. Alo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ome issues could be resolved in an institutionalized way.

As mentioned above, we could find that the character of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changed from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to subjective activation. (See Table 6) In addition, we can say that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democratization but democratization brought with it a new context which made dynamism of the civil society expressed in a different form.

Table 6. Change in the State-Civil Society Relations and Battle Lines in it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Under the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After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Emergence of opposition party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crisis in 1997
State change		Repressiveness armoured by anticommunism and developmentalism	Democratization as dual process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Upgrading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clud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issues,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cluding high privatization and opening economies
Civil society change in general		Oppositional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Subjective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Partial de-activation and new subjective activation
Battle lines within the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battle line	Centripetal deepening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politicians joining the movement politics, emergence of radical dissidents, and convergence of diverse movements on anti-dictatorship	Expansion of free space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dynamism of civil society expressed in the institutionalized road. new expression of repressed demands	Selective co-optation of civil society agendas by the help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s a result, de-activation in certain areas. new insurgence of dynamism of the civil society by the help of heightened openness of government to civil society issues
	Class battle line	Increasing opposition against contradiction of dictatorship and development itself, expansion of militant people's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 movement by the help of 'benefit'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new sensitivity to 'disast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 kind of 'corporatist' co-optation of some issues in the form of Tripartite Commission. emergence of new militancy responding to 'disaster' of heighten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Life world battle line	Incipient emergence of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around issues in the life world, however marginalized	Civic dynamism expressed in diverse citizens' movement. issues in the life world which were increasingly paid attention to	Formerly marginalized issues, brought to main public discourse and new expression of 'civic activism' against the former establishment

Labor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Korea: Gains and Losses*

Yoon-Kyung Lee

Doctoral Student, Political Science, Duke University

To include labor movements as a component of civil society can be a controversial issue,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discourse develop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Western democracies where labor movements are treated as “old social movements” that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force. In the context of democratizatio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Korea (and in Taiwan), however, organized labor still deserves to be discussed as a part of civil society.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can be variable as many as the number of scholars who study it, but it is broadly understood as the social sphere outside of the established stat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rofit-seeking business organizations. If the core nature of civil society in democratizing polities can be defined from its endeavor to challenge and transform the previous authoritarian state apparatuses and business behavior,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definitely fits into the realm of civil society because it has been a social movement to democratiz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Korea.

Korean workers, though not always successful, have continuously fought for thei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for political freedom in the process of Korean democratization. Although they were not the key societal actor to lead the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in the late 1980s, they were surely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not to mention that worker rights was one of the key agendas in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1987. And as many of us have painfully learned since 1987, democratic transition as the resumption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is jus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to democratic politics, not the end point of it. With the opening of political space,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advanced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building of democracy, especially in order to democratiz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is context, organized labor in Korea is still “young” and “contentious”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realm of civil socie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describe¹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s ami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past 15 years. It will discuss how democratization has affected labor movements and vice versa. Following this introductory remark, Section 1 will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movement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along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s that have undergirded them. The Second Section will discuss what workers and

*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Korea and Taiwan Compared.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CAPAS), Academia Sinica, July 23, 2003 Taipei, Taiwan.

¹ By using the word “describe,” I am explicitly saying tha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not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causal analysis of any sort but to present a decent descriptive argument that can be used as a firm basis for the former.

unions have gained in terms of wages and labor policy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Section 3 then will examine what contribution organized labor has made to the building of Korean democracy. The last section will conclude by arguing that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today stands on the borderline of civil society for democratic movements; if it fails to pursue public-good oriented democratic agenda, it will soon fall into the “old social movement” ridden by parochial interest-seeking and organizational ossification that has little to do with social progress.

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since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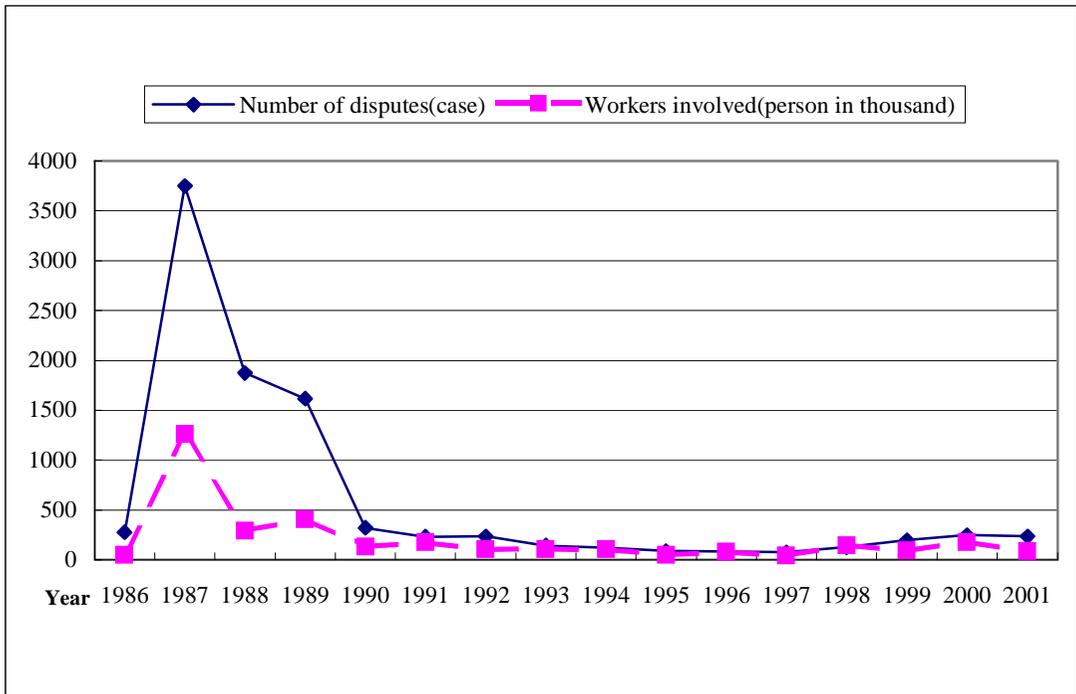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on labor movements, there are few disagreements that the opening of the political space in 1987 has positively affected the organizational growth of the labor movement, enhancing the socio-economic gains for workers. First of all,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June 1987 ushered in collective actions of workers and precipitated the organization of new and independent un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orkers' Great Struggle (노동자대투쟁), beginning in July and lasting through September of 1987, about 2.7 million workers in 4,000 unionized and un-unionized shop floors participated in a variety of collective actions, including sit-ins, strikes, rallies, and street demonstrations (Cho 1998: p.275-276). More than 1,300 new unions were organized by the end of 1987, marking 50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xisting unions (2,658 unions in 1986).

This upheaval in workers' collective action and organizing was something anticipated as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Korea relied on non-corporatist exclusionary labor control, which lacked an adequate mechanism to accommodate to workers' grievances that had snowballed along the years of conden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ng 1991). Although the state had co-opted a small portion of workers into the state-sponsored union (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 it had unilaterally excluded all unions from wage determination and other industrial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labor disputes and trade union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of 1987 clearly support the positive linkage between democratization and labor activism in Korea. In 1987 strikes peaked to 3,749 cases, involving more than 1.2 million workers (See Figure 1). In the ensuing years, workers' collective action subsided eventually only to resurrect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years, beginning in the end of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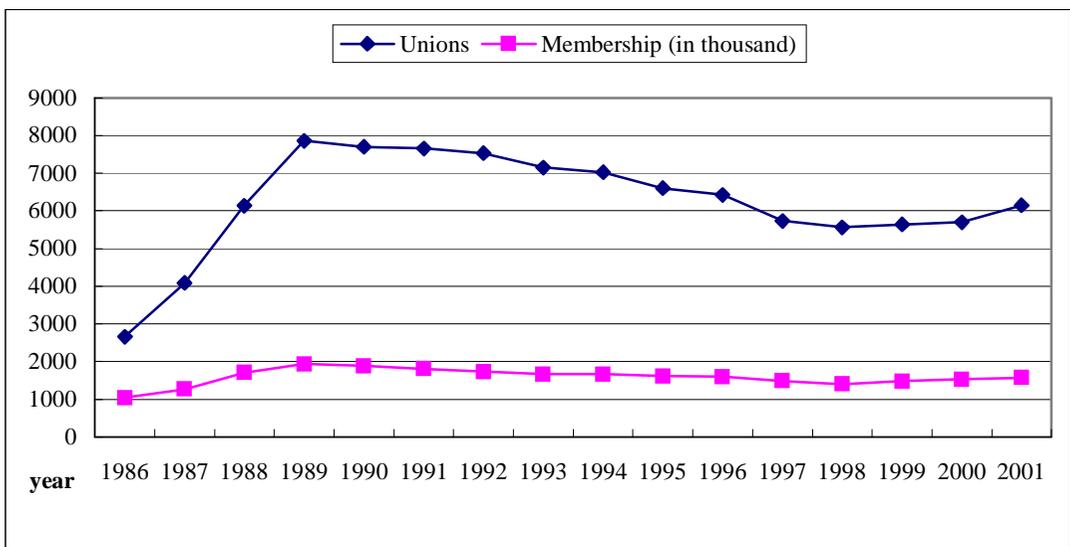
Against the monopoly of 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 (한국노동조합총연맹, hereafter FKTU) that had been politically and financially sponsored by the pa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new and independent unions were organized, adding the number of labor unions from 2,658 (with 1.03 million unionized workers) in 1986 to 6,150 (with 1.56 million workers) in 2001 (See Figure 2).

Figure 1. Labor Disputes and Workers Involved: 1986-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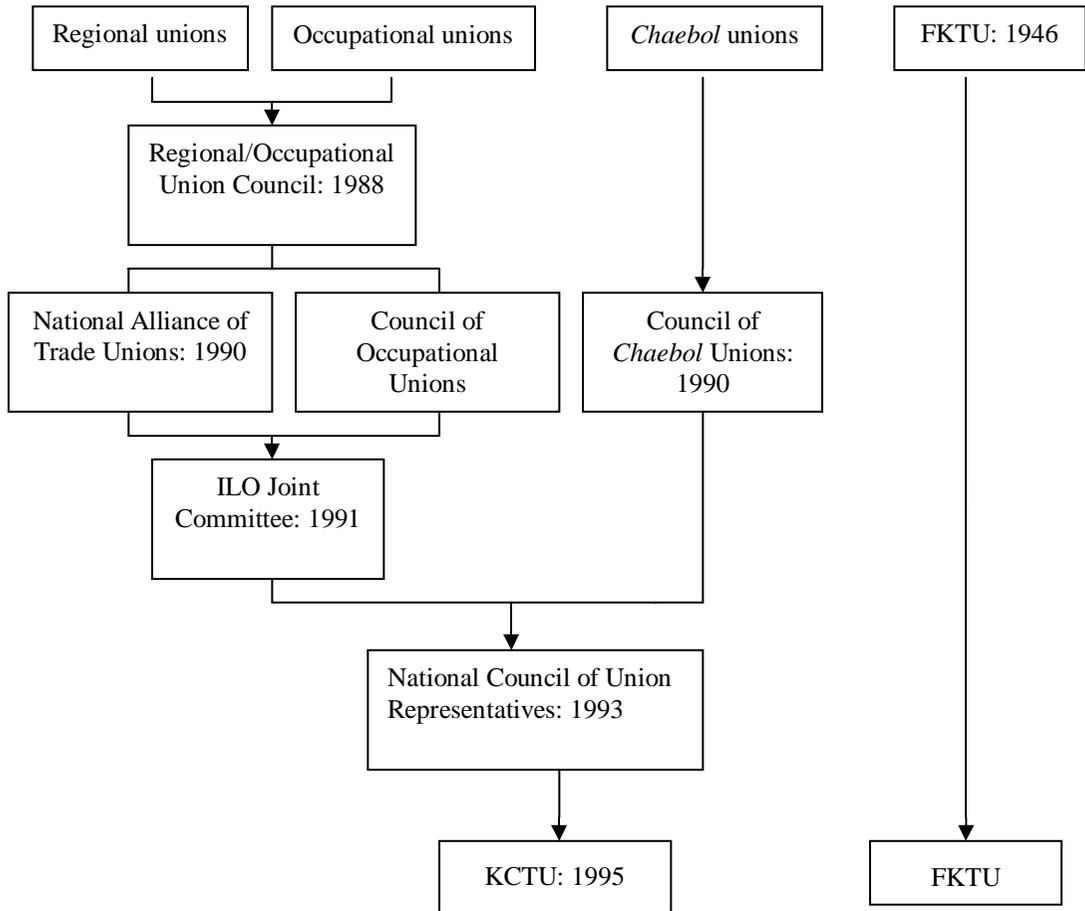
Sources: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Survey of Labor Statistics, different years.

Figure 2. Number of Unions and Union Membership: 1986-2001



Sources: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Survey of Labor Statistics, different years.

Figure 3. Organization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tic Labor Movement



Source: Park, D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rean Labor Regime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act: 1987-1998*. p.72

Notes: * The National Alliance of Trade Unions (전국노동조합협의회) was based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e Council of Occupational Unions (전국업종 노조회의) represented mainly white-collar workers; and the Council of Chaebol Unions (연대를 위한 대기업노동조합회의) was a network of new unions organized in large conglomer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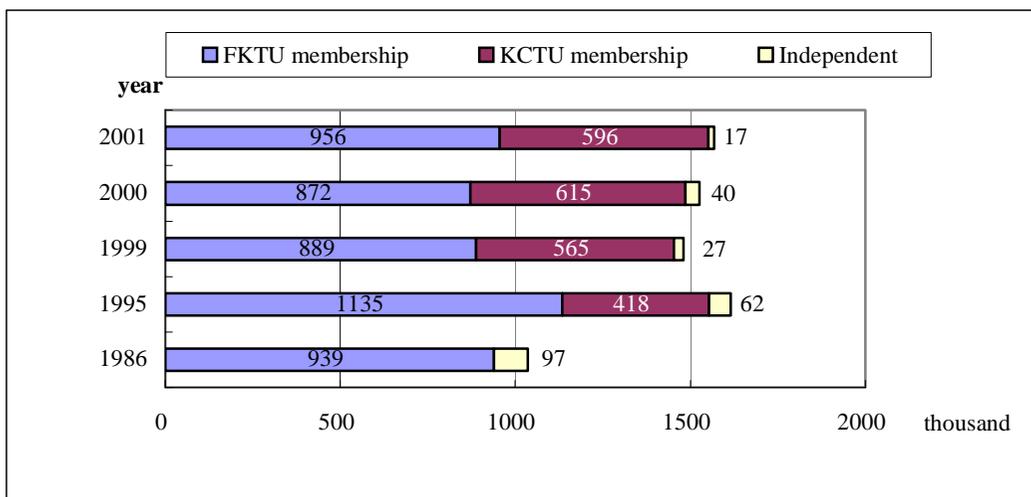
** The ILO Joint Committee (ILO 기본조약비준 및 노동법개정을 위한 전국 노동자 공동대책위원회) was an interim organization to coordinate union actions for labor law refor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LO recommendations in 1991.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Union Representatives (전국노동조합 대표자회의) in 1993 was precipitated by the wage agreement between the FKTU and the Korea Federation of Employers (한국경영자총협회) in 1993 and 1994. The most seriously hurt victim of this wage agreement, however, was the FKTU itself because it provided a momentum for all anti-FKTU unions to get united (and some of the FKTU unions to switch their affiliation to the democratic unions), eventually contribu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CTU in 1995 (Kim 1999).

The organizational efforts to form an alternative national labor center, which is termed as democratic union movements (민주노조운동),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orea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전국민주노동조합총연맹, hereafter KCTU) in 1995 (legally recognized only in 1997).²

Figure 3 shows the organization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tic union movement that eventually culminated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KCTU. One thing worth to be noted from this organization map is that the magnitude of *chaebol* unions and white-collar workers' unions grew significantly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mocratic union movement, overtaking the dominance of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unions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National Alliance of Trade Unions.

Figure 4. Membership Changes of the FKTU and the KCTU: 1986-2001



Sources: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Report of Trade Unions*, different years. *Annual Report of the FKTU and of the KCTU*, different years

The KCTU, which began with some 400,000 unionized workers as a second national labor union, has now grown to have some 600,000 members. Figure 4 shows the changes in the membership of the FKTU and the KCTU over the years. Some union activists predict that the KCTU may take up the position of the largest national union in a few years with the joining of a couple of federation unions that belong to the FKTU (interview with Jin-woo Ju). The recent decision by the Railroad Workers' Union (with 32,700 members) and possibly the Korea Financial Industrial Union (with 115,000 members) to switch their national affiliation from the FKTU to the

² Labor scholars who study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usually take the number of national unions as one of the indicators of labor strength (See for example Cameron 1984, Lange et al 1999). The smaller the number of national peak labor organizations, the better for power concent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organized labor when bargaining vis-à-vis government or employers. This assumption does not hold in the cases of democratizing countries when new democratic union centers are established against the yellow unions that were supported by the previous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such contex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ational unions may rather represent the growth of labor's strength.

KCTU (*Daily Labor News*, June 19, 2003)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such organizational catching-up of the KCTU. These Unions justified their decision by criticizing the FKTTU for being inadequate and largely dormant in representing the real interest of their rank-and-file union members.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union density, however,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experienced a short rise in the aftermath of democratic opening and an early and steady decline, now being stabilized around the pre-1987 level of 12 percent of total labor force (See Table 1).

This relatively low union density can be explained on two accounts. First,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s that the Korean economy has been undergoing since the 1990s brought about a steady shrink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combined with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sector (see Figure 5), which is quite a general trend throughout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in Korea was led by large conglomerates (*chaebol*), located in concentrated industrial cities, such as Incheon, Busan, Masan-Changwon, Ulsan, and Pohang. Labor movements in post-democratization were centered upon these physical bases. Beginning in mid 1990s, however, these larg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not only stopped recruiting new employees, but further went through structural adjustment which involved massive layoffs, out-sourcing, and relocation of production lines to other Southeast Asian cheap labor markets. The shrink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coincid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ervice sector, which is largely based on flexible and contingent labor. This process of structural economic change rapid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non-regular workers,³ depriving trade unions of their organizational basis. Therefore, despite the absolute number of unionized workers increased, the growing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combin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contingent labor has been keeping the union density at a low level.

Table 1. Union members and Union Density: 1986-2000 (in thousand)

Year	Union members	Union density 1	Union density 2
1986	1,036	15.5	12.3
1987	1,267	17.3	13.8
1988	1,707	22.0	17.8
1989	1,932	23.3	18.6
1990	1,887	21.5	17.2
1991	1,803	19.6	15.8
1992	1,735	18.3	14.9
1993	1,667	17.2	14.1
1994	1,659	16.3	13.5
1995	1,615	15.2	12.6
1996	1,599	14.7	12.2
1997	1,484	13.5	11.2
1998	1,402	13.8	11.5
1999	1,481	14.9	11.8
2000	1,527	14.6	11.6

Sources: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Report on Trade Unions*, different ye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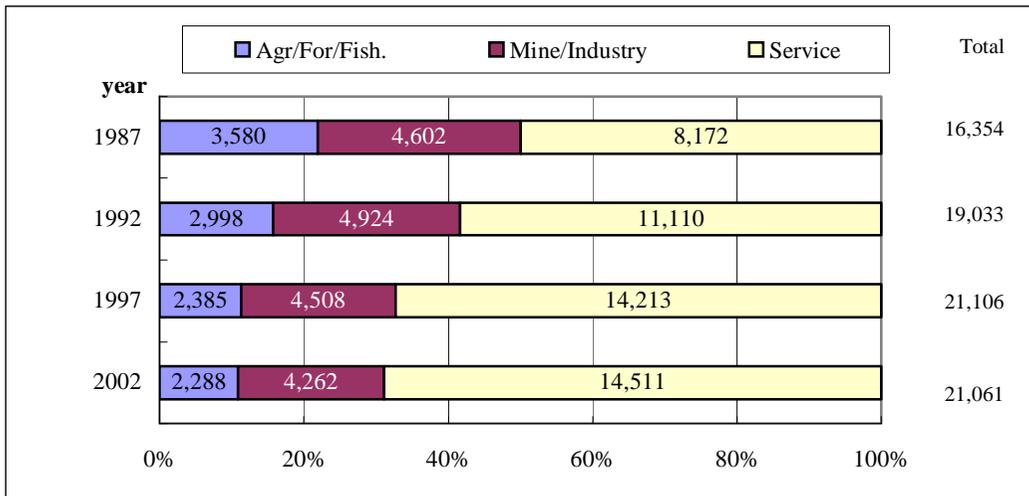
Korea Labor and Society Institute, *Global Labor Market Database: Korea*, 2001.

Notes: Union density 1 = (union members/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100.

Union density 2 = (union members/wage and salaried workers)*100.

³ According to the Korean Labor Standard Law, non-regular workers are those who have terminal labor contract (계약직, 일용직), those who are dispatched to different work locations (파견직, 도급직), or those who provide part-time labor (파트타임 근로).

Figure 5. Labor Force by Sector: 1987-2002 (in thousand)



Sources: National Office of Statistics, *Annual Survey of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different years.

The second reason of low union density is found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rade unions. There exists a general tendency that countries that adopt company unionism have lower union density (like in the US, Japan, and Taiwan) than countries that have industrial unionism (like i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and Sweden). Workers in small firms face greater risk of organizing a union and fewer resources to maintain union organization and its activities, especially under the labor exclusive and labor suppress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Korean labor laws allowed only company unionism, prohibiting industry-wide organizing. Industrial federations do exist but lack the exclusive authority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collective agreement, except for a small number of federation unions such as metal and financial federations. These federations with their organizational unity and strength have forced their counterpart employers to come to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table but the actual agreement still goes through company-level adjustments (interview with Hoi-chan Roh). Korean Labor movements thus have been based on large individual company unions, especially *chaebol* unions, failing to penetrate into shop floors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hereafter SMEs⁴).

By the late 1990s the majority of regular workforce employed in large firms became organized, with a notable exception of Samsung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government employees in the public sector⁵, dissipating any further organizational expansion for unions. Union density by firm size clearly shows union concentration in large firms in Korea (See Table 2). Workers employed in firms with more than 300 workers took up 71.8 percent of union membership in 1993 and further grew to 78.3 percent of all organized workers in 2000. If the indicator is changed into the ratio of unionized

⁴ The Korea Feder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defines SMEs as firms employing less than 300 workers. In Korean economy, these SMEs employ 70 percent of total labor force, accounting for 46 percent of national production (The Korea Feder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1999).

⁵ The Public Employees' Union is organized but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its union rights are now being debated in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Assembly.

firms by their employment size, 70 percent of firms with more than 500 workers and 100 percent of firms with more than 1,000 workers are unionized (Ministry of Labor 1993). In contrast, very few firms with less than 30 workers have unions at all.

Table 2. Union Members by Firm Size: 1993-2000
(Numbers in thousand and percentage in parenthesis)

	1993	1997	2000
Total	1,669 (100)	1,484 (100)	1,527 (100)
Less than 49	68 (4.1)	45 (3.0)	48 (3.1)
50-99	113 (6.8)	87 (5.9)	69 (4.5)
100-299	288 (17.3)	251 (16.9)	215 (14.1)
300-399	129 (7.7)	120 (8.1)	98 (6.4)
500-999	199 (11.9)	164 (11.1)	136 (8.9)
1000-4999	414 (24.8)	382 (25.7)	325 (21.3)
More than 5000	456 (27.4)	435 (29.3)	636 (41.7)

Sources: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Report on Trade Unions*, 1993, 1997, and 2000.

This company unionism failed not only to organize workers in small firms, but also to include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non-regular workers.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has been slow in organizing contingent labor force, now consisting almost 60 percent of the total employment.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KCTU indicates that the employment of contingent workers is already universal in 2001, across firms and industries regardless of their size and sector (KCTU 2001). Even the KCTU has increasingly being criticized by non-regular workers for representing only the interests of aristocratic full-time workers (interview with Hoi-chan Roh). Another clear observable trend in increasing contingent labor is that 67.8 percent of all female workers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non-regular labor force and 68 percent of all non-regular jobs are performed by female workers (KCTU 2001). This fact does not only coincide with the global trend of feminization of contingent labor, but also points the inadequacy of the traditional masculine labor movement in addressing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female workers.

Sinc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1987 the Korean union movement has experienced organizational expansion and gained collective action capacities to the extent to be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societal actor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as well as in Korean politics. Its growth based upon company unionism, *chaebol*-union dominance, and masculism, however, has had its own consequences in the interest articulation and gain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As Pontusson has cogently contended,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unions defines their strategic capacities and inclinations (1992). The following section presents how the above-explaine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are linked to its gains in wages and other labor policy outcomes.

2. The Gains of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Wages, Social Welfare and Labor Law Reform

(1) Wages and Social Welf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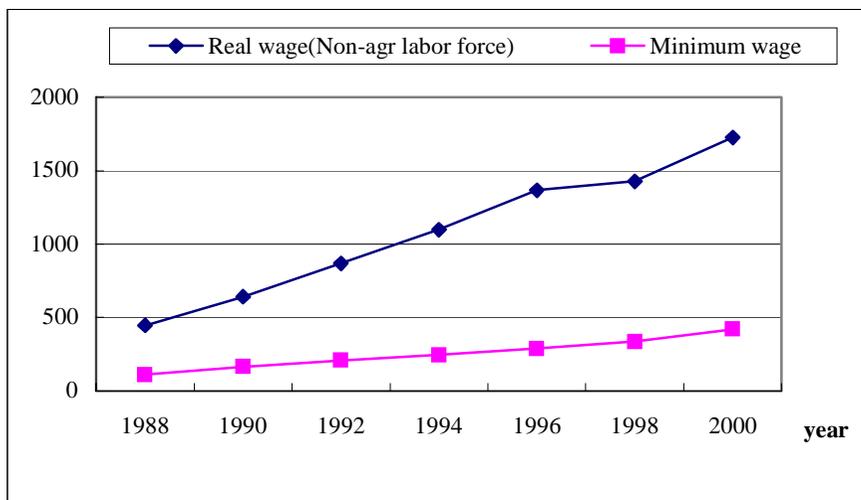
The growth of organizational power of workers and unions and their collective action was the impetus for their gains in wages and labor law reforms. These gains, however, were not evenly distributed to the working population but rather reflected the fragmentation of wage-earner interests and capacities. The real wage increase rate in manufacturing that had been suppressed by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up until 1986 peaked to 18.3 percent in 1989, maintaining the average rate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t 7.6 percent. After a sharp decline in 1997-98, it jumped back again to 13.9 percent in 2000. The total monthly wage that was less than 300,000 *won* (approximately \$250) before democratization, increased to 1,702,000 *won* (\$1,418) in less than 15 years (See Table 3), followed by rather a steady growth of the minimum wage level (See Figure 6).

Table 3. Wage Increase: 1986-2001 (in thousand won/month)

Year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Manufacturing workers
1986	351	294
1991	755	690
1996	1,368	1,124
2001	1,825	1,702

Sources: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Survey of Labor Statistics*, different years.

Figure 6. Changes in Real Wages and Minimum Wages: 1988-2000
(in thousand *won*/month)



Sources: KLI, 2002 *KLI Labor Statistics*.

Note: The Minimum Wage Law was enacted in December 1986 but began to be implemented two years later.

If we look into the wage data more closely, we can clearly observe that the benefits of the labor movement fell unequally to workers. First, the minimum wage increase, which began to be implemented in 1988 as a measure to protect workers in SMEs and in the service sector, has been minimal compared to the overall wage hike. This discrepancy was due to the organizational nature and wage bargaining structure of Kor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As unions are organized and wage bargaining takes place at the individual firm level, unions with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have better chance for wage hike and other company-level benefits. Moreover, these powerful unions tend to be organized in large firms that have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profitability to accommodate to union's demand. In small firms, not only there are few unions organized, but also the company itself has little resources to offer to workers.

Studies show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wage increase, especially in SMEs, has been the firm's competitiveness and payment capability,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wage determinants (The Korea Feder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1999).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s a proxy for union strength) over wage determination is only the second factor that is in a continuous decline (from 32 percent in 1990 to 22 percent in 1999), overtaken by the increasing effect of one-sided company wage policy, which accounts for 36 percent in 1990 and 55.5 percent 9 years later (The Kore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00). Here again, the firm size mattered; the greater the firm size the greater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over wage determination. In 1999, 77.8 percent of firms with more than 1,000 employees decided their wage level through collective bargaining, whereas only 4.3 percent of firms with less than 50 workers had a meaningful collective bargaining at all with their unions (The Kore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00).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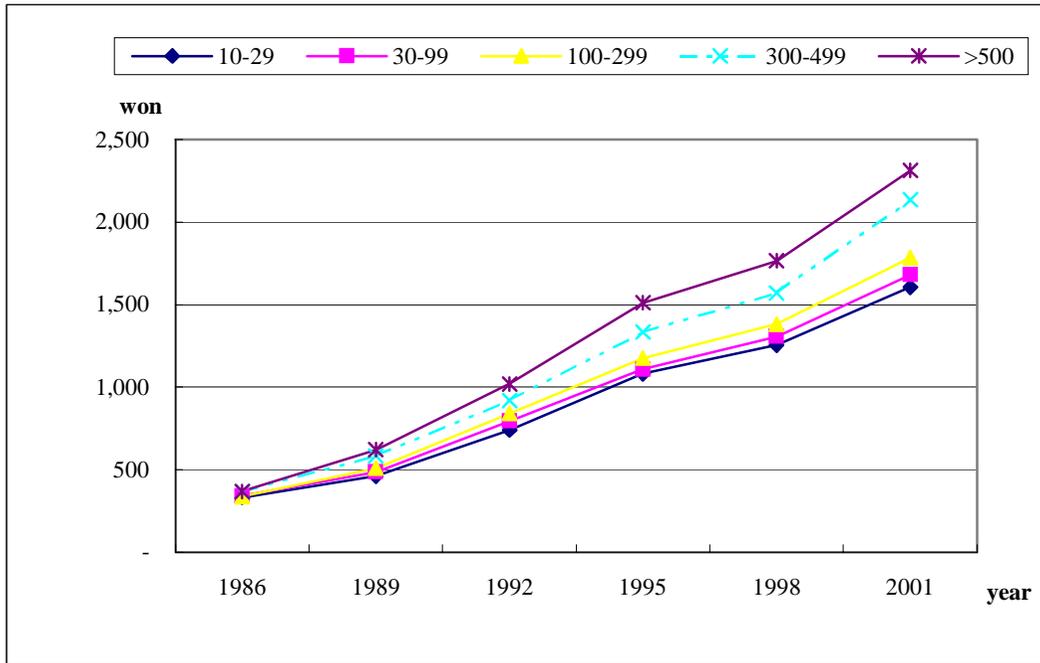
Company unionism that relies on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profitability of the firm brought about a widening gap in wages across different firm sizes against a narrowing wage gap across different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particularly between white-collar and manufacturing workers. The wage ratio between firms with less than 29 workers and firms with more than 500 workers increased from 111.3 percent in 1986 to 142.6 percent in five years (Park, Dong 2000 p.127-128).⁷ As shown in Figure 7, two workers, one in a small company and the other in a large firm, who started with a similar level of wage in 1986 (332,000 *won* and 369,000 *won* respectively) are now living on a quite different paycheck, one with 1.6 million *won* and the other with 2.3 million *won*. In contrast, the wage gap between white-collar clerical workers and manufacturing workers decreased from 140 percent in 1986 to 113 percent 6 years later.⁸ These data point to the fact that the growth of labor movements in large manufacturing firms is accountable for these changes in wage differentials.

⁶ This information is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Kore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The survey was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from 1,993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⁷ According to a wage study by Nam, Gi-gon, almost 50 percent of the wage gap can be explained by general labor force traits such as gender, education, seniority, and career. The rest of the wage gap is accounted by the union power to pressure the company (1997. p.144-145)

⁸ Time series data are not comparable after 1993 because of the changes in the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Figure 7. Wage Differentials by Firm Size: 1986-2001(in thousand won/month)



Sources: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Survey of Labor Statistics*, different years.

Company unionism did not only widen a wage gap among workers across different firm sizes, but also created a disparity in non-wage welfare benefits. Korean employers are usually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two kinds of non-wage benefits: one is in the form of social welfare contributions (법정 복리비) that are defined by legislation on industrial accidents, health care, unemployment insurance⁹, and national pension, and the other is company welfare expenses (기업 복지비) that are determined by collective agreement with their respective unions. Table 4 which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elfare programs in Korea shows that welfare policies began to be implemented in large firms first and then took quite a long time to become a universal program. Yet, the simple fact that a specific welfare policy has become to a universal program does not mean that actually all workers are covered by the program. The industrial accident insurance, for instance, covers only 77 percent of eligible workers, whereas unemployment insurance with quite restrictive eligibility is enjoyed by 51 percent of workers, most of them employed in firms with more than 5 workers (KCTU 2002).

The company welfare benefit system is another element that has created a fragmentation among workers. The average non-wage company benefits in large firms in 1992 were 100,000 won (approximately \$830) per month and increased to 180,000 won (approximately \$1,500) in 2000. In SMEs, however, they rose from 80,000 won only to 100,000 won in the same period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Survey of Labor Costs* 1992 and 2000). In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mpany welfare

⁹ It is actually called “employment insurance” (고용보험) to imply a positive connotation.

provisions, Y. S. Kim confirms that the difference in non-wage benefits is a critical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among workers (2002). Figure 8 shows the widening discrepancy in non-wage benefits among workers employed in different firm sizes.

Table 4.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elfare Programs

Welfare program	Year	Coverage	Contribution	
Industrial accident	1964	Firms with more than 500 workers		
	2000	Universal	E: 1.49	W: 0
Health insurance	1977	Firms with more than 500 workers		
	1989	Universal	E: 1.815	W: 1.815
Pension	1988	Firms with more than 10 workers	E: 1.5	W: 1.5
	2003	Firms with more than 5 workers	E: 4.5	W: 4.5
Unemployment	1995	Firms with more than 30 workers		
	1998	Universal	E: 0.9-1.5	W: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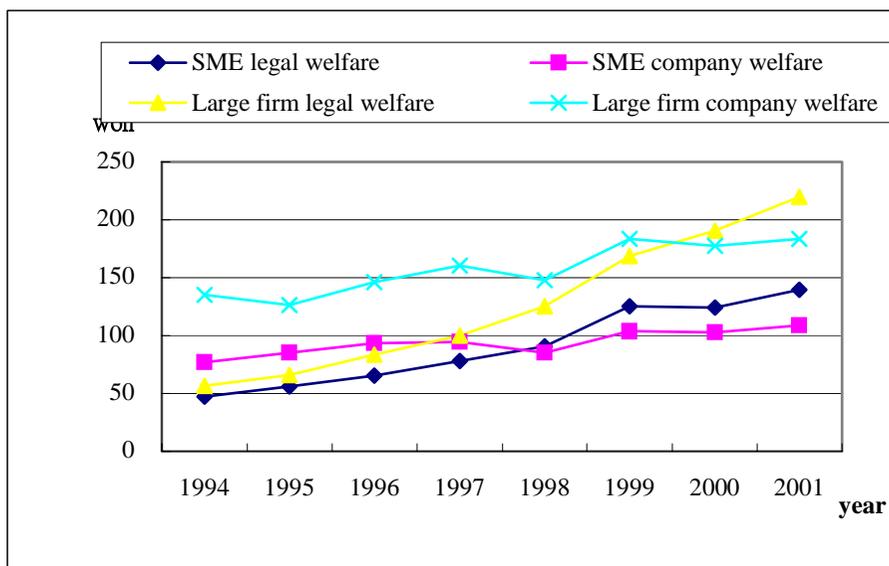
Sources: Compiled by author based on KCTU, "Social Welfare Education," p.28-61, and Gam, Jung-gi, "Historical Demarcation of Korean Social Welfare," p.206-207.

Notes: * The upper cell is the year when the program was first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and the lower cell is the year when the latest coverage expansion took place.

** Contribution is calculated as a percentage of the worker's average monthly wage.

*** E is for employers and W is for workers.

Figure 8. Non-wage Benefit Differentials by Firm Size: 1994-2001
(in thousand won/month)



Sources: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Survey of Labor Costs*, different years.

Notes: * SMEs are firms with 30-299 workers for 1994-1997, and firms with 10-299 for 1998-2001 as the Ministry of Labor changed the criteria for the labor cost survey.

** Large firms are firms with more than 300 workers for all years.

(2) Labor Law Reforms

Besides increased wages and social welfare benefits, labor laws that defin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of workers have also undergone various reforms sinc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1987.

Labor law reform was one of the major agenda in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politics in 1987. The amendment of labor laws took plac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Workers' Great Struggle in late 1987 along with constitutional re-writing. The 1987 amendment accommodated to labor's demands for lifting various obstacles that had existed in collective industrial relation laws written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new labor legislation de-regulated various restrictions that infringed upon the fundamental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e., the right to organize unions. But beyond that, there was very little change. The new labor law maintained the three vicious articles – the prohibition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unions, multiple unionism, and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 that had constantly been criticized by the democratic labor movement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Such partial labor reform was inevitable as the bargaining for the amendment was in the hands of a few politicians from the established political parties, exclud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new and independent labor groups. This was nothing but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ur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Korea where the input and contribution of organized labor into democratic movements was neither critical nor hegemonic.

The second labor reform in 1989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power imbalances under the Roh Tae Woo government. Under a divided government,¹⁰ when three opposition parties submitted a reformed labor bill, president Roh used his veto power to the proposed bill in order to minimize changes i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dustrial relation laws. As a result, only minor improvements were made in terms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unions and the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One progress in this round of labor law reform was that politicians became more open to incorporating the voices of democratic union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re were various aborted attempts for further labor reform. In 1990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ubmitted a bill to deregulate the labor market; in 1991 the Labor Minister wanted to push for wage system reform, but with no success; in 1992 the Labor Law Research Committee proposed a more comprehensive labor law reform; and labor reform was seriously discussed within labor circles with Korea's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in 1991¹¹. These unsuccessful reform proposals reflected a clash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strong demand from employers to flexibilize the labor market and to restrict collective actions of unions versus organized labor's demand for further enhancement of union rights. Organized labor intended to exploit the external pressure of the ILO recommendations as a momentum for domestic labor reform.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exchange labor market deregulating articles with unions by

¹⁰ Three opposition parties were the majority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while the president's party was the minority.

¹¹ As a new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September 1991, Korea had automatically to join the ILO as well. The ILO had continuously recommended the Korean government to amend the articles in the labor law that infringed the basic rights of workers and unions. The ILO recommendation included the permission of multiple unionism, teachers' union, and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the permission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trade unions and the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recognizing their existence and rights. The Labor Law Research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labor scholars and lawyers was a manifestation of such government's intention. The early 1990s was in a sense a period of learning for government, employers, and unions to balance out between the necessity to democratize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pressure to adopt more flexible labor market policy.

During the Kim Young Sam government that ran under the banner of "segehwa" (세계화: glob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proclaimed its new labor strategy as "new industrial rel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government, pressured by the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hanging production regimes, re-directed its industrial policy in general, setting up the Labor Reform Committee in 1996 in particular. The Committee invited both of the FKTU and the KCTU, plus employers' organizations and labor scholars.

The forum, however, produced a labor bill that no one was happy with to be passed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When the ruling party railroaded a more watered-down version of the labor bill than the one that was agreed upon in the tripartite consultation, ignoring even the very basic democratic procedure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to inform the lawmakers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both of the national labor unions called for a general strike. The strike lasted for almost two months with some ebbs and flow and was widely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to the extent to force the political parties to revise some of the articles. The strike, however, was not powerful enough to stop labor market flexibilization articles pushed by employers. The labor law reform in 1997 was at its core a political exchange between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 KCTU and legalization of massive layoffs. The way the final labor law reform was produced was back-door lobbying and confrontation, something far from the original spirit of the Labor Reform Committee that emphasized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next round of labor law reform took plac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late 1997 and 1998. President Kim Dae Jung called for a social pact on labor policy as a part of the IMF bailout program to stabilize the Korean economy ridden by massive unemployment and high economic uncertainties. The social pact¹² was signed in February by major societal actors involved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 the government, unions, and employers. This tripartite agreement marked another exchange between enhanced union freedom and increased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The agreement, however, was doomed to fail as all the three national actors were not only deficient of social trust but also lacke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o enforce the agreement to each other as well as to its own constituencies. Democratic and stable industrial relations require a certain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order to bind participating actors with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to abide by the agreed rules of the game (Kang 1998). However, legislative measures did not follow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agreed reforms, aggravating the thin trust that had brought the three parties into the consultation table. Measures to flexibilize the labor market were quickly applied throughout industries and sectors, whereas granting the promised union freedom was delayed.

¹² The Social Pact of February 1998 was not limited to labor issues but included a list of broad socioeconomic agenda such as structural reform of *chaebols*, price stabilization, job security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wage stabilization, deregulation of export-related red tapes, and legisla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corruption and illegal political donations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men.

Furthermore, the organizational weaknesses of labor and capital, i.e., company unionism, low coordination among multiple 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est divides across different *chaebols*, industries, and occupations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organizational deficiencies of these actors in realizing compliance. Leadership of the KCTU that signed that social pact was denounced by their union members for “selling out” and was replaced by more militant unionists. By the end of 1998, the KCTU pulled out of the Tripartite Commission to return to the old strategy of power politics of “no struggle no gains.” Therefore, without institutionalized mechanisms to enforce and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to sanction non-compliance, the social pact could not be more than a cheap talk hastily produced under a national crisis situation. The outcomes from the tripartite consultation were thus rather defined by exogenous factors such as intensified globalization, financial crisis, and/or government’s initiative in response to these external pressures, not reflecting a genuine compromise of government, unions, and business (Park 2000). Table 5 and Table 6 summarize the major agenda and actors in the labor reform politics since 1987.

This brief survey of labor law reforms since 1987 shows that labor politics has evolved to be more inclusive over the years and organized labor came to be recognized as a social partner in industrial relation policy-making. Although the labor movement was not always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what it demanded, it certainly has gained a political voice of workers’ interests. In J. S. Park’s term, it was labor politics of “mutual recognition and contested exchange.” (Park 2001)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past 15 years, therefore, has created a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growth of the labor movement. Unions with enhanced organizational capacities were then able to gain increased wages, welfare benefits, and reformed labor laws.

Table 5. Labor Law Reforms in 1987-2002: Actors and Agenda

	Pre-tripartite agreement		Labor reform through tripartite agreement: 1996-present
	1987-89	1990-95	
Labor law reform	1987 and 1989	Aborted proposals	1997 and 1998
Bargaining arena	National Assembly	Nowhere	Labor Reform Committee, Tripartite Commission
Major actors	Ministry of Labor Political parties	Government, unions, and employers	Consultation of government, unions, employers, and scholars
Major agenda	Labor Standard Law, Trade Union Law, Labor Dispute Law	Divergent agenda from each actor	Exchange of labor market flexibilization and improved union rights

Source: Choi et al. *Labor Law Reform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Korea*. 2000. p.12.

Table 6. Labor Law Reforms and Major Changes: 1987-2002

Year	Major Changes
1987	Prohibition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trade unions (-) No multiple unionism (-) Prohibition of a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 Union organization possible without membership guidelines (+) Limiting the boundary of defense industries where unions are not allowed (+) Elimination of the ordinance for union dissolution (+) Shortening of the cooling period (+)
1989	No multiple unionism (-) Permission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trade unions (+) Partial permission of a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0)
1997	Multiple unionism (+) Permission of a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 Prohibition of teacher and public employee unions (-) Permission of massive layoffs (-) Flexibilization of work hours (-)
1998	Reform of election and political finance laws to allow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unions (+) Permission of teacher union and public employee work council (+) Permission of massive layoffs and dispatch workers (-)
2003: under debate	Weekly 40 hour work system Permission of public employee union Protection of non-regular workers Protection of foreign workers

Sources: Compiled by author with information from Choi et al. *Labor Law Reform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Korea*. 2000.
Notes: The + and – signs in parenthesis indicat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f each labor reform on organized labor.

3. Organized labor's contribution to the building of Korean democracy

In contrast to very few disagreements on labor's gains from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debates still abound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the labor movement o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Korea. Workers, activists, and labor scholars do not hesitate to acknowledge that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has created a nurturing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the labor movement. Their views on the role of organized labor on democratization, however, are divergent. A group of labor activists and scholars emphasize various organizational efforts that had been accumulated in pre-transition period (interview with Jin-woo Ju). Others remind that workers were the beneficiaries rather than a collective agent for democratization (Y. G. Choi et al. 2001). I do not intend here to draw a conclusion on this debate, but for a meaningful discussion it seems important to have a verifiable indicator of what is meant by "the role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democratization." Collier, for instance, in her path-breaking study on the labor movement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defines it as "pro-democratic action led or undertaken by unions and labor-affiliated or labor-based

parties” and “whether a group of workers became part of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s a self-conscious collectivity and played an active role that affected the democratic outcome.” (Collier 1999, p.14-17)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 would rather side with the latter assessment of Korean labor movements and democratization. Workers as individuals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but they were not an “organized” voice for democratization *per se* in 1987. This of course is not meant to undervalue all the efforts and sacrifices made by workers and unionists befor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¹³. But, this kind of undercurrent is rather different from recognizable presence of workers as a collectivity in the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Then, what about the role of organized labor in the year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can be defined a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mocratic rules and practices, Diamond suggests that the role of civic society i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in general can be found in functions such as checking the power of the state, reforming the state, stimulating participation and rights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 educating democratic norms, creating multiple channels beyond political parties for interest articulation, mitigating the polarities of political conflict, and training new political leaders (Diamond 1999, p.239-240). Korean labor movements, by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 that had monopolized industrial relations policy-making and by becoming a social force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 of the working class, something established political parties have failed to do, have certainly contributed to the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Korea.

Such positive assessment, however, should be taken with a pinch of salt. Today more and more labor commentators reveal their negative views on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ization. Labor movements that were supposed to protect and represent the most socially weak and vulnerable population now have become the organized interest of better-off workers, engaging in mobilization politics of entrenched interests, often termed as “rice bowl fight” (밥그릇 싸움). The moral strength of Korean labor movements that had come from their appeal for human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justice, stemming from the spirit of solidar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shared lived-experience of Korean workers under extreme exploitation and intolerable inhumane treatment (Koo 2001), is now waning out.

Instead of mitigating polarities in class politics, it seems like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became one of the culprits of creating polaritie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heterogeneity in worker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Company unionism and its effects on labor movements was in a sense an outcome of a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government, politicians, employers, and unions (D. Park 2000, Im 1998).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contain the labor movement within economic unionism to prevent it from becoming a political force and possibly a left political party. It could also divert the political pressure for institutionalizing social welfare to individual firms (J. S. Park 2001). For politicians it was politically too costly and risky to act as agents for fundamental refor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as they were dependent on *chaebol* businessmen for political finances. Moreover,

¹³ For detailed and heartbreaking documentation of pre-democratization Korean workers’ movements, see Hagen Koo. 200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Soonok Chun. 2000. “They Are Not Machines: Korean Women Workers and Their Fight For Democratic Trade Unionism In The 1970s”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and Youngrae Cho. 2003. *A Single Spark: The Biography of Chun Tae-il* (English edition).

as an easy way of garnering votes, Korean politicians chose to take advantage of regional cleavages instead of distributional issues in post-transition elections. Employers, especially in large firms, wanted and were able to pacify unions by accommodating to workers' economic demands. As long as unions stayed out of matters of management and export production lines were running, they could pay off unionized workers at the expense of sub-contractors and non-regular workers. For unions, too, it was easier to mobilize their members for immediate economic benefits than to call for an action for social democratic agenda. Along the years, unionists have developed the taste of enjoying the benefits of being "insiders," ignoring the gravitating working conditions of "outsiders" in the labor market. It was thus a typical prisoner's dilemma situation in which individual unions pursued its best interest at the cost of socially sub-optimal outcome for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Organized labor is further criticized for inhibi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table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KCTU leadership who signed the 1998 social pact by a more militant group of unionists is a clear example of how fragile a social agreement can be in Korea. If a hard-won tripartite agreement can easily be nullified by one of the actors, it will deprive other actors of incentives to sincerely participate in the next-round negotiations. Moreover, unions sometimes resort to back-door lobbying through personal connections to high-ranking politicians to prevail in their demand as well as to seek pardon to their illegal activities, instead of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and abiding by the legal procedures (interview with a labor ministry bureaucrat¹⁴). Some unionists radicalize their demand to the extent of driving out the employers from any kind of compromise and then drag in politicians or government bureaucrats to seek a political solution. A labor specialist has once lamented that little can actually be resolved through an official meeting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s, unions, and employers (interview with Hyun-min Jung). Unions prefer having a closed meeting with lofty politicians, a mirror strategy long used by their employers. Such spoiled behavior of some unions, however,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e sole reason for under-institutionalize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Korea. Politicians and employers should share the blame, too.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include distributional issues and labor agenda in their electoral competition. Employers should depart from their age-old notion that "this company is mine" and recognize unions as their partners for produc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Unless they clear up their old way of running business, such as non-transparent accounting, inside trading, and unproductive investment, they will keep feeding unions with agenda for contentious union activities.

Today in Korea thus there exists no such a thing as *the* Korean working class, but only fragmented working classes with varying interests and conditions. The independent and militant unions that were once the impetus for the organizational growth of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have now become the agents of parochial interests, widening the gap in wages and other social benefits along the firm size. Such fragmentation has only aggravated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the labor movement. Moreover, the factional politics of labor unions has hampered a stabilization of union leadership and unions' pursuit of rule-abiding, encompassing,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Despite of the organized labor's effort to democratize collec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past 15 years, unions' short-sighted struggle to maximiz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shop floor

¹⁴ This interviewee wanted to remain anonymous.

constituency back-fired to weaken the labor movement as a democratic social movement that is supposed to pursue a public good instead of parochial self-interest.

4. Conclusion

Sinc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1987, Korean workers and unions have significantly gained in terms of wages, social welfare, labor law reform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and social influence. This process, however, also meant a departure from class solidarity, which was the momentum for the growth of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Koo 2001).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company unionism has limited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such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Korean working class along with changing economic structure has raised new labor issues such as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non-regular workers, women workers, and foreign workers in Korea. Unless organized labor can adequately address these issues, both of its organizational basis and moral ground as a social movement will be undermined. The Korean labor movement thus stands today on the borderline of civil society for democratic movements; if it fails to pursue public-good oriented democratic agenda, it will soon fall into the “old social movement” ridden by parochial interest-seeking and organizational ossification that has little to do with social progress.

References

- Cho, Hee-yon. 1998.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Korea (한국의 민주주의와 사회운동)*. Seoul: Dangdae Publication.
- Choi, Young-gi et al. 2000. *Labor Law Reform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Korea (한국의 노동법 개정과 노사관계)*. Seoul: KLI.
- . 2001. *Korean Labor Movements Since 1987 (1987년 이후 한국의 노동운동)*. Seoul: KLI.
- Chun, Soonok. 2000. “They Are Not Machines”: *Korean Women Workers and their Fight for Democratic Trade Unionism in the 1970s*. University of Warwick.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 Collier, Ruth Berins.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s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am, Jung-gi. 1992. “Historical demarcation of Korean social welfare,” *Kyungnam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tudy 4 (경남대사회과학연구)*. P.183-214.
- Im, Young-il. 1998. *Labor Movements and Class Politics in Korea (한국의 노동운동과 계급정치)*. Masan: Kyungnam University Press.
- Kang, Myung-se. 1998. “Ten years of democratization: an exchange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political market?” in K.D. Park (ed). *Ten Years of Democracy in Korea: Changes and Sustenance (한국 민주주의 10년: 변화와 지속)*. Seoul: Sejong Institute.
- Kim, Jun. 1999. “Social pact and labor politics: 1989-1995,” in Y. G. Choi et al (eds)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bor Politics in Korea (한국의 노사관계와 노동정치)*. Seoul: KLI
- Kim, Yoo-sun. 2002. “Empirical study on company welfare,” (기업복지 실태분석) unpublished paper.
- Koo, Hagen. 200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한국 노동자계급의 형성)*.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re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nual Survey Report on the Wage Model*, different years. Seoul: KCCI.
- . 2000. *The 1999 Wage Survey of Manufacturing Workers*. Seoul: KCCI.
- Korea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The 2001 Survey on the KCTU Non-regular Workers (2001 민주노총 비정규노동자 실태조사 보고서)*. Policy report 2002-05. Seoul: KCTU.
- . 2002. *Social Welfare Education (민주노총 사회보장 학교)*. Seoul: KCTU
- Korea Feder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1999. *The 1999 Survey of SMEs*.
<http://stat.kfsb.or.kr>
- Korea Labor Institute. 2002. *2002 KLI Labor Statistics*. Seoul: KLI
- Korea Labor and Society Institute. 2001. *Global Labor Market Date: Korea*. www.klsi.org
- Ministry of Labor. *Annual Report on Trade Unions*, different years
- . *Annual Survey of Labor Statistics*, different years
- . *Annual Survey of Labor Costs*, different years
- Nam, Gi-gon. 1997. “A study on the causes of wage differentials across different firm sizes,” in *Trends and Prospects (동향과 전망)* 35. Seoul.

-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Annual Survey of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different years.
- Park, Dong. 200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rean Labor Regime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act: 1987-1998." (한국 노동체제의 변화와 사회협약의 정치에 관한 연구: 1987-1998) Korea University. Seoul.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 Park, Jun-sik. 2001. *Globalization and Labor Regime (세계화와 노동체제)*. Seoul: Hanwool.
- Pontusson, Jonas. 1992.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union politics," in Golden and Pontusson (eds). *Bargaining for Change: Union Politic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hin, Gwang-young. 1994. *A Sociology of Class and Labor Movements (계급과 노동운동의 사회학)*. Seoul: Nanam.
- Song, Ho-geun. 1991. *Labor Politics and the Market in Korea (한국의 노동정치와 시장)*. Seoul: Nanam.

Interviews

- A labor ministry bureaucrat. June 21, 2003.
- Ju, Jin-woo (KCTU). Seoul. May 20, 2003.
- Jung, Hyun-min (secretary of a lawmaker). Seoul. June 19, 2003.
- Roh, Hoi-chan (Democratic Labor Party). Seoul. September 5, 2002.

十八世紀華人海外移民活動的一些特質*

孔復禮

哈佛大學東亞語文暨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

首先，我要感謝有關單位的安排，讓我有機會和各位談談從華人的社會經驗來看「華人移民」的問題。華人移民到國外，是近現代歷史中的一件大事。多數的移民活動始於一種僑居的方式：在國外暫時逗留、賺錢，以便寄錢或帶錢回家。許多移民，不管是否變得富有，後來的確回國了。但是在命運的作弄下，也有許多移民未能回國。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研究華人的故鄉對了解移民的情況來說十分重要。上一次演講中，我談到我們必須將華人移民視為中國內部遷移這樣一個更大的過程中的一部份。今天，我將談一談華人的社會經驗中一些被納入移民活動的特點。這些特點是「特殊關係」(particularism)、「負債的性質」(indebtedness) 和代辦制度 (brokerage)。

一、特殊關係 (Particularism)：代價和利益

眾所周知，中國南方沿海地區居住了各個方言社群和強大的家族。這造成了社會上的一種「特殊關係」：換句話說，人們傾向於強烈地認同某一個社群，這既是與其他社群相對的，而又無法避免地，是和它們相競爭的。這種個人的「特殊」關係及聯繫，形成一個包含著各種義務及期望的、十分複雜的網絡，並且使一般性的（對省和國家的）忠誠在相比之下，顯得疏遠而模糊。在東南亞移民身上，中國民族主義者就發現，這種特殊聯繫成爲了他們發起全中國運動（例如對革命計畫的支持、對中國國防的資助等）時的一個絆腳石。世紀之交的民族主義者黃乃裳感嘆：這些南洋華人的地方觀念太頑固了……我們都一樣離鄉背井，但我們卻仍視對方爲陌生人。有些人甚至虐待同胞，或自相殘殺。

儘管如此，「特殊關係」卻也在移民的「小生境」(niche) 和「通道」(corridor) 的創造和運作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黃乃裳所指出，海外移民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將所有「華人」聯繫成爲一個國家性的社群。相反地，它更加深了這些人之間原來存在的特殊關係的差異。我認爲，這種被強化了的「特殊關係」其實有它非常大的適應功用：它能組成具有強大凝聚力的社群，爲它的成員提供他們在遠離家鄉時所需要的保護和照顧。此外，在僑居地劃分經濟上的「小生境」（個別方言社群在特定地區對某些行業的壟斷），通過讓各社群專門經營某些行業，減少彼此之間的激烈競爭，也使移民更容易討生活。從故鄉或個別家族社群招募新移民的做法，也使每一個通向兩頭的移民活動成爲擴大和鞏固某一個方言或家族社群的一條「通道」。

如果說「小生境」是個別移民社群在僑居地的新環境中得以生存的一個空間，移民的「通道」則是對新移民故鄉原有生活環境的一種延伸。這一層層的關係，將移民和他的國家（或故鄉、家族、省份等）聯繫在一起。我們可以將這種關係和移民希望回到家鄉的願望區別開來，因爲從某方面看來，一個移民從來就未曾離開家鄉。他保留了經濟、文化、家庭等方面

* 此文原爲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九十二年度午餐研討會系列（二）演講稿，2003年7月25日。

的歸屬感，因此他更接近於他的故鄉，而不是他實際所處的僑居地。維持這樣一種「通道」在僑居過程中是必要的。移民不會在心態或行為上，與故鄉的文化、人或事決裂。

「通道」雖然具有其空間性，但它們主要還是屬於社會和經濟層面上的。一位研究歐洲華人移民的權威學者指出，中國這些專門「輸出」移民的社群（或稱為「僑鄉」）和它們在海外的相關社群完全融為一體，卻和周圍的社會和經濟隔離開來。」換句話說，這樣一個華人社群的收入、家族聯繫，以及社會結構都存在於一個特殊地帶。這個特殊地帶既不完全屬於祖國，也不屬於僑居地。他們（以及在海外的同鄉）生活在一個特殊的通道內。這條通道包含了一個跨國界的群體，並且和移民的僑鄉社群聯繫在一起。因此，「移民社群」（migrant community）這個詞既包括海外移民本身，也同時包括他們在故鄉的家人和鄰居。

「通道」，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政治、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影響。它們可能因為貿易壁壘、經濟衰退或國家的反移民政策等因素的影響而受阻，也可能因為商業上的拓展、更自由的資金轉移手續，以及科技突破（如汽船、航空聯繫和手機等）等而獲得增強或變得更為順暢。但除了少數例外的情況，華人移民的通道都能在惡劣的歷史狀況下繼續地生存。舉個例子來說，在十八世紀，不管是離國或回國的移民都面對著嚴厲處罰的威脅。但事實證明，許多移民仍舊回國探親或養老，而僑居海外的移民也繼續匯款回鄉。在 1882 到 1942 年美國排華時期，這些「通道」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儘管如此，移民仍然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抵達美國（包括用一種很有名的「假兒子」paper-son 的做法，就是由回鄉移民虛報新移民為兒女，再向新移民索取高價）。

二、負債的性質（Indebtedness）

移民社群的組織，及其經濟情況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移民最初是如何籌集資金到國外的。世界各地的許多移民為了出國而成了債務人，他們在僑居地的生活反映了他們負債的情況。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集體移民時代，移民要借船費，通常是以日後的勞力來換取。從移民勞力中得到利益，是放款人唯一的保障，因此整個過程中運用了一些強迫性的手段。例如移民必須受到監視，以防止他們逃跑，這樣才能確保他們將債務還清。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移民在一種接近於奴役的強迫性勞工制度下工作（這在西印度群島和熱帶的東南亞地區的種植園經濟中尤其普遍）。

債務普遍存在於中國的農村生活之中。每一個城鎮中都可以找到當舖。一個貧窮的農夫如果要進行農作，唯一的辦法往往就是通過賒帳來購買種子。當然還有賣青制度，這作為一種負債的方式，在中國鄉村十分普遍。因此，運用日後的勞力來借取所需，這樣的一種觀念是華人極為熟悉的。

這種負債的性質以不同方式納入移民活動中，造成個別移民擁有不同程度的「自由」。

(1) 最自由的移民，是那些家庭有能力為他們提供船費的人。雖然他們因此對於家庭有某種「虧欠」，而有義務通過匯款來回報他們，但這些移民並不受任何債權人的控制。

(2) 較不自由的移民，是那些因為向商人或船務公司借錢，而必須在日後利用工資償還的人。這種安排一般稱為「先行代付船票制」（「credit ticket」）。這種負債形式最常見於前往澳洲和北美的移民身上。

(3) 更不自由的是那些簽下契約，必須為國外雇主工作一段時間（通常為三到五年，也可能長至八年）的人。那些招募契工的人往往在待遇和工作環境等問題上欺騙這些工人。甚至還有一些工人是被私會黨徒拐騙而被逼簽約的。而且，在到達目的地之後，雇主對這些移民工人的不平等對待，其實也受到了當地政府的許可和執行。

至於在「先行代付船票制」和契約制度之間，那一種方式較為普遍，則要由僑居地的社

會文化來決定。種植園經濟在歷史上依靠非洲奴隸勞工（西印度群島和秘魯），對這種便宜、嚴厲控制的勞動隊伍產生了某種依賴性，而他們的文化也是在長期擁有奴隸的經驗上形成的。在東南亞的歐屬殖民地，把移民工人看作是接近奴隸的做法，在殖民思想的種族優越感下得到寬恕。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種植園和礦場的契工，工作情況就像奴隸一樣。在英國殖民地如馬來亞，這樣一種接近於奴隸的生活狀況，和傳自英國本土的反對奴役的思想並存。殖民地公務員雖然擁有這種反對奴役的思想，但要讓這種思想得到實際成效，並不那麼容易，其中還必須考慮到殖民地的經濟情況，以及種植園主人的要求等。

在北美，這一個華人多數通過「先行代付船票制」移民的僑居地，則體現了另外一種地方文化。在那裡，非免費勞工的概念在對非洲奴役的認識過程中，被徹底地種族化。防止這類勞工進入加利福尼亞的運動中具有種族歧視的意味，而且很容易移植到華人移民身上。更糟的是，華人（和非洲人一樣）被視為一種可供給希望把工資壓低的資本家的廉價勞力。反對華工的勞工組織經常以這些華人移民負債的性質作為排華的理由。歐洲的移民工人，常常假定他們的華人同僚因為都是被迫工作來還債，而因此受控於雇主、在本質上卑從而和奴隸沒有什麼不同。勞役償債制自十八世紀以來就在美洲漸漸消失，在美洲法庭未被執行，在 1867 年（中央太平洋鐵路計劃正在徵用數千名華工的同時）更被明確指定為非法行爲。那麼，在 1870 年代排華運動中起著重要影響的這種「奴役」烙印又是因為什麼原因而造成的呢？

禍端肇始於移民社群的一些特點。第一，管理這些地方住宿（如「華人六大公司」Six Companies）的三藩市華人企業家，幫助雇主確保這些「先行代付船票制」的移民一定要在還清債務後，才能夠乘船回國。第二，在移民組織裏，對於華工的吸收和管理常常是由經紀人負責的。對外人來說，這就像一個「督工——奴隸」的制度，移民華工看起來是不自由的。第三、典型的僑居華工都十分節儉，他們節衣縮食、不用奢侈品以便匯款回鄉的行爲，在歐洲工人看來，和奴隸沒什麼兩樣。對奴役制度的敵對態度，完全體現了當時激烈的工作競爭中，以及工人對資本家壓低工資的恐懼。這樣的環境促成一種敵對的種族歧視，最後造成了十九世紀末的排華事件。

三、代辦制度（Brokerage）和移民

「代辦制度」（指經濟和社交關係中的制度）是華人文化中廣為人知的一面。勞工代辦制度，作為華人僱工的特點，在中國內部遷移中就早已經存在。勞工的輸出有賴於一類特殊的經紀人。要在家鄉以外的地方找工作，一般都必須通過一個「勞工代辦人」（一般稱為「包工」或「工頭」）。「包工」會從家鄉招募勞工，將他們帶到雇主那裡，並且負責這些勞工的飲食起居。雇主將工資交給「包工」，再由他轉交給勞工，而從中抽取佣金。勞工代辦是一門生意，沿海每個省份都有好幾百人從事「包工」的工作。從某方面看來，移民的管理可以視為這種體制的一種延伸。

華人要移民外國，手續通常不是由自己處理，而是通過經紀人來代辦。這是華人移民（也可能是所有移民，或甚至一般旅遊）中非常突出的一個特點，我們有必要談一談。在移民過程中，經紀人扮演的可以說是一個「協作者」（facilitator）的角色：因為他們擁有某種關係和特別的知識，這些經紀人可以幫助移民減少或避免途中的危險和麻煩。但這些經紀人更為基本的一個作用，是建立中國人所講求的一種特殊聯繫：這種「關係」（不管是血緣、方言或行業）可以將移民和僑居地的網絡聯繫在一起。出門在外，華人首先倚賴的就是這種關係。經紀人常常就在某一方面和他的顧客（移民）有關係。移民在僑居地如果有某種血緣或同鄉的聯繫網，就能夠更容易適應新環境。

「協作者」可能具有移民所缺乏的某些特別認識：他更了解工作機會、旅途的情況，懂

得如何應付或操縱相關的手續；他在僑居地有聯繫網，可以為移民提供工作、住宿和保障。從歷史上看來，「協作者」通常是為了謀利的（但這種「利益」不一定是金錢上的，有時候也可能是為了在社群當中建立自己的威望和名聲）。

「協作者」通常是一些在僑居地完成工作契約後，自己從事勞工招募工作的回鄉移民（稱為「老客」）。很自然地，他們最大的招募地點和對象就是他們的鄉鎮和家族。二十世紀初期，馬來亞種植園的經營者因為在中國沿海地區已經有很壞的名聲而很難招募到契約勞工，因此都傾向於採用這種招募方式。工頭和他的員工之間的關係，更多是和諧而愉快的，而不是高壓性的，因為「協作者」和他所招募的勞工之間的家族或同鄉關係，一方面形成對「協作者」濫用權力或虐待等行爲的自然制約，另一方面也確保移民將樂意償還他們的債務。

「協作者」的商業利益可以是良性的（例如幫助自願的移民），也可能是惡性的（例如詐騙或拐帶非自願的移民）。因此，在「協作者」這樣一個廣泛的類別之下，既有一般辦理出國手續的代辦人，也包括有組織的罪犯（例如惡名昭彰，但市場上仍一直有需求的「蛇頭」）。在東南亞，兄弟結盟（即「私會黨」）所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在接收移民的地點（尤其是作為華人移民進入東南亞最主要集散地的新加坡），在碼頭從船運者那裡接過移民債務的，一般上就是兄弟結盟的代辦人。移民在下船後，就被這些代辦人送到碼頭附近的一些禁閉住所，再轉交給馬來亞或新加坡當地的勞工幫派，或者轉運到另一個殖民地，如荷屬蘇門答臘的日里（Deli）。在目的地，代辦人將移民交給他們最終的雇主，以換取主要的船費和佣金。在整個過程中，這些勞工代辦人通常都是兄弟結盟中的人。在輸出移民的中國沿海地區，兄弟結盟所扮演的角色比較模糊，但一位權威學者認為在通商港口（Treaty Ports）活動的代辦人和協作者，一般上都有兄弟結盟的關係。

從雍正皇帝在 1728 年的一道聖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種移民「協作者」深遠的歷史根源。當時，數萬人遷徙到四川省鄰近，這讓雍正皇帝感到非常不安。他發出這樣的警告：「有一種包攬棍徒，極言川省易於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饒。每戶得銀包送。」

所有代辦制度的推行，都需要依靠一個條件，就是目的地必須有一些能夠承擔船費債務的有錢人。這裡所指的「有錢人」指的是「商人精英」。在任何移民路線上，「商人立足點」（merchant beach-head）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特點。有勢力的商人精英，可以作為華人社群的一個核心。他們能夠為移民提供工作、暫時性的住所，以及為他們入口各類食物和日常所需。他們也在移民匯款回中國的過程中扮演必要的聯繫角色。一些在香港有分行或有聯繫的三藩市內的店舖，成了移民到加利福尼亞和匯款回鄉的必要經紀人。基於這些原因，移民的通道有賴於這些商人和店舖。但加州的移民較為不幸的一點，是三藩市的商人精英，不如荷屬東印度群島或海峽殖民地土生華人的地方精英那樣，具有可以在移民和僑居地政府勢力之間形成緩衝作用的特有財富及政治勢力。結果，他們未能防止華人移民在排華時期成為受害者或遭到「邊緣化」的命運。

最後，代辦人的概念也說明了這樣一種可以稱為「移民服務」的商業機會的重要性。幾乎所有涉及移民安排的活動，都成了有利可圖的生意。除了匯款回國，如何將不幸在國外死去的移民骨灰運回國，也有專門的經紀人安排。甚至是外國政府為防止移民進入而設的重重障礙，竟也成了一種商機。以美國的排華政策為例，雖然執法人員努力執行這些苛刻的條例，但大家都承認，華工偷渡以及其它比較不危險的越過國界的方法，形成了一股數量雖不多、但從不減緩的移民潮流。要如何在「假兒女」的身份證上作手腳、又要如何同僑鄉人民協商，勸他們買下這些「假兒子」的名額等等，這都需要特別的技巧和關係。這類服務通常又能帶來可觀的利潤。要如何通過各層關係（如安全的住屋、車後廂等），讓偷渡移民安全越過加拿大和墨西哥邊界，這毫無疑問，又是一項要求特殊技巧的職業。

四、結語

以上所討論的特殊關係、負債的性質和代辦制度，是被納入移民過程中的一些中國文化的特點。這些特點可常見於一般人民的生活之中。如此看來，移民過程可以被視為近現代華人的日常社會經驗的延伸。要適應移民在旅途、在新環境中立足，並與僑鄉保持經濟聯繫等方面的需求，就有必要靈活而巧妙地運用一些他們所熟悉的社會組織和形式。從這一點看來，移民的過程其實是華人生活的一種延伸，而並不是對華人生活的背離。

多元族群國家原教旨主義政黨理念之探討

—以馬來西亞伊斯蘭黨為例*

陳中和

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生研究生

楔子

「同胞們，你們要相信，我們反對巫統並不只是因為它是巫統，我們反對國陣並不只是因為它叫國陣，我們反對它是因為它保存了殖民地的憲法，保存了不信道者的條規(*Peraturan Kafir*)，保存了蒙昧的條規(*Peraturan Jahiliyah*)。因此我們展開對抗他們的鬥爭。同胞們相信吧！我們對他們的鬥爭就是聖戰(*Jihad*)，因此我們的演說是為聖戰，我們的捐款亦為聖戰。因為我們和對方展開鬥爭，假如我們因為對抗他們而死亡，我們的死亡就是殉教(*Mati Syahid*)，我們的死亡就是屬於伊斯蘭(式) 的死亡。我們無須皈依猶太教，我們無依基督教，我們無須皈依印度教，我們無須皈依佛教；我們只要相信政治和宗教分離，我們就是不信道者(*Kafir*)。」

——哈迪阿旺¹ (Tuan Guru Haji Abdul Hadi Awang)，於 Bonggol Peradang，爪拉丁加奴 (Kuala Terengganu)，1983 年 4 月 7 日的一場演講。²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涉及穆斯林群體和西方基督教信徒重大國際爭端的發生，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Islamic Fundamentalism) 再度被眾多的西方傳播媒體和西方政治學者視為對以現代世俗化和自由民主主義為基礎的文明以及基督教徒社會的最大潛在敵人。³ 強力擁護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為人類最後終極意識形態的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就強調以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為代表的現代性 (modernity) 將在 911 事件後繼續主宰全球的政治，並將持續地將它的主體：自由平等、自由市場機制和法治精神涵化至世界各地。⁴ 在其中，政教分離是為現代化之

* 此論文曾發表於「2003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3 年 4 月 25、26 日。

¹ 哈迪阿旺為自 2002 年 7 月就升任為伊斯蘭黨黨主席，同時其自 2000 年起就擔任丁加奴州州務大臣 (按：即一州的最高行政首長)。

² 譯自 Abdul Rahim Awang, *Dosa-dasa Besar(重大的罪行)*. Kuala Lumpur: Ara Communications Sdn. Bhd., 1999, p. 114.

³ 以政治神學 (political theory) 的觀點而言，基督教徒社會並不同於基督教社會，前言是為以基督教信徒的人口比例之多寡作為客觀的界定標準，是為便於作政治學上的研究而作的分類定義，後者則較屬於形而上的規範論述，其判定之標準乃依不同基督教派和神學家的詮釋而有不同之定義。故一般而言大眾傳媒所形容之「基督教社會」並不全然等同於基督教思想所認可的社會體系，為避免名稱應用上的混淆，研究者主張應以「基督教徒社會」而非「基督教社會」來泛稱西方的歐美社會。

⁴ 他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與基督教文明的鎖鏈是不能被切割的，因為現代的自由民主就是基督教世人

必然要素，倘若政治是以宗教為基礎，而就永遠不會有「公民的和平（civil peace）」—這是因為現代公民是不會同意「原教旨的宗教價值（fundamental religious values）」。

他主張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是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因為它不但拒絕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反對現代性最根本價值—宗教包容（religious tolerance）。尤其甚者，福山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召喚先知時期生活方式的主張類比成德國納粹對遠古神秘主義的召喚，而視其為「伊斯蘭—法西斯主義（Islamofascism）」—而它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塔立班（Taliban）和沙烏地瓦哈比主義（Saudi Wahhabism）。⁵

由此可見，不少西方的學者認為，作為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威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揭示的就是對他們所擁護的西方現代性的抗拒和反動。然而與之相悖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沒有在人類現代化的過程中衰微，反而是伴隨著現代化進程而日漸盛行於全球的穆斯林社會，我們見到本是世俗化體制的馬來西亞在其自稱是原教旨主義者的首相馬哈迪（Datuk Sri Mahathir bin Muhammad）於 2001 年宣佈馬來西亞是伊斯蘭政體，而傳統原教旨主義政權蘇丹和伊朗的政權亦是毫無鬆動的跡象，即使是穆斯林地區最為世俗化的土耳其在 2003 年的伊始亦出現了建國近 80 年以來的第一個由標榜伊斯蘭理念的政黨所主持的政府，最後伊拉克沙旦胡申（Saddam bin Hussein）政權的覆滅並沒有降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力，反而促成其國內什葉派伊斯蘭勢力的抬頭。是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並持續地對全球穆斯林社會發揮其重大的影響力。而在政治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黨更在眾多穆斯林國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在族群分佈而言，馬來西亞雖是一個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的國家，⁶但其國內第二大政黨卻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政黨—泛馬來西亞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Malaysia or Pan-Malaysia Islam Party, PAS），同時該黨亦是國內唯一取得地方執政權的反對黨。如此一來，伊斯蘭黨就成為全世界唯一在多元宗教社會具有重大政治影響力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黨。本文楔子所揭示的言論出自於廿世紀末伊斯蘭黨其中一位最著名的卡里斯瑪型（Charismatic）的政教領袖，它可充分地代表了伊斯蘭黨激進的鬥爭方向。本研究嘗試以伊斯蘭黨為例，就其原教旨主義的信仰體系和其伊斯蘭化理念作初步的整理與探究，以探求一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黨的理論體系，以及多元族群多元宗教的環境對其理論建構的形成和制約，並嘗試尋求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全球化的浪潮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適應方向。

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基礎理念之回顧

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一詞的概念最早是出現在 1920 年代對美國南方基督教福音派運動（Evangelicalism）的描繪上，其興起的主要原因乃是為了抵制當時日漸擴張的世俗化思潮以及新興的現代主義神學（modernist theology）或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⁷以呼

皆平等的教條之世俗化的表述方式。見 Francis Fukuyama, "Their Target: The Modern World," in *Newsweek*, Davos edition, December 2001, pp. 54-59.

⁵ Francis Fukuyama, "Their Target: The Modern World," pp. 54-59.

⁶ 馬來西亞截至 1998 年的全國人口普查為止，在全國 20,625,500 公民當中，有 50.72% 馬來人，11.55% 其他原住民，26.74% 華人，7.57% 印度人，以及其他族群 3.42%，見 *Social Statistics Bullet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1998, pp. 59-61；另外，在宗教信仰方面，馬來西亞截至 1997 年為止，信仰伊斯蘭的信徒佔總人口比例的 58.6%，佛教徒佔人口的 18.4%，基督與天主教徒佔 8.1%，印度教徒佔 6.4%，道教或其他教徒佔 5.3%，見 Andrew Harding, "Islamic Law in Malaysia," in Cotran ed. *Yearbook of Islamic and Middle East Law*, 1996, Vol 2, p. 61; abstract from: Mohammad Hashim Kamali. *Islamic Law in Malaysia: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Kuala Lumpur: Ilmiah Publishers. 2000, p. 1.

⁷ 現代主義神學（modernist theology）主張應以理性經驗的科學方法來詮釋經學、神學和與之有關之

籲人們回歸傳統不容科學驗證和置疑的宗教觀，從而維護基督教思想的絕對正確性。在政治上通常為南方諸州右派和共和黨的中堅支持力量。⁸影響所及，原教旨主義運動就成為一強調回顧天啓宗教文本的解釋並和宗教自由主義相對立的運動。⁹

John L. Esposito 認為若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視為一種回歸原始和基礎信仰文本的召喚，則相信古蘭經是為天經（按：即相信其為神的語言）以及先知聖訓為規範性的生活指標，則所有虔信的穆斯林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由此觀之，原教旨主義事實上就是伊斯蘭的本質。是以 Lionel Caplan 認為原教旨主義反而往往成為個人自我推介的標榜，以向外顯示其對信仰基本教條不容妥協的忠貞。¹⁰如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就宣稱最優秀的穆斯林就是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s），而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者是以和平為基礎；反之，過去被形容為原教旨主義者的穆斯林反而是遠離伊斯蘭真意或背離（Deviate）伊斯蘭的一群，而且也屬於極端主義者（Fanaticism）或宗派主義者（*Taasub*）¹¹。

不幸的是，Esposito 認為對西方社會而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和政治激進和狂熱主義、恐怖主義和反美主義劃上等號。是以為了去除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被污名化的刻板印象，他主張應以伊斯蘭復興主義（Islamic Revivalism）來形容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¹²

以 Esposito 的觀點而言，近現代穆斯林世界歷經了三波的伊斯蘭改革（Islamic Reform），關於第一波的伊斯蘭改革，Esposito 和 Fazlur Rahman 均認為是伊斯蘭世界前現代的改革運動（Pre-Modern Reform Movement），¹³其始於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伊斯蘭社會自發性的改革——即 *Islah* 的精神，基於伊斯蘭信仰的實踐在歷經數百年的演化後已滲入了過多非伊斯蘭的元素和傳統而背離了正信伊斯蘭的規範，是故這一波的改革主要是革除現實環境和伊斯蘭理想的鴻溝，重建伊斯蘭原初的精神和社會秩序（按：即古蘭經所降示和穆罕默德所實踐的生活秩序），¹⁴而其改革的呼聲主要是出自於穆斯林社群自身內部的反省，其主要的改革方向是著重於儀式上和社會習俗上的淨化，此時期代表性的人物即為創立瓦哈比運動的 Muhammad Abdul al-Wahhab（1703-1792）等。¹⁵

而第二波的伊斯蘭改革是源自於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穆斯林知識界對西方現代文明挑戰和宰制以及對自身貧困和腐敗的環境和體制的回應，其所倡導的改革主要是提升穆斯林的整體政經實力，革除伊斯蘭社會守舊落後的制度與習性，開放吸收新知的大門。這一波的改革就是促進伊斯蘭世界現代化的改革思潮。其主要的開創者就是埃及的 Jamal al-Din al-Afghani（1838-1897）和其弟子 Muhammad Abduh（1849-1905）以及印度的 Sir Sayid Ahmad Khan（1817-1898）。他們改革的理論依據就是採用伊斯蘭的「*Tajdid*」和「*Islah*」的概念，並

一切社會現象，而非以傳統基督教善惡觀的標準來作詮釋過程的主題。見 George M. Marsden. 1995. "Evangelical and Fundamental Christianity," in Mircea Eliad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Volume 5,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pp. 190-197.

⁸ 有關福音派原教旨主義的發展歷史，可參考羅納德·L. 約翰生通著（Johnstone, Ronald L.），《社會中的宗教（Religion in Society）》，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12-324。

⁹ Gordon Marshall ed,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92.

¹⁰ Lionel Caplan ed, *Studies i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87, p. 3.

¹¹ Mahathir Mohamad. *Islam: Misunderstood Religion*. Kuala Lumpur: Afro-Arab Centre, 1996. p. 35.

¹²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8.

¹³ 見 Fazlur Rahman, "Revival and Reform in Islam," in P. M. Holt, Ann K. S. Lambton, and Bernard Lewi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25, Islamic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641. 以及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0.

¹⁴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pp. 49-50.

¹⁵ 相關的人物可參考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p. 50.

以「*Ijtihad*」的方式來詮釋伊斯蘭的經典教義，使之更能貼近當代的需求和順應當代種種的創新與挑戰。

Tajdid 可視為更新 (Renewal)¹⁶ 或復興 (Revival)¹⁷，即更新或重新推介已流失的伊斯蘭思想和教義並使其適應當代的環境，其主要的憑據是先知穆罕默德曾經表示阿拉在每一個世紀的起始將會重新喚醒伊斯蘭社會—即烏瑪對伊斯蘭的虔信。¹⁸ 而 *Islah* 是為改革 (Reform)，即主要表示不斷地為伊斯蘭重新正名並作改革以使伊斯蘭從一代又一代的錯誤領導以及濫權腐敗的泥沼中解放出來，和 *Tajdid* 不同的是，*Islah* 是植根於伊斯蘭本身自發性的傳統價值，¹⁹ 即相信隨著時代的演進穆斯林也有背離正道的可能性，伊斯蘭社會自身的腐化和衰敗的陋習與制度亦會不斷地地產生，故而應加以導正或革除。²⁰ 而 *Tajdid* 和 *Islah* 的過程和 *Ijtihad* 是無法分開的。所謂 *Ijtihad*，或曰個人推理 (Personal Reasoning)，²¹ 或曰為個人詮釋 (Personal Interpretation)，²² 或曰推理 (Reasoning)，²³ 是為一種詮釋伊斯蘭經典的方式，可稱為「理性推斷」。所謂理性推斷，是指針對伊斯蘭法 (包括古蘭經、聖訓，經典的類比—「*Qiyas*」以及宗教學者裁定的共識—「*Ijma*」之內容) 不確定的部份對應當代特定狀況或事項的關係作出理性的詮釋和抉擇。²⁴ 一般而言，伊斯蘭已確定的規範 (如古蘭經中明確的生活規範以及穆斯林五功之必要性等) 是不能再作理性推斷。²⁵ 因此伊斯蘭的詮釋學 (*Usul al-Fiqh*) 裡頭唯理性推斷打開了伊斯蘭接受伊斯蘭文明以外的現代思潮之大門。與理性推斷的精神持相反的態度即為不求變通的盲目依循 *taqlid* 單一教法學派的經文詮釋。惟到目前為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並不是鼓勵盲目依循 *taqlid* 的詮釋，而是堅持必須依循 *taqlid* 古蘭經和聖訓的字面釋意，即不能對古蘭經和聖訓明示的部份作任何的理性推斷。

惟按照 Ibrahim Abu Bakar、Esposito 和 Abdul Rahman Abdullah 等學者的分析，這一波的伊斯蘭現代化改革最終演化成兩種不同的伊斯蘭主義源流，其一為伊斯蘭現代主義 (Islam Modernism)，另一則為伊斯蘭復興主義或伊斯蘭改革主義 (Islamic Reformism or Islamic Revivalism)—即可視為一般所熟知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理性推斷範圍的廣度就決定了改

¹⁶ Ibrahim Abu Bakar. *Islamic Modernism in Malay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Sayid Syekh al-Hadi 1867-1934*.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94, p. 27.

¹⁷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p. 49.

¹⁸ Ibrahim, *Islamic Modernism in Malaya*, p. 27.

¹⁹ Ibid.

²⁰ 古蘭經對 *Islah* 行為之強調見諸於第四章四十二節，第七章一百七十節以及第廿七章十九節。

²¹ 見 Mohammad Hashim Kamali, *Principles of Islamic Jurisprudence*. 2nd Ed. Kuala Lumpur: Iimiah Publishers Sdn. Bhd, 1998, p. 366.

²²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p. 217.

²³ Said Ramadan. *Islamic Law: Its Scope and Equity*. Kuala Lumpur: Muslim Youth Movement of Malaysia (ABIM). 1987, p.75.

²⁴ 早期伊斯蘭文明的發展就是透過穆斯林不斷地以理性推斷的方式來應用伊斯蘭的經典規範來應對不斷變動的環境，但自完善的伊斯蘭法學在十世紀前後相繼成形後 (如順尼教派的四大法學派)，基於防止法律詮釋 (即經典詮釋) 的濫用，並維護伊斯蘭法學院的權威性和完整性，個別人士理性推斷的行為就不被鼓勵，而伊斯蘭法學發展至 1300 年前後經由當時的烏拉瑪宣佈理性推斷的大門經已關閉，今後的伊斯蘭法學家只能因循 (即 *Taqlid*) 前人的理性推斷，而不能新作新的詮釋，由此伊斯蘭法學以至伊斯蘭文明的發展進入停滯不前的境況，而近代的伊斯蘭復興就是要重新打開理性推斷的大門，以賦予伊斯蘭法學一個新的生命，和豐富伊斯蘭文明的內涵。見 Zianuddin Sardar, *The Future of Muslim Civilization*. London: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87, pp. 165-166.

²⁵ Abdul Rahman Haji Abdullah, *Permikiran Islam di Malaysia (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思想)*.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n Pusat Pendidikan Jarak Jauh, 1998, p.13.

革主義者和現代主義者理論基礎的分野。²⁶而對於伊斯蘭黨而言，原教旨主義就是全面接受伊斯蘭價值以及其生活方式—這應包含了經典文本所揭示的一切內容。²⁷

與其他一神教相類似的是，構成伊斯蘭的要件即為信仰 (*Aqidah*)，道德 (*Akhlak*) 和宗教規範 (*Syariat*)。其中信仰必須以遵守 (伊斯蘭) 規範來加以證明，如宣告真主為唯一真神 (此過程為 *Iqrar Syahadah*)，進行禮拜 (*Solat Fardu*) 等的五大功課以及遵從伊斯蘭法的制約等；若穆斯林僅遵從伊斯蘭的規範而沒有正確的伊斯蘭道德觀 (*Akhlak*)，則亦不算遵從伊斯蘭信仰。²⁸既然信仰和道德屬於個人形而上，內在精神層次的行為，他人無法輕易得知，那麼只有透過遵循外在整體生活的規範，才能對他人顯現出穆斯林的意義，並由此而產生穆斯林彼此間的共同認同與生活經驗。反之，如果不遵從伊斯蘭的外在規範，穆斯林就毫無意義。

一般而言，伊斯蘭在創立的起始迄至十九世紀末皆有嚴格的教法合一和政教合一的傳統，尤其阿拉的啓示 (即古蘭經) 本身就多方強調遵從伊斯蘭規範的必要性，因此正統伊斯蘭的信仰絕無法自許於伊斯蘭的規範之外。針對此項，啓示規定穆斯林必須接受經典內文的規範：

如古蘭經 Surah al-Nisa (第四章) 第一百零五節：

「我確已降示包含真理的經典，以便你據真主所昭示予你的 (律例)，而替眾人判決。你不要替奸人 (Khianat) 作辯護人。」

以及古蘭經 Surah al-Ma'idah (第五章) 第四十九和第五十節：

「你當依真主所降示的經典而替他們判決，你不要順從他們的私欲，你當謹防他們引誘你違背真主所降示你的一部份經典。如果他們違背正道，那麼，你須知真主欲因他們的一部份罪過而懲罰他們。有許多人，確是犯罪的。(以下為第五十節) 難道他們要求蒙昧時代的律例 (Hukuman Jahiliyah) 嗎？在確信的民眾看來，有誰比真主更善於判決呢？」

倘若穆斯林若不接受啓示內容的規範則會被視為不信者 (*Kafir*)，暴虐者 (*Zalim*) 和無神論者 (*Fasiq*)。²⁹而且穆斯林對啓示內容必須無條件地全部接受以作為其生活的整體；

如古蘭經 Surah al-Baqarah (第二章) 第二百零八節：

「信道的人啊，你們應當將整體融入伊斯蘭裡頭，不要跟隨撒旦的步伐，因為撒旦是你們明確的敵人。」³⁰

對於此項，阿拉的啓示也規定了穆斯林必須要**全盤接受**伊斯蘭法的規範，否則將會受極嚴厲的懲罰；

如古蘭經 Surah al-Baqarah 第八十五節：

「你們確信經典裡的一部份律例，而不信另一部份嗎？你們從中作此事者，其報酬不外今世生活中受辱，在復活日，被判最嚴厲的刑罰；真主絕不會忽視你們的行為。」

²⁶ 在此必須要說明的是，此種分類的方式並非一致公認之觀點，有些學者 (如中國學者陳嘉厚等) 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或伊斯蘭復興主義就是伊斯蘭現代主義，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亦認為其主張是為伊斯蘭現代化的唯一方式。

²⁷ 伊斯蘭黨前主席 Fadhil Nor 認為一個不完全接受伊斯蘭如不遵守伊斯蘭法的人就沒有資格被稱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見 Abdul Rahman, *Pemikiran Islam di Malaysia*, p. 19.

²⁸ Abdul Ghani bin Haji Idris, *Bagaimana Islam Berpolitik Memerintah (伊斯蘭如何在政治上扮演統治的角色)*. Kuala Lumpur: Al-Hidayah Publishers, 1999, pp. 5-7.

²⁹ Al-Quran, surah al-Ma'idah: 44-47.

³⁰ 參考《古蘭經中文譯解》，台北：中國回教理事會，1997年

因此，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基於阿拉以上的訓示，伊斯蘭的宗教規範就成為個人和整體生活的秩序，進而衍生為規範穆斯林，絕對至上的律法—伊斯蘭法（*Syariah*）。是以作為一個宗教意識形態政黨—伊斯蘭的政黨，就必須視推動落實全面性的伊斯蘭規範以及宣揚伊斯蘭信仰和價值為己任，否則便無法以伊斯蘭的代言者自居。而馬來西亞伊斯蘭黨（PAS）就經常以上述諸項啓示內容作為推動落實全面伊斯蘭規範，建立伊斯蘭的統治秩序—伊斯蘭政體的理论基礎。

三、伊斯蘭黨原教旨化過程及其對國內政治社會的影響

伊斯蘭黨於 1951 年在檳城（Pulau Pinang）創建時，就有主張在馬來西亞推動建立一個伊斯蘭政體，³¹惟當時馬來民族主義意識高漲，馬來社會普遍關切馬來人在建國後的權益以及如何和非馬來人分享政權的問題，使伊斯蘭黨的出現並未造成對當時馬來亞政治生態的衝擊。而後伊斯蘭黨在 Burhanuddin Al-Helmi（1956-1969）和 Mohamad Asri（1969-1983）的領導下採取比巫統更為激進的馬來民族主義路線，在政治舞台上其對伊斯蘭意識形態的論述反而較為薄弱，直至 1970 年代馬來西亞伊斯蘭復興運動崛起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才再度成為伊斯蘭黨的主要訴求。³²

隨著 1979 年伊朗透過革命創建了現代伊斯蘭政體後，伊斯蘭黨的政治生態也受到強烈的衝擊：最終使黨的領導層在 1982 年 10 月的黨代表大會後蛻變成一個由更為年輕，更為激進的原教旨主義者如法茲諾（Hj. Fadzil Noor）、Nakhaie Ahmad、Mustapha Ali 以及哈迪阿旺（Hj. Hadi Awang）等所把持。對這批少壯派領袖們而言，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成功不單給予穆斯林社群一個新的希望，更確立了一個由烏拉瑪（Ulama）所領導的伊斯蘭政體，重新賦予伊斯蘭學者—烏拉瑪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使烏拉瑪的角色跨越傳統上的禮拜所（*Surau*）和清真寺（*Masjid* or *Mosque*）的局限而無限躍升至國家領袖的層次；³³凡此種種，皆成為伊斯蘭黨邁入全面烏拉瑪領導時期的動力和原由，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方式和伊斯蘭政體的模式也就成為伊斯蘭黨的主要參考指標。³⁴1983 年 1 月伊斯蘭黨更派出三位新任黨領袖 Nakhaie Ahmad（新任副主席），法茲諾（新任署理主席）和 Mustapha Ali（新任青年團團長）出訪伊朗，與柯梅尼取得進一步的聯繫；³⁵緊接著就是黨與世界伊斯蘭發展結合的理念與政策的產生，並展開了由伊斯蘭學者—烏拉瑪（*ulama*）領導的時代。如此則連帶也使伊斯蘭

³¹ 伊斯蘭黨的前身是屬於巫統黨內一群由伊斯蘭宗教學者—烏拉瑪（Ulama）所自組的烏拉瑪聯盟（Ulama Union），該聯盟在主席 Ahmad Faud 的領導下於 1951 年 11 月 24 日由於不贊成巫統和非馬來人結盟，並且不滿巫統對非馬來人作過多的妥協以及無法提供更多伊斯蘭化的政策而脫離巫統自組另一政黨。因此伊斯蘭黨之創建實為巫統黨內派系鬥爭的結果。有關伊斯蘭黨創立的歷史背景和早期的發展進程，請參考 Safie bin Ibrahim. *The Islamic Party of Malaysia: Its Formative Stages and Ideology*. Kelantan: Nuawi bin Ismail. 1981. Pp. 8-69; 以及 Alias Mohamed., *PAS' Platform-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51-1986*, Kuala Lumpur: Gateway Publishing House Sdn. Bhd., 1994, pp. 1-59.

³² 有關 Burhanuddin Al-Helmi 和 Mohamad Asri 主掌伊斯蘭黨時的種種事跡，可參考 Mohamed, *PAS' Platform-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51-1986*, pp. 67-120.

³³ Nik Abd. Aziz, Tuan Guru. *Peranan Ulama Dalam Politik (烏拉瑪在政治上的角色)*. Kuala Lumpur: GG Edar. 1994. P. 19.

³⁴ 在筆者於 1999 年 8 月 29 日訪問吉蘭丹州伊斯蘭黨州政府策略研究中心主任 Encik Wan Nik Wan Yusoff 時間及當今伊斯蘭世界何國屬伊斯蘭政體時，所獲得的答案竟是沒有任何一個，當問及何者較為接近伊斯蘭政體的理想時，伊朗即為唯一的答案，而且也是伊斯蘭黨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但他卻強調不是全盤接受伊朗的國家理念與政策，而是依馬來西亞國情需要而作出調整，最明顯的例子是伊斯蘭黨仍然堅持保有蘇丹的體制，而非如伊朗般成立一個共和政體。

³⁵ Hussin Mutalib, *Islam and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3.

黨更進一步堅持其伊斯蘭政體的理想，使其本身邁入更為激進而全面的反體制的政治抗爭。

爲了進一步原教旨主義化，在 1983 年 28 屆黨代表大會上伊斯蘭黨黨綱遭到大幅度的修改。首先，大會增設一個黨的最高諮詢與領導機構—烏拉瑪（按：伊斯蘭學者）協商議會（*Majlis Syura Ulama*）。該議會雖然沒有實際的行政權力，但卻具備了以下的功能：

（一）對黨政策和黨綱在對應特定狀況而產生意義和目的上的含糊不明的情況下，負有作出陳述，釐清和詮釋的責任。

（二）對黨內所有成員下達指示和命令，讓黨的即定政策和宗旨得以被遵循與落實；並確保黨員在黨的任何活動與黨的管理上遵從黨綱的規範以及遵循黨的方針。

（三）維護和控制黨的紀律（*Tatatertib*），並委任所有紀律委員會（*Jawatankuasa Tatatertib*）的成員。³⁶

（四）在不違背黨的理念與政策的前提下，有權力決定任何在黨綱規範以外的事宜。³⁷

由此觀之，烏拉瑪協商議會（按：以烏拉瑪議會簡稱之）成爲黨理念與政策的最高常設詮釋與裁決機構。根據黨綱第七條之一，烏拉瑪議會對黨理念與方針的裁決依據有以下四種：天啓經文（*Kitabullah*）如古蘭經；先知言行錄（*Sunnah Rasul*）如穆罕默德聖訓；烏拉瑪的公議（*Ijmak Ulama*）以及過去伊斯蘭學者明確清楚的類比（*Qias or Analogical Reasoning*）裁示。³⁸不單如此，黨綱對烏拉瑪議會的成員有極爲嚴格的規定：

「烏拉瑪議會成員必須是一位了解伊斯蘭規範（*Syariat Islam*）的詮釋問題（*Al-Usul*）和伊斯蘭法律，而且能夠在處理問題時引用古蘭經，聖訓，公議和類比作詮釋，³⁹並充分了解其意義；而他除了必須不會犯下任何大罪（*Dosa Besar*）以外，⁴⁰也不能持續性地犯下小罪（*Dosa Kecil*），⁴¹同時也必須維護他的矜持（*Maruah*）並屬伊斯蘭黨之黨員」⁴²。

因此在新黨綱的規定下，伊斯蘭黨的最高領導階層只有屬資深伊斯蘭學者（更直而言應是資深的伊斯蘭法學家）的烏拉瑪方得以參與，而將一般的馬來民族主義者和廣大受西方教育的馬來政治參與者排除在外。透過烏拉瑪議會的成立，伊斯蘭黨得以確保黨的基本政策和方針附合伊斯蘭的精神，並以之呼籲建立伊斯蘭的兄弟情誼（*Persaudaraan Islam*）。⁴³在此我們可以將烏拉瑪議會類比成伊斯蘭政權的協商議會（*Syura*）制度，而大略建構出伊斯蘭黨對伊斯蘭政體的想法。基於以上的新規定，伊斯蘭黨遂在該次代表大會後正式向往昔的民族主義鬥爭告別而邁向爭取全面伊斯蘭鬥爭的烏拉瑪領導時代（*Zaman Kepimpinan Ulama*），⁴⁴而

³⁶ 黨綱第七條之三；見 *Perlembagaan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Pindaan 1993*（伊斯蘭黨黨綱—一九九三修正版），p. 5.

³⁷ 黨綱第七九條之二；見 *Ibid.*, p. 126.

³⁸ *Ibid.*, p. 4.

³⁹ 古蘭經，聖訓，公議和類比，加上理性推斷（*Ijtihad*）是伊斯蘭法詮釋方法（*Usul al-Fiqh*）的五大基礎。一般而言，嚴格的原教旨主義者反對應用推理論證，而只以上述四種基礎來論斷伊斯蘭法。關於伊斯蘭法的詮釋方法，請參考 Mircea Eliade, as editor in chief.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Volume 7, 1995, pp. 431-437.

⁴⁰ 此所謂大罪是以伊斯蘭的觀點審視之，而非刑法上的大罪。如婚外性行爲（*Khawat*），飲酒等即可構成大罪。

⁴¹ 所謂小罪，即不去禮拜，不交伊斯蘭稅捐（*Zakat*）等。

⁴² 黨綱第七條之四之（a）項。見 *Perlembagaan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Pindaan 1993*（伊斯蘭黨黨綱—一九九三修正版），p. 6.

⁴³ *Ibnu. Hasyim, PAS Kuasai Malaysia? 1950-2000*（伊斯蘭黨和巫統的衝突：一個以伊斯蘭爲依據的解決之道），Kuala Lumpur: Brother Press Ltd. Part. 1993, p. 287.

⁴⁴ *Ibid.*

黨的領導也由往昔的威權領導轉換成較為民主的聯合協商議會制度。⁴⁵

除了政治上強烈地反西方外，Yusuf Rawa 也提出現代伊斯蘭改革主義者 Mawdudi 的**文化復興運動 (Tajdid Hadhari)** 概念。Mawdudi 認為所謂復興 (Tajdid)，並不是尋求和蒙昧 (Jahiliyah) 合作的道路，亦非將蒙昧和伊斯蘭加以融合，而是將伊斯蘭從蒙昧的污點中加以淨化，並真誠地全力以赴以復興伊斯蘭。⁴⁶而文化復興 (Tajdid Hadhari) 之於伊斯蘭黨，就是使伊斯蘭黨成為推動體驗伊斯蘭 (Hadarah Islamiah)，促進社會改革和全面伊斯蘭化的動員力量；簡而言之，就是以伊斯蘭黨作為復興 (Tajdid) 的力量，重新復甦已流失的伊斯蘭光輝文明。其主要的政策就是將深受蒙昧文明 (Peradaban Jahiliyah) 所宰制的社會現況加以改變，從而建立起一個伊斯蘭文明 (Peradaban Islam) 的社會。

為達致文化復興的要求，穆斯林本身必須擁有認同的覺醒和全力的參與，以便從蒙昧的民族主義思想 (Hadarah Assabiah Jahiliyah) 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並透過思考方式 (Manhaj)、行動和伊斯蘭團隊持之以恆的施壓，方能提升鬥爭的效果，而最終使伊斯蘭超越其他一切宗教和生活形態而成為主宰全人類社會的永恆價值。⁴⁷由此看來，伊斯蘭黨將自己捲入世界伊斯蘭革命的潮流中。因此伊斯蘭黨事實上已超越了一般政黨的功能，而身兼傳播伊斯蘭以及推動全面社會革命雙重功能的宣教組織與革命團體。也就因為伊斯蘭黨原教旨主義者的介入，基於反世俗化的宗教使命，穆斯林政黨政治的競爭 (即巫統與伊斯蘭黨) 就被塑造成伊斯蘭與世俗化、信仰與不信仰的二元對立鬥爭。因此在伊斯蘭黨改造社會的號召下，首當其衝的就是 1980 年代馬來西亞穆斯林社會意識形態衝突的全面升高，最終更導致不幸的宗教流血衝突。

另一方面，1971 年由馬來西亞伊斯蘭青年運動 (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 ABIM) 發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猶如一把野火在全國掀起，影響所及不論是官方或私人團體皆致力於提高伊斯蘭在穆斯林社群中的地位並向非穆斯林推介伊斯蘭教，⁴⁸直至 1979 年伊朗革命後更激起另一波的高潮。有鑑於此，Hussein Mutalib 認為迄至 90 年代初期伊斯蘭復興運動對馬來西亞穆斯林社會產生了以下數項深刻的影響：

(一) 伊斯蘭復興運動使伊斯蘭的傳播由傳統的鄉村地區轉到都會地區，加速了都市地區馬來人伊斯蘭意識的覺醒，促進伊斯蘭的發展。⁴⁹

(二) 伊斯蘭化使眾多的馬來族群產生身份認同上的覺醒—穆斯林的認同更勝於馬來人認同，強調平等的伊斯蘭更不應被用以作為讓馬來人特權合理化的工具；但此種覺醒對馬來民族主義者而言卻形成認同上的衝突，即重生為馬來民族或重生為穆斯林的身份認同之爭。⁵⁰

(三) 伊斯蘭化高漲的呼聲對巫統政府形成前所未有的壓力，進而促成八零年代以降諸多伊斯蘭化政策的實施。

(四) 加速馬來族群的分化 (一造主張世俗化和民族主義，另一造主張生活各層次的全

⁴⁵ 伊斯蘭黨文膽 Ibnu Hasyim 更直指議會「Syura」的領導風格可帶領信徒們邁向天堂「Syurga」，見 Ibid., p. 388。

⁴⁶ Abul A'la Al-Maududi, *Gerakan Tajdid Islam (伊斯蘭復興運動)*, suntingan dan terjemahan oleh Abu Akhyar dan Elias Ismail (Abu Akhyar 和 Elias Ismail 校訂與翻譯), Alor Star: Pustaka Ikhwan, 1987, p. 42.

⁴⁷ Ibrahim Ahmad, *Konflik UMNO-PAS Dalam Isu Islamisasi (伊斯蘭黨和巫統在伊斯蘭化議題上的衝突)*. Kuala Lumpur: Buku Sdn. Bhd. 1990, pp. 82-85.

⁴⁸ Ab. Aziz Mohd. Zin, *Pengantar Dakwah Islamiah (伊斯蘭復興的傳播)*. Kuala Lumpur: Penerbit Universiti Malaya. 1997, p. 183.

⁴⁹ Mutalib, Hussin. *Islam and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 p. 155.

⁵⁰ Ibid., pp.158-161.

面伊斯蘭化並打破狹隘的馬來族群主義認同)，升高馬來社會在政治上的衝突。⁵¹

是以在伊斯蘭復興的大環境下，1980 年代初伊斯蘭黨在改組後將全面伊斯蘭的使命加諸其政治目標上，使政黨和宗教全然視為一體，因此衍生出一種強烈主觀情感判斷的**伊斯蘭情節**。所謂伊斯蘭情節，即是**基於伊斯蘭屬性 (Islamic Religiosity or Islamicity) 的差異，而在政治上賦予不同價值判斷的邏輯論述**。⁵²這種伊斯蘭情節用在政治競爭的操作戰略上，首先必須確認參與者（包括政黨領導人，黨工，黨員，和其他支持政黨活動的人）對伊斯蘭的虔信度，以作為判斷其政治主張之價值的參考座標，甚至作為政治活動和社會互動層面上敵我定位的指標。因此伊斯蘭情節在政黨的強力催化下，一些具爭論性的宗教詞彙如「*Kafir*」、「*Jahiliyyah*」、「*Murtad*」、「*Mati Syahid*」、「*Syuhadah*」和「*Bughah*」等也成為政爭的焦點，⁵³更成為指控對方的標籤。如此一來不僅使馬來族群間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的歧異上升為政黨政治的衝突課題，更造成馬來穆斯林社會前所未有的分化。⁵⁴

如在「不信道者與信道者的爭執議題 (*Isu Kafir-mengkafir*)」上，基層力量雄厚的伊斯蘭黨副主席哈迪阿旺 (Tuan Guru Haji Abdul Hadi Awang) 於 1983 年 4 月 7 日在爪拉丁加奴 (Kuala Terengganu) 的一場演講中暗示巫統領袖們為異教徒 (*Kafir*) 並呼籲穆斯林發動聖戰 (Jihad)，他將馬來西亞的憲法和法律制度裁定為不信道者和蒙昧的法律，故而穆斯林抵制和推翻之視同為聖戰，⁵⁵為推翻世俗化體制的政府而犧牲可被視為殉教 (*Mati Syahid*)；此宣言就成為哈迪阿旺個人的政治標誌 (按：或以「*Amanat Haji Abdul Hadi*」著稱，即「哈迪阿旺的訓示」⁵⁶)，更特別成為吉蘭丹州伊斯蘭黨新聞部的宣傳重點，⁵⁷一時廣為流傳，但也使得伊斯蘭黨和巫統的意識形態衝突無限揚升，最終在兩年後間接釀成馬來西亞建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宗教流血衝突—默馬里事件 (*Peristiwa Memali or Memali Event*)。⁵⁸雖然如此，烏拉瑪院主席 (*Ketua Dewan Ulama*) 聶阿茲也認為「哈迪阿旺的訓示」不單依據伊斯蘭的理念，而且也被接受為伊斯蘭黨

⁵¹ *Ibid.*, p. 155.

⁵² *Islamicity* 的形容乃是採用 Mutalib 的說法，見 Mutalib, Hussin. *Islam and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 p.159.

⁵³ 它們的意義依序為：「不信道者」或「異教徒」，「蒙昧無知的」，「叛教」，「殉教而死」，「殉教者」以及「叛亂份子」。

⁵⁴ Mutalib, Hussin. *Islam and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 p. 123.

⁵⁵ 請回見本文的楔子。

⁵⁶ Abdul Rahman Haji Abdullah, *Pemikiran Islam di Malaysia*, p. 362.

⁵⁷ *ibid.*, p. 356.

⁵⁸ 默馬里事件是為一場由 Ibrahim Mahmud (又稱 Ibrahim Libya) 所率領的默馬里伊斯蘭學堂 (Pondok) 師生和政府軍警間的流血衝突。Ibrahim Mahmud 曾為伊斯蘭青年團 (ABIM) 主席安華的得力助手，1974 年協助安華發動華玲 (Baling-為吉打州一個貧困的馬來鄉村地區) 馬來貧農的絕食示威；自 Al-Azhar 大學畢業後前往利比亞繼續深造，回國後在馬來西亞首相署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工作，後任職伊斯蘭研究中心 (Islamic Centre)；70 年代初期返鄉在默馬里村創立伊斯蘭學堂 (Pondok) 後逐漸使該地發展成一個伊斯蘭社區，並廣泛散佈激進的伊斯蘭革命思想；1982 年代表伊斯蘭黨參選州議員失敗後逐漸地在該地擁武器自重，引起當地群眾的不安。1984 年 9 月馬來西亞政府動用內部安全法令 (ISA) 擬逮捕他與其餘的四位助手，他本人由於受到該伊斯蘭社區成員的掩護而成功脫逃；1985 年 11 月 19 日聯邦軍警動用強大火力進入默馬里社區解除當地四百人的武裝，唯許多村民 (包括不少老弱婦孺) 圍繞在 Ibrahim 的居所高喊真主萬能 (Allahu Akbar) 而堅拒投降，並以簡陋武器 (開山刀，小刀等) 攻擊員警。較後在軍警的強行攻壓下造成 14 名村民死亡，4 名員警殉職的慘劇，而 Ibrahim 本人也被擊斃。警方較後逮捕了因擁武器而拒捕的 160 人 (其中年齡最小者為 11 歲)。基於 Ibrahim 本人以及村民與伊斯蘭黨深厚的關係 (按：大部份被捕成員皆為伊斯蘭黨黨員)，事後巫統指責伊斯蘭黨為此事件的幕後煽動者。見 Gordon Paul Mean, *Malaysia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8-129.

的鬥爭理念 (*Dasar Perjuangan PAS*)。⁵⁹再者，針對哈迪阿旺的言論，親伊斯蘭黨學者 Abdul Rahim Awang 就認為哈迪阿旺發動聖戰並支持殉教的宣言可能造成伊斯蘭黨和巫統的支持者兵戎相見的流血悲劇，此舉實乃破壞伊斯蘭最強調的穆斯林友愛精神，而且單憑政教分離的行為就判定一人甚或一黨為不信道者（即異教徒）更是過於牽強。⁶⁰

由此看來，巫統和伊斯蘭黨的政爭已在 80 年代進入全面泛意識形態化的局面，單純的政治或社會課題因受伊斯蘭情節的導引而成為以宗教信仰的是非觀來論斷的議題，雙方爭執的結果往往使雙方墜入無可轉調的二元對立 (*Dichotomy Opposition*)，而事實上雙方政黨往往並未察覺到其大部份的支持者皆屬於一個在生活層次上緊密重疊的族群——馬來穆斯林；一旦某一政黨的政權完全被賦予負面價值（如稱巫統為叛教者的指控），則不單任何的政治施惠和政治議題會變得毫無意義，而且人民也不再對該國家和政府有任何盡效忠的義務。因此，若以絕對是非論的叛教觀念來形容巫統政權，而以聖戰且準備殉教的觀念來形容反對其政權的政黨活動，則很容易造成穆斯林喪失對國家認同和效忠，近而危害國家體制的完整性。這在一個多元宗教，多元族群國家，而族群間常處於穩定又緊張關係的馬來西亞而言，實可能會導致國家社會的紛亂。

四、伊斯蘭黨對伊斯蘭化的思考邏輯

如前所述，伊斯蘭黨最高的黨紀律和行事準則就是古蘭經，聖訓，烏拉瑪的公議以及伊斯蘭法的類比 (*Al-Quran, Al-Sunnah, Ijmak ulama and Qias*)，唯獨缺詮釋自由度較廣闊的理性推斷 (*Itijhad*)。Ibrahim Ahmad 認為 1982 年伊斯蘭黨的改變就是依據古蘭經文 *Al-Baqarah* 篇之第廿零八節的指導而接受全部的伊斯蘭和導向阿拉之道；簡言之，伊斯蘭黨的鬥爭目的就是在馬來西亞塑造一個全面奉行伊斯蘭生活價值和伊斯蘭律法的社會與政體——即烏瑪和伊斯蘭政體。⁶¹而這一切皆充分反映在黨的新綱領上。首先，伊斯蘭黨將黨的政策從之前促進馬來族群權益和發揚伊斯蘭更改成僅定位為伊斯蘭，⁶²而黨的宗旨（或目標）亦清楚地定位為：

「為這個國家（按：即馬來西亞）追求塑造實施伊斯蘭生活價值且實行阿拉的和平律法的社會和政權而鬥爭；⁶³以及捍衛伊斯蘭的聖潔和國家的獨立主權。」⁶⁴

除此之外伊斯蘭黨亦在其黨綱第六條裡頭明確地訂下多達十一項的「伊斯蘭化」理念。綜合而合我們大致可以將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化理念與政策建構如圖表 1 的思考模式：

根據圖表 1 的模型，研究者以為，作為一宗教意識形態政黨，其所傳達和宣揚的就是一神教伊斯蘭的救世觀，透過以伊斯蘭為個人以至集體生活之整體 (*Au-din*) 的觀點建立一套以伊斯蘭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以改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種種困境，提升整體的生活品質；意即「達致阿拉的意願」 (*Mencapai Keredhaan Allah*)。⁶⁵

⁵⁹ 可見“*Amanat Hadi Jejas Kesucian* (哈迪的訓示破壞宗教的聖潔),” *Berita Harian* (每日新聞報), 20 February, 1986.; “*Syariat Haji Hadi Bincang Agama* (哈迪對宗教的言論),” *Berita Harian*, 21 February, 1986; 轉引自 Abdul Rahman Haji Abdullah, *Perikiran Islam di Malaysia*, p. 362.

⁶⁰ Abdul Rahim Awang, *Dosa-dasa Besar* (重大的罪行), pp. 114-115.

⁶¹ Ibrahim Ahmad, *Konflik UMNO-PAS Dalam Isu Islamisasi* (伊斯蘭黨和巫統在伊斯蘭化議題上的衝突). Kuala Lumpur: Buku Sdn. Bhd. 1990, pp. 21-22.

⁶² 黨綱第三條，見 *Perlembagaan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 Pindaan 1993* (伊斯蘭黨黨綱—1993 修正版), p. 2.

⁶³ 黨綱第五條之一；Ibid., p. 2.

⁶⁴ 黨綱第五條之二；Ibid.

⁶⁵ Fazdil Noor, “*Ucapan Muktamar Agung PAS ke 34* (伊斯蘭黨第三十四屆最高代表大會的之演講),”

(一) 回歸伊斯蘭的道路以解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貧困處境

首先，伊斯蘭黨在修改黨章後強調唯有回歸伊斯蘭的正道才能解決當前社會的一切問題，因此黨的首要任務就是宣揚伊斯蘭教義，也就是說，伊斯蘭是為一個宣教 (Dakwah) 的團體：

如黨綱第六條之一記載黨的第一項任務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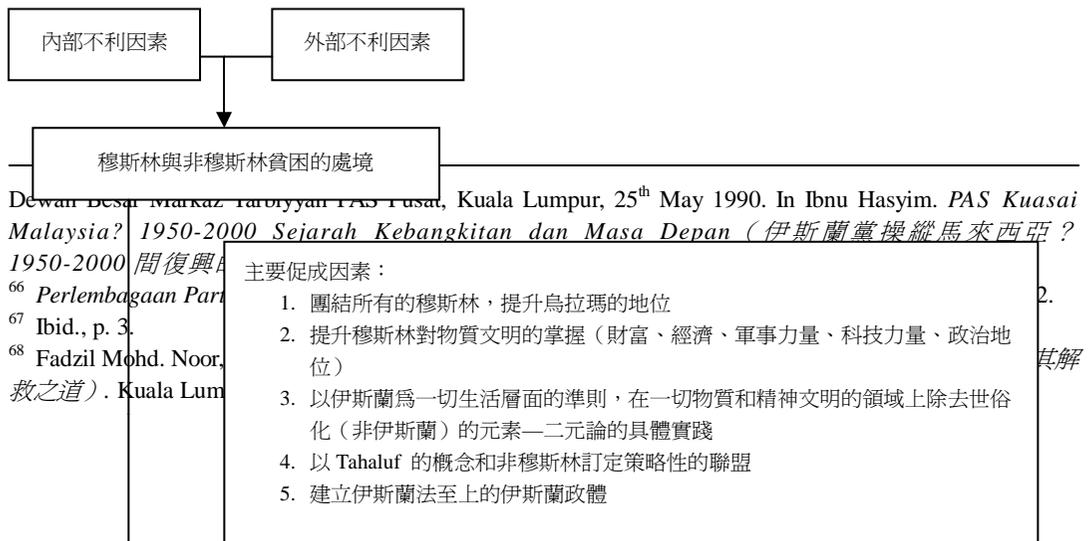
「透過口述，書寫和行為宣導的宣教方式呼籲全人類 (Umat Manusia) 接受阿拉的律法 (Syariat Allah) 和先知的聖訓 (Sunnah Rasul Nya)。」⁶⁶

而黨綱第六條之四更清楚表達黨宣教的意務：

「催促和鼓勵各個組織，團體，群體以至個人接觸、了解 (伊斯蘭) 和為伊斯蘭的人生觀和概念而鬥爭。」⁶⁷

因此根據黨主席法茲諾 (按：其於 1989 年上任至 2002 年 6 月逝世為止) 的說法，伊斯蘭黨不是一個僅為馬來族群或維護穆斯林地位而存在的政黨，而是為了達致阿拉的意願 (Mendapat Keredhaan Allah) 和實施其規範的而存在，⁶⁸換言之「伊斯蘭化」就是伊斯蘭黨的基礎理念：即透過具體的宣教 (Dakwah) 行為來改革國家和社會體制，以解決社會各成員的困境，落實社會各族群的長治久安。因此作為宗教意識形態政黨，伊斯蘭黨對當前社會困境的關切焦點不僅止於經濟，民生以及民主等有形的問題，同時也包含無形的道德墮落，個人信仰迷失的問題。

圖表 1 伊斯蘭黨對伊斯蘭化的思考模式



主要干擾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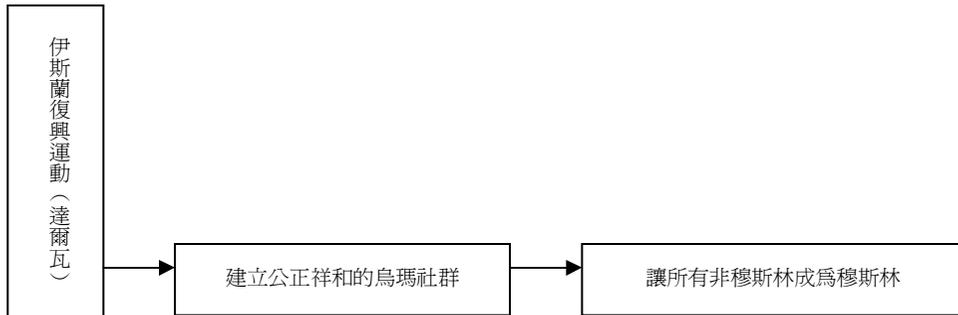
1. 穆斯林世俗化的政權與國家體制
2. 穆斯林世俗化的思想與生活方式
3. 分裂穆斯林社會的力量：穆斯林執政黨與西方世俗化的意識形態

註：圖表自製。

對於馬來西亞當前社會各種問題，法茲諾認為首要的根源就是基於社會成員對伊斯蘭的了解不足，而這還要歸咎於西方政教分離的世俗化思想：

「西方社會在政教分離後建構了以物質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生活哲學，但如今卻帶來了明確道德淪喪的新世代，如性泛濫，酒精，毒品，賭博和愛滋病正在吞噬歐洲的民族；雖然他們達成科技的進步，但這一切無助於社會和家庭的幸福與和諧」⁶⁹。

因此法茲諾強調西方對穆斯林社會殖民的結果就是造就了一個不了解伊斯蘭，只認為伊



斯蘭是一種個人信仰的世代，伊斯蘭只被視為一種與生活無關的信仰體系，不再是一種完善和合適的生活方式（按：在原教旨主義者的眼中，即使是不信仰者也需在某種情況下納入伊斯蘭的規範—如伊斯蘭政體裡的「*Dhimmi*」即為伊斯蘭社會中的非穆斯林）。因此殖民主義者成功地在被殖民的穆斯林社會當中塑造出各種分歧的思想，培養出一群只會從偏狹的民族主義來思考問題，而忘卻伊斯蘭崇高和整體性的特質（*Kesemestaan Sifat*）的穆斯林新世代；換言之這些受歐洲文明所教育的新一代只了解伊斯蘭的部份面貌，未能了解伊斯蘭的全部內容。基於能維護殖民者的利益和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力，這群人在殖民統治後繼承殖民者的政權，成為目前殖民後穆斯林國家的掌控者。因此當馬來西亞穆斯林取得獨立也就一併地繼承了殖民者所遺留的種種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思想上的問題（*Masalah Pemikiran*）：穆斯林已忘了阿拉所降示的是超越所有生活體系的獨一信仰（*Aqidah Tauhid*），同時也忘了古蘭經曾經成就了人類最崇高的文明。⁷⁰

顯然地，法茲諾認為伊斯蘭賦予先知和其繼承人的伊斯蘭精神已經不再見諸於當前掌握統治權的穆斯林領袖的身上，他們不再扮演政權信託人和人民福祉維護者的角色；反之任意處置國家和人民的財產；他們生活奢侈，寧願對抗和殺害自己的子民以換取一己的權力。因此作為伊斯蘭運動的組織，伊斯蘭黨扮演了凝聚和激勵穆斯林意識（*Kesedaran*）的角色，穆

⁶⁹ Fazdil Noor, "Ucapan Muktamar Agung PAS ke 34 (伊斯蘭黨第三十四屆最高代表大會的之演講)," In Ibnu Hasyim. *PAS Kuasai Malaysia? 1950-2000 Sejarah Kebangkitan dan Masa Depan*, p. 392.

⁷⁰ Fadzil Mohd. Noor, Hji., Haji Abd. Hadi Awang. *Perpecahan Bangsa dan Penyelesaian (民族的分裂和其解救之道)*. Kuala Lumpur: Dewan Pemuda PAS Malaysia. 1988, pp. 8-9.

斯林除應導正其行為和道德的認知外，也應更換即有的領導權，「假如阿拉許可 (*Insha Allah*)，伊斯蘭最終將成爲全人類的選擇，伊斯蘭將回歸而成爲領導，教育和組織人類的功能。」⁷¹是故，爲因應黨的任務，黨員應提高知識 (*Ilmu*)，增進伊斯蘭的理解，加重宗教的教育 (*Tarbiyah*)，提高紀律，團結一致，作出犧牲，維護宗教團體 (*Jemaah*) 並從事宣教 (*Berdakwah*)。⁷²

除此之外，傳統馬來穆斯林社會本身對伊斯蘭粗糙的了解也是當前穆斯林的主要問題。哈迪阿旺認爲自從伊斯蘭進入馬來西亞地區後，其教義往往摻雜了許多傳統習俗 (*Adat-adat*) 和蒙昧思想 (*Kefahaman Jahiliyah*) 而失去了伊斯蘭原本的純正性 (*Kesyumulan*)；英殖民時代前的馬來各邦國，馬來君主們和人民仍然受到蒙昧的族群意識 (*Asobiyah Jahiliyah*) 所牽引而分崩離析或甚至相互攻伐。而後殖民主義者進入馬來西亞地區，除了汲取殖民地的勞力與資源外，他們也意識到伊斯蘭是穆斯林力量的來源，因此遂有計劃地將世俗化的思想帶進此區域，使穆斯林背叛其信仰 (*Memurtadkan diri dari Islam*)，以致最後使伊斯蘭失去了其原有的角色，⁷³而這種情況仍持續至今。因此哈迪阿旺以爲當前馬來西亞伊斯蘭化的最大阻礙不單是非穆斯林長期擁有對伊斯蘭的錯誤認知，非穆斯林本身也不了解伊斯蘭。⁷⁴

總而言之，伊斯蘭黨的鬥爭不僅是反體制的鬥爭，而且兼負社會改革和宣教的責任；其追求的是創造一個以伊斯蘭爲最高指導原則，且不論是對穆斯林抑或是非穆斯林均絕對公正 (*Keadilan Mutlak*) 的烏瑪社群。⁷⁵伊斯蘭黨對於國家體制和社會改革的觀點，明確記載於伊斯蘭黨黨綱第六條之三：

「以伊斯蘭作為信仰 (*Akidah*) 和伊斯蘭法 (*Syari'ah*) 的理念而鬥爭，以之為政治活動和國家建設的指引，在促進包含統治，行政，經濟，社會，學術和教育的所有領域的公正與進步的努力上推介伊斯蘭的價值。」⁷⁶

(二) 宗教善惡二元論的全面落實

由於伊斯蘭黨身負宣揚伊斯蘭教的使命，因此在伊斯蘭黨的伊斯蘭道德倫理的訴求下，其擔負比一般政黨 (如巫統) 更大的社會責任—導正社會風氣，使之符合伊斯蘭的精神。以聶阿茲的說法：「除了伊斯蘭以外，世上沒有任何生活方式應被人類所採納 (*Tiada sistem yang patut dipakai melainkan Islam*)」。⁷⁷因此，由於全面的伊斯蘭化即是針對一切非伊斯蘭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伊斯蘭與非伊斯蘭截然二分的主張即應運而生。

對伊斯蘭黨而言，基於伊斯蘭和其他宗教文化的明確不同，爲了保持伊斯蘭的純正性，

⁷¹ Ibid, p. 393.

⁷² Ibid, p. 391.

⁷³ Ibid., pp. 25-26.

⁷⁴ *New Straits Times*, 9 February 1982, extract in: Alias Mohamad, *PAS' Platform-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51-1986*, p. 186.

⁷⁵ Abu Bakar Hamzah. *Parti PAS dengan Akalut Syasinya (伊斯蘭黨和其策略聯盟的主張)*. Kuala Lumpur: Media Cendiakawan. 1992, p. 59.

⁷⁶ *Perlembagaan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Pindaan 1993 (伊斯蘭黨黨綱—1993 修正版)*, p. 2.

⁷⁷ Tuan Guru Dato' Haji Nik Abdul Aziz bin Haji Nik Mat, 'Ucapan Majlis Sambutan Hari Raya Antara Kaum (各族群開齋節慶祝會開幕詞)', 17 February 1997, in: Dato' Haji Nik Abdul Aziz bin Haji Nik Mat. *Koleksi Ucapan Rasmi YAB Tuan Guru Dato' Haji Nik Abdul Aziz bin Haji Nik Mat, Menteri Besar Kelantan (吉蘭丹州務大臣，尊敬的導師哈芝聶阿茲聶曼開幕慶禮演講集)*. Kota Bahru: Dian Darulnaim Sdn. Bhd., 1999, p. 303.

伊斯蘭與非伊斯蘭的二分論必然成為黨理念傳播的一個重心。首先，二元論的分類代表的是強烈的敵我意識：即伊斯蘭的敵人（代表非伊斯蘭勢力）無時無刻都在打壓伊斯蘭。伊斯蘭黨長老會主席（*Pengerusi Dewan Ulama*）聶阿茲認為伊斯蘭的敵人可分為殖民主義者，東方主義者（*Orientalis*）和錫安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他們透過各種如傳播媒體，網際網路，非政府組織，各種娛樂設施等的方式來荼毒伊斯蘭社會和去除穆斯林的伊斯蘭屬性，使穆斯林社會的道德淪喪的問題日趨嚴重，甚至使叛教的問題一再發生。⁷⁸

其次，二元論的意義就是在堅持伊斯蘭的理想下，於一切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領域上除去世俗化與非伊斯蘭的元素，包含社會，經濟，文化，政治以致個人道德修養各方面。首先從社會規範的層面來看，由於巫統長期的政教分離政策，穆斯林社會遂因此而受非伊斯蘭的不良文化影響下而日趨墮落，因此伊斯蘭黨吉蘭丹州務大臣聶阿茲主張必須以伊斯蘭的觀點來加以導正，在此前題下（按：儘管馬來西亞擁有一個在西化程度上遠大於中東的社會），許多個人私生活行為也被置於公共規範的領域上，從婦女的工作權，人體影像的展示，個人宗教信仰的抉擇，飲食習慣的選擇，家庭成員的生活起居，服裝穿著的決定到男女社交活動的進行，莫不成為伊斯蘭黨所急欲關切和糾正的議題。而最有效的導正方法莫過於將之納入法律的強制規範；因此伊斯蘭黨在 1990 年執政吉蘭丹州後也就因為將此類議題置放在法律性規範的範疇下而引起掀然大波。

如關於男女隔離的事項，主要是涉及伊斯蘭黨對通姦（*Zina*）道德觀之權威界定，其認為通姦不但包含婚外性行為，也包括婚前性行為。以州務大臣聶阿茲的看法而言，為了制止通姦行為，以提升社會道德風氣，對一切通姦誘因（*Mukadimah zina*）的管制是伊斯蘭黨地方政府伊斯蘭化政策的重點，他認為男女自由混合交往的場所是培育強暴或通姦之誘惑的溫床，是故州政府必須利用公權力來制止未婚男女的親密交往行為。⁷⁹如他在一場訪談中提到：

「男子和女子在一個宴會相會將一定會產生問題，所以伊斯蘭教一開始就呼籲人們遠離通姦，不但是不要行通姦，而是要遠離通姦，如果我們（按：州政府）不小心處理男女交往的問題，男女的不當觸碰將會產生，通姦將會發生，遺棄嬰兒的事宜亦會發生，諸如此類等。」⁸⁰

由此州政府遂訂出一系列性別隔離的政策：其一為禁止理髮師為異性理髮—如此一來導致男子和女子的理髮廊必須作明顯的區隔，其二為禁止任何涉及穆斯林男女性同台協演的表演活動—如此一來一些傳統上在該州奉行已久的馬來歌舞劇（如 *Makyung*）或馬來舞蹈（如著名的弄迎舞）頓時在州內絕跡，其三為男性和女性的運動場所必須作區隔，其四為任何涉及穆斯林男女自由混合的公開娛樂或社交活動如迪斯可，搖滾樂演奏或男女性的聯誼活動等皆加以禁止；其五為在所有公開的官方儀式和公共場所男女性的坐位必須加以區隔，其六為購物中心的結帳櫃台必須依性別加以分隔⁸¹，其七為以維護性別的純潔（*Kesucian Seks*）為由

⁷⁸ Tuan Guru Dato' Haji Nik Abdul Aziz bin Haji Nik Mat, "Ucapan Rasmi Majlis Perasmian Masalah Murtad dan Penyelesaian di Malaysia (馬來西亞叛教問題和其解決之道研討會議開幕詞)," 1 October 1998, in Dato' Haji Nik Abdul Aziz bin Haji Nik Mat. *Koleksi Ucapan Rasmi YAB Tuan Guru Dato' Haji Nik Abdul Aziz bin Haji Nik Mat, Menteri Besar Kelantan*, p. 474.

⁷⁹ "Maksiat Merebak Keluar Kelantan (罪惡遠離吉蘭丹)," *Wanita (婦女雜誌)*, may, 1994, in: Nik Abd. Aziz, *Peranan Ulama Dalam Politik (烏拉瑪在政治上的角色)*, pp. 58-60.

⁸⁰ "Nik Aziz: Rakyat Tahu Siapa Benar (聶阿茲：人民知道誰是正確)," *Harakah* 7 July & 10 July 1995 in: Yusri Yusof, *Kelantan-Penentu Agenda Politik Malaysia (吉蘭丹：馬來西亞政治議題的決定地)*. Kuala Lumpur: Dalisi Communication. 1995, p. 117.

⁸¹ *Kelantan Membangun Bersama Islam (吉蘭丹和伊斯蘭一起發展)*. Kota Bharu: Urusetia Penerangan Kerajaan Negeri Kelantan (吉蘭丹州州政府編輯委員會). 1994, pp. 4-15.

推行新設住宅三個臥房的政策以推動男女性孩子分房睡的理念。

這種嚴厲規範穆斯林外在生活行為表徵的種種「伊斯蘭化」的措施，使多元宗教社會因伊斯蘭化政策的大量介入而深化了社會成員的二元對立，讓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更為涇渭分明：即穆斯林和「他者」的邊界建構於大量的生活實踐上，使穆斯林的整體生活籠罩在一個無形的道德壁壘內。在對內方面，無疑是藉由對共有的集體表象和準則的嚴格規範在穆斯林群體間塑造一個以共同認知為內涵的規範性集體人格（Group Personality）⁸²—集體的宗教性。再透過集體的宗教性驅使個人產生順從（Compliance），認同（Indentification）或內化（Internalization）的態度；在對外方面，則是對非穆斯林展示無所不在的伊斯蘭的集體宗教性，藉以達致涵化非穆斯林，讓非穆斯林也認同伊斯蘭價值，而使其產生內化並轉信伊斯蘭的最終目的。

（三）團結所有的穆斯林，提升烏拉瑪的地位

在馬來西亞獨立後的政黨政治史上，傳統伊斯蘭學者—烏拉瑪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執政黨巫統固然鮮少擁有烏拉瑪的國會代表，烏拉瑪出生的內閣閣員也寥寥無幾，而過去伊斯蘭黨本身的領導人也有許多是出生於非烏拉瑪的系統的西方教育體制（如 Mohamad Asri 等），1982 年伊斯蘭黨改革後最顯著的改變莫過於烏拉瑪地位的大幅上升。在烏拉瑪領導的呼聲下，伊斯蘭黨領袖甚至主張唯有烏拉瑪擔任國家的領導人，才能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此乃基於以下的理由：

1. 首先，伊斯蘭黨學者 Jamal Mahamad Lokman Sulaiman 認為烏拉瑪是代表「有智慧和有知識的人」，烏拉瑪在穆斯林社會即是一個了解和熟悉古蘭經與聖訓，並了解裡頭所記載的律法和規範，將之應用於生活的各個層面上的人。⁸³也就是說烏拉瑪是對伊斯蘭知識、律法和教義有深入了解，並擅長詮釋和應用伊斯蘭教義的宗教學者，而一個人擁有烏拉瑪的稱號代表穆斯林對他的學識，修養和信用的一種承認，因此基於以上種種因素，他們也就肩負著宣教，領導和管理穆斯林的責任。⁸⁴

2. 其次基於穆罕默德聖訓曾宣示「烏拉瑪們是先知的繼承人」，⁸⁵伊斯蘭黨新一代領袖相信烏拉瑪就是繼承先知穆罕默德的遺志，領導穆斯林的領袖。因為烏拉瑪提供穆斯林對伊斯蘭之儀式規範（Peribadatan）和哲學知識（Falsafah Ilmu）的理解，故而他們相信穆斯林的精神與物質的成長均來自於烏拉瑪的關切與教導。⁸⁶因此伊斯蘭黨採取烏拉瑪領導的方式不單是為了防止黨的鬥爭偏離伊斯蘭的道路，同時也彰顯「伊斯蘭政體的領導層必須是烏拉瑪」的訴求。⁸⁷

無疑地主張烏拉瑪領導不單是宣判巫統領袖的不適任，更是一舉否定馬來西亞含非穆斯林在內的所有黨派領袖的領導資格，換言之，在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基於只有伊斯蘭黨為唯一奉行烏拉瑪領導的政黨，除非巫統也採取烏拉瑪領導的方式（按：若果如此，則不單馬哈迪必須下台，巫統的所有內閣閣員和黨中央領袖都須辭職—因為他們皆非烏拉瑪。），否則目

⁸² 關於「集體人格」的論述，請參考王銘銘，《社會人類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第 272 頁。

⁸³ Jamal Mohd Lokman Sulaiman, *Biografi Tuan Guru Haji Nik Abdul Aziz*（*尊敬的導師哈芝霸阿茲傳*），Kuala Lumpur: Sulfa, 1999, p. 37.

⁸⁴ Ibid., p. 38.

⁸⁵ Ibid.

⁸⁶ Ibid., p. 39.

⁸⁷ Alias Mohamad, *PAS' Platform-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51-1986*, p. 189.

前全馬來西亞只有伊斯蘭黨才有資格成為執政黨。惟 1990 年伊斯蘭黨在和非穆斯林政黨結盟後，為免刺激非穆斯林政黨，引起非穆斯林的抵制，主張唯烏拉瑪才能領導國家的論調才不復出現。但縱觀伊斯蘭黨至今仍堅持烏拉瑪領導，並以烏拉瑪領導作為其伊斯蘭合法性權威的事實，其主張烏拉瑪領導的信念仍然是根深蒂固，並不因為被刻意的淡化而消散。

(四) 以 *Tahaluf* 的概念和非穆斯林訂定策略性的聯盟

在馬來西亞多元族群和多元政黨的環境下，過去伊斯蘭黨曾以激進馬來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改革的訴求而贏得位於半島東海岸，穆斯林佔九成以上的丁加奴和吉蘭丹兩州穆斯林的支持，同時也在半島西海岸的吉打和玻璃市兩州擁有一定的支持力量，因此伊斯蘭黨創黨以來歷屆國會議員絕大部份皆出自於以上四州，⁸⁸但也因為激進馬來民族主義和伊斯蘭的訴求，而相對也使其失去非穆斯林的支持，因此伊斯蘭黨欲跨出以上傳統的馬來州屬，進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性政黨，首先就必須要爭取廣大非穆斯林的擁護，否則伊斯蘭黨將永不可能取得執政黨的地位。在旺盛的執政企圖下，伊斯蘭黨遂提出了「結盟」——*Tahaluf* 的概念。

「*Tahaluf*」一詞是指因共識而達成的契約。哈迪阿旺認為伊斯蘭是團結所有人類，促進族群融合的意識，而非語言、血統、意識形態和地域主義，因此穆斯林有責任透過和平共處的方式將伊斯蘭價值傳播至非穆斯林社群。⁸⁹而 *Tahaluf* 的概念在政治上的運用就是為了追求塑造一個伊斯蘭的政權而和其他不同意識形態政黨所組成的政治聯盟。主要的理論基礎就是依據先知的事跡—穆罕默德本身也曾經多次接受非穆斯林的援助，更曾經和非穆斯林一起協力對抗外侮。因此「*Tahaluf*」即為互諒 (*Muwada'ah*) 和互助 (*Isti'annah*) 的合作關係。哈迪阿旺認為「*Tahaluf*」的過程可展現在兩種階段，其一是在成立伊斯蘭政體的階段：即伊斯蘭政體必須取得其他信仰族群的同意與背書，就如同先知穆罕默德在成立麥地那政權時也必須和猶太人 (*Orang Yahudi*) 訂定麥地那憲章一樣；其二是在宣教的階段，其中又可分為以下幾種狀況：

1. 當面對共同的敵人時。
2. 當一起共同反抗暴虐、濫權的統治時。
3. 當穆斯林處於貧困的境況時。
4. 當沒有違背伊斯蘭的教義和阻擾宣教時。⁹⁰

如此伊斯蘭黨不但可以透過與非穆斯林團體的互助合作「向非穆斯林傳播伊斯蘭恆久優越的信仰價值」⁹¹，也可以拓展伊斯蘭黨的政治實力。

伊斯蘭黨首次的政治聯盟就是在 1986 年初和霹靂州以及雪蘭莪州的華裔知識份子成立一個華人諮詢委員會 (*Chinese Consultative Council*)，並達致共同的合作協議與認同，其中除了反對黨一貫主張的保障人權、促進社會公義和國家發展的宣言外，其他主要內容尚有：

1. 突破族群主義框架的宣言：所有人皆為平等，所有族群、文化、語言和宗教必須被尊重。所有國民一律平等，沒有佔領者和被佔領者；土著和非土著之分，於是乎，所有馬來西亞公民是為馬來西亞人，而非馬來西亞華人或馬來西亞馬來人。

2. 承認伊斯蘭政體的宣言：如宣示穆斯林社群必須施以伊斯蘭法的統治，而非穆斯林則

⁸⁸ 馬來半島一共有十一州和一個聯邦直轄市—吉隆坡，其中馬來人佔九成以上的州屬為吉蘭丹州，丁加奴州，佔七成以上的為玻璃市州，吉打州，佔一半以上的為霹靂州，彭亨州，柔佛州。

⁸⁹ Hamzah., Abu Bakar, *Parti PAS dengan Tahaluf Siyasinya* (伊斯蘭黨和它的政治聯盟). p. 58.

⁹⁰ *Ibid.*, pp. 73-75.

⁹¹ *Ibid.*, p. 76.

受世俗法所管制；烏拉瑪是國家的重要諮詢對象，惟國家必須奉行民主代議制。⁹²

由此可見，雖伊斯蘭黨得以透過成立華人諮詢委員會而首次展開和非穆斯林的合作，但此合作的前提是後者必須接受伊斯蘭黨的伊斯蘭政體主張。因此和巫統不同的是，伊斯蘭黨視政治聯盟—「*Tahaluf Siyasi*」為宣教和成立伊斯蘭政體的必要步驟，而非一種改變原則的妥協。

惟 *Tahaluf* 概念真正發揮其成效的是 1999 年 11 月的全國選舉，在該次選舉中伊斯蘭再度運用 *Tahaluf* 的概念和非穆斯林社會主義政黨—民主行動黨正式結盟。惟為了取信於非穆斯林政黨，伊斯蘭黨首次擱置伊斯蘭政體的主張，而事後的結果證明這是一項極佳的政治策略。

（五）建立公正祥和的烏瑪社會，讓所有人類信仰伊斯蘭教

最後基於伊斯蘭是阿拉降示人間的信仰之道，聶阿茲認為人類不能自身於古蘭經和聖訓的規範之外，而真神阿拉將檢視所有人類的一切行為並對他們的後世作獎懲，而今生和後世之於人類，就如同人類的少年和老年一樣，是不可逃避的宿命。因此伊斯蘭是人類絕不能拒絕的宗教，人類如要追求永生的幸福，就必須要跟隨古蘭經的指示，順從阿拉的意志。⁹³另外，穆罕默德的言行就是帶給全人類通往天堂的道路，引導人類朝向永生。因此穆斯林必須以敬畏阿拉的態度來依循阿拉的教條，遵從穆罕默德的言行。⁹⁴

是故，伊斯蘭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傳播伊斯蘭信仰（即宣教），並根據阿拉在古蘭經的指示推動建立一個伊斯蘭的生活方式，以帶領人類步入永生的後世，⁹⁵而政治鬥爭的途徑只是伊斯蘭黨一個宣教的補助過程，其終極目標是向非穆斯林宣教以及導正穆斯林的信仰方式；而若非穆斯林仍然堅持不信仰伊斯蘭，則至少也要達到讓非穆斯林接受伊斯蘭的政治秩序（按：即伊斯蘭政體）之要求，因為伊斯蘭的政治體系就是針對多元信仰和多元文化的環境而設，具有包容多元，尊重少數的世界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皆各自有其規範和地位。⁹⁶是以聶阿茲主張，基於伊斯蘭並非儀式，而是解決人生一切問題的生活規範，為了確保伊斯蘭的規範都能確實落實，因此伊斯蘭政權就有存在的必要。⁹⁷

五、伊斯蘭黨對伊斯蘭政體的理念分析

「伊斯蘭政體是絕不能被妥協的宗教責任。」

正如哈迪阿旺在 1999 年 5 月的一場訪問所言，堅持伊斯蘭政體是絕不能被妥協的宗教責任（*Kewajipan Agama Islam*），伊斯蘭黨的責任就是向社會傳達伊斯蘭政體的理念—特別是對非穆斯林傳遞伊斯蘭政體的包容和公正的思想。⁹⁸殖民地的統治將馬來穆斯林導向世俗化的生

⁹² *Ibid.*, pp. 43-45.

⁹³ Nik Aziz Nik Mat, *Asas Pentadbiran Islam* (伊斯蘭的統治原則), pp. 12-13.

⁹⁴ *Ibid.*, pp. 26-28.

⁹⁵ 見古蘭經第二章（*Surah Al-Baqarah*）第二零八節：「信道的人啊，你們應當將整體融入伊斯蘭裡頭，不要跟隨撒旦的步伐，因為撒旦是你們明確的敵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相關理論基礎請回見本論文第三章。

⁹⁶ 'PAS Tetap Dominan, Wawancara dengan Ustaz Nasaruddin Mat Isa, (伊斯蘭黨仍然掌權，和那沙魯汀的訪談)' in: Suria Janib ed. *Pertagungan Sengit Kali ke-10* (第十次的激烈對峙),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Hemah, 1999, p. 32.

⁹⁷ Nik Abdul Aziz Nik Mat, *Asas Pentadbiran Islam* (伊斯蘭的統治原則), p. 16.

⁹⁸ 'Wawancara dengan Ustaz Abdul Hadi Awang (和哈迪阿旺的訪談)', 13 May 1999, in: *Detik* (點滴月刊), 1 Jun 1999, p. 28.

活方式，使伊斯蘭失去其原有的至高地位。雖然馬來穆斯林仍然是伊斯蘭的信仰者，但他們對伊斯蘭認知和了解的途徑卻受到殖民者的控制，使他們以西方宗教觀點（*Takrif Agama Barat*）的途徑來了解自身的信仰。

針對由殖民地時代存續至今的馬來西亞伊斯蘭行政機構，⁹⁹哈迪阿旺有著尖銳的批評，他以為英殖民政府乃為討好馬來穆斯林而在馬來半島各邦成立了宗教事務局（*Jabatan Hal-Ehwal Agama Islam*）或伊斯蘭教暨馬來習俗委員會（*Majlis Agama Islam dan Adat Istiadat Melayu*）。而事實是英政府利用此種機構監控馬來穆斯林在宗教上的活動，使其被限制在官方允准的範圍內。殖民者以他們自己對伊斯蘭的詮釋來訂定自己一套的伊斯蘭法（按：其刑罰的額度和管轄的範圍較原本的伊斯蘭法寬鬆許多），卻又用這些法律來強加諸於穆斯林身上；如此的統治方式經由殖民官員的經營與服從殖民政府的馬來穆斯林之協助下得以發展成為今日國家對伊斯蘭採政教分離的管理辦法。¹⁰⁰

同時殖民主義所帶來的「現代化教育」也造就了一大群寧願迷信外來意識形態可以解決國家和穆斯林問題，而不採取伊斯蘭解救之道或甚至對伊斯蘭不甚了了的馬來統治精英。這一群以世俗化為治國方針的統治精英在殖民主義者的刻意安排下接收了國家獨立後的政權，以協助殖民主義者維護其在本地的利益。而這些掌權者盡其所能地堅決反對伊斯蘭國家／政體的建立（按：如馬來西亞第一任首相東姑拉曼）。因此不難理解由於殖民主義者的操弄，國家遂分裂成捍衛世俗化政體和堅持伊斯蘭政體的兩大群體。¹⁰¹哈迪阿旺援引古蘭經 *Al-Imran* 第一百和第一百零一節的規定認為穆斯林以西方意識形態治國的態度實違背了伊斯蘭的基本精神：

「信道的人們啊！如果你們順從曾接受一部份啟示經文的人（按：即指基督徒和猶太教徒，或新舊約聖經的信奉者），那麼，他們將使你們在信道之後變成不信道的人（*Engkar*）（見古蘭經 *Al-Imran*（第三章）第一百節），你們常常聽見別人對你們宣讀真主的跡象，使者（*Rasul*）又與你們相處，你們怎麼能不信道呢？誰信託真主的宗教，誰確已被引導於正路（見同一章第一百零一節）」。¹⁰²

他強調馬來西亞處處存在著這些啟示經文信奉者（*Ahli Kitab*—即基督徒）的安排與設計：使伊斯蘭無法超出宗教儀式的範圍，影響所至，穆斯林以各種外來的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來尋求國家的出路，他們不單阻撓全面回歸伊斯蘭的呼籲，也因為這些外來的意識形態的分歧而相互爭鬥。¹⁰³

從伊斯蘭政體的論述就可得知伊斯蘭黨不單要變更政府，而是要變更政府的制度，其反對的不是議題的反對（*Opposition on issues*），而是對原則的反對（*opposition on principle*），是故其是為一個反體制的政黨，即其自身因受到信仰系統的約束，而不支持在該政治體制運作

⁹⁹ 馬來西亞伊斯蘭的管理機構乃是獨立於一般行政單位以外的特定機構，伊斯蘭的管理主權乃由各州所決定。

¹⁰⁰ Fadzil Mohd. Noor and Hadi Awang. *Perpecahan Bangsa dan Penyelesaian*（民族的分裂和其解救之道），p. 26.

¹⁰¹ *Ibid.*, pp. 27-28.

¹⁰² 以上經文譯述引自：《古蘭經中文譯解》，台北：中國回教理事會，1997年，第三十九至第四十頁，以及哈迪阿旺本人對經文的翻譯，見 Fadzil Mohd. Noor, Hj., Haji Abd. Hadi Awang. *Perpecahan Bangsa dan Penyelesaian*（民族的分裂和其解救之道），p. 29.

¹⁰³ Fadzil Mohd. Noor, Hj., Haji Abd. Hadi Awang. *Perpecahan Bangsa dan Penyelesaian*（民族的分裂和其解救之道），p. 30.

下的價值觀。¹⁰⁴

哈迪阿旺認為馬來西亞憲法始終脫離不了殖民主義的色彩，因此穆斯林有責任解放世俗化憲法對國家和人民的箝制。而基於馬來西亞政體的世俗化乃是導因於馬來西亞「世俗化」的憲法，倘若伊斯蘭黨成為國家的執政黨，黨首要政策就是推介伊斯蘭式的社會公正，反對任何的暴虐，歧視，雙重標準以及貪污的行為，以及主張對馬來西亞憲法作出大幅度的更動：以伊斯蘭的方式來重新詮釋馬來西亞憲法。¹⁰⁵但基於黨綱第六條之十一的規定，此種修改憲法，更改國家體制的行為必須符合馬來西亞憲法賦予的程序：

「在國家憲法和國家法律的範圍內行使任何的努力與行動以達致黨內外的目標」。¹⁰⁶

以 Satori 對政黨的長期觀察而言，政黨和叛亂組織最大的分野就是在於對國家法律的遵從，政黨之被接受及其正常運作，必須以憲法統治下的和平環境為前提。¹⁰⁷由此可見，雖然伊斯蘭黨為強烈反體制的政黨，但無疑其必須對當下國家的體制與架構作出妥協，並在國家世俗化體制的規範下來爭取其政治訴求。

「伊斯蘭黨的伊斯蘭政體的內涵以及其實踐的重點。」

基於伊斯蘭為至高主權，聶阿茲認為，人類政治行為的重點不在於如何創造法律和社會秩序，而是如何貫徹阿拉的意志。如果一個政體的法律偏離了阿拉的意志，那麼該政體就失去了權威性，¹⁰⁸而伊斯蘭法就是阿拉為保障人類和平而降示的天啓計劃（*Program Langit*）。因此人類並無權任意創制法律，人類在制定法律的同時也必須要考慮到其對在今生和後世之間的效益。是故人類必須要全心全意地接受包括伊斯蘭刑法在內的所有的伊斯蘭法，惟有完全遵從伊斯蘭法，才會促進人類最大的福祉，而當伊斯蘭法被忽視時，貪污、濫權和道德敗壞的種種情事才會發生；¹⁰⁹因此以信仰之原則來治國是穆斯林的責任，一個人類的政體必須全面實施伊斯蘭法。¹¹⁰由此觀之，全面實施伊斯蘭法是為伊斯蘭政體最主要的實踐事項。

對於哈迪阿旺而言，伊斯蘭政體對非穆斯林最重要的包容就是伊斯蘭的公正原則（*Keadilan Islam*）；他堅信伊斯蘭政體對公正原則的實施甚至比非穆斯林基於本身族群文化和宗教所建立的政體更為透徹，而基於此項理由非穆斯林也應接受伊斯蘭政體的理念。¹¹¹而這種公正原則所昭示的就是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社會機制，因此伊斯蘭黨堅信伊斯蘭政體事實上就是最適合多元族群環境的一個政治秩序。

惟伊斯蘭政體的族群平等主義精神卻和馬來西亞由族群主義（*Racialism*）主導的政經體制有所抵觸，同時伊斯蘭黨自身過去比巫統還要激進的馬來族群主義的理念也束縛了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化路線。有鑑於此，伊斯蘭黨在改革後遂展開意識形態的去族群化，以作為實踐

¹⁰⁴ 關於反體制政黨的定義，請參考薩托利（Sartori, Giovanni）著，雷飛龍譯，《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台北：韋伯文化事業，2000年，第162至163頁。

¹⁰⁵ Wawancara dengan Ustadz Abdul Hadi Awang（和哈迪阿旺的訪談），13 May 1999, in: *Detik*, p. 30.

¹⁰⁶ *Perlembagaan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Pindaan 1993*（伊斯蘭黨黨綱一九九三修正版），p. 4.

¹⁰⁷ 薩托利，《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第18頁。

¹⁰⁸ Nik Abdul Aziz Nik Mat, *Asas Pentadbiran Islam*（伊斯蘭的統治原則），p. 14.

¹⁰⁹ *Ibid.*, 16-18.

¹¹⁰ *Ibid.*, 24-28.

¹¹¹ 筆者發現此言論是哈迪阿旺的招牌論調，與此類似的說法竟見諸於兩筆相隔十一年的訪談資料，而內容竟是完全一致！由此可見伊斯蘭黨理念的穩定性。見“PAS dan Arah Perpaduan Ummah – Wawancara dengan Tuan Guru Haji Abdul Hadi Awang（伊斯蘭黨和烏瑪社群的團結出路—和哈迪阿旺的訪談）”，in *Al-Ummah*, Septembar 1989. 以及“Wawancara dengan Ustadz Abdul Hadi Awang（和哈迪阿旺的訪談）”，13 May 1999, in: *Detik Jun*, p. 30.

伊斯蘭政體的理論基礎。

哈迪阿旺認為只有伊斯蘭才能帶來團結與和平，而非過去所強調的民族主義，¹¹²而族群特權事實上違反了伊斯蘭的平等和公義的原則，因此一旦伊斯蘭黨執政後馬來西亞的馬來政經特權就應該被取消。¹¹³對此聶阿茲更進一步地主張伊斯蘭是為全人類的宗教，所有族群皆是源自於同一祖先（即亞當和夏娃），因此國家沒有必要動用公權力照顧特定的族群（按：此是指以血緣區分的族群，非宗教信仰的族群），若華人信仰伊斯蘭，反而能以其勤奮的特質帶動馬來西亞穆斯林社會的進步。¹¹⁴而在文化傳承的問題上，伊斯蘭黨刻意採取比巫統更為開明的態度。現任伊斯蘭黨青年團主席 Mahfuz Omar 表示語文是阿拉的恩賜，因此其是每個族群的權利，對伊斯蘭黨而言，使用母語或華校的存在根本不是問題，伊斯蘭黨絕對不會反對母語教育。¹¹⁵而事實上伊斯蘭黨在吉蘭丹州的統治就是一個準伊斯蘭政體的模式，作為一州的行政首長，聶阿茲以先知穆罕默德本身也曾親自探視患病的猶太人作為例子，主張州政府應以公正的態度對待州內各族群，是故其將州政府的麥加走廊基金（*Tabung Serambi Makkah*）的援助範圍擴張到非穆斯林的貧戶上，並親身走訪華人村莊，¹¹⁶甚至也進入神廟參加華人的慶典。而展現對非穆斯林的包容。¹¹⁷

由此看來，包容族群的多元性是為伊斯蘭黨實踐伊斯蘭政體的第二項要件。而實踐伊斯蘭政體的第三項要件即為全面實施伊斯蘭法——其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就是伊斯蘭刑法。

六、伊斯蘭黨對伊斯蘭刑法主張之探討

（一）伊斯蘭刑法的歷史淵源與地位

伊斯蘭夏菲法學派（Shafii）主張刑事罰則可分成三大類，其一為固定刑罰（*Hudud*）；包括通姦（*al-zina*）、偷竊（*al-sariqah*）、偽造通姦的指控（*al-qadhif*）、飲酒（*al-syurb*）、搶劫（*al-hirabah*）、叛教（*al-riddah*）和反叛伊斯蘭政權（*al-baghy*）；其二為人身傷害的刑罰——“*Qisas*”，¹¹⁸其三為其他「必須協商」的刑罰——“*Ta'zir*”，¹¹⁹為前兩種罪行以外的一切過失之懲罰。而不論是在懲罰方式，和審理程序方面，其中爭議性最大的就是固定刑罰（*Hudud*），而吉蘭丹（Kelantan）伊斯蘭黨州議會於1993年11月25日所通過的就是以固定刑罰（*Hudud*）為主的伊斯蘭刑事條款（*Enactment Syariah Criminal Code—2 Bill 1993*）。

伊斯蘭刑法之阿文為「胡督」——“*Hudud*”，意指確立的判決（*Hukum Tetap*），¹²⁰又表防範，

¹¹² Hamzah, Abu Bakar ed. *Kafir Sebab Perlembagaan* (因為憲法而成為不信道者), Kuala Lumpur: Media Cendiakawan Sdn. Bhd, 1992, p. 2.

¹¹³ *The Star*, 12 February 1986; retake in: Mutalib, *Islam and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s*, pp. 171-172.

¹¹⁴ Nik Aziz: *Rakyat Tahu Siapa Benar* (聶阿茲：人民知曉誰是正確的)，in: *Harakah*, 7 July 1995；此外，相關的論調也請回見本章的楔子。

¹¹⁵ 〈指責部份傳媒蓄意抹黑，回教黨非極端主義〉，《星洲日報》，1999年8月14日。

¹¹⁶ “Perlaksanaan Islam di Kelantan (伊斯蘭在吉蘭丹的實施),” in *Tamadun* (文化月刊), January 2001, p. 41.

¹¹⁷ 關於聶阿茲到佛寺和神廟主持儀式一事，請見〈外州人看吉蘭丹，回教黨塑造親民形象〉，《星洲日報》，2000年1月31日。

¹¹⁸ Mahmood Zuhdi. Abd Majid, *Pengantar Undang-undang Islam Di Malaysia* (伊斯蘭法在馬來西亞的傳播), Kuala Lumpur: Pernebit Universiti Malaya..1997, p.136.

¹¹⁹ Muhamad S.El-Awa, *Hukuman Dalam Undang-undang Islam-Satu Kajian Perbandingan* (伊斯蘭法律中的判決——一個比較的研究), 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9, p. 2.

¹²⁰ *Ibid.*, p. 1.

禁制之意，為「赫」—“Hadd”之複數。¹²¹所謂「赫」，就是天啓—古蘭經或聖訓內所確定的懲罰事項，為阿拉直接降示人間的刑罰。而以赫為依據的懲罰即稱為「確定懲罰」(*Hukuman Hadd*)；「確定懲罰」有三項特色：其一為它所施予之對象是全體人類，其二為其刑罰的額度不得任意更改，其三為其一經進入判決程序，受刑人絕不能被任何人赦免。¹²²又，基於伊斯蘭刑法對特定刑如偷竊罪處以截肢的極刑，¹²³因此伊斯蘭刑法又以其截肢的懲罰方式而引起當代法學家的矚目。至於古蘭經所明確規定的確定懲罰計有：通姦、偷竊、偽造通姦的指控和搶劫四項。故而以上的四項罪行之懲罰方式必須完全遵循古蘭經的規定。

當代伊斯蘭法律學者 *Muhamad S.El Awa* 認為夏菲法學派是以法律的應報原則來視作「赫」的內涵：「即一個人必須要為其所付出的行為作出應當的懲罰」。這和法學傳統上的應報主義相附：即刑罰之標準、目的、及其合理性，應視犯罪之性質為轉移。¹²⁴由此主義更導致「罪刑法定主義」：即刑罰乃犯罪之報應，其目的在對於犯人及一般社會加以威嚇，俾預防將來之犯罪，故又謂之一般的預防主義，由此也可衍生出所謂的「事實主義」和「道義責任論」，¹²⁵相較其他法律系統，預防主義就是伊斯蘭「確定懲罰」中最為顯著的理論基礎，而其所達致的效果也最為顯著。如鄂圖曼帝國在統治阿拉伯半島期間不曾實施伊斯蘭刑法，搶劫和偷竊案例亦頻頻發生，但瓦哈比運動在 1920 年代陸續控制半島全境後隨即在此地區嚴格實行全面的伊斯蘭法，使半島上的治安明顯改善：而廿世紀第一個全面實施伊斯蘭法的現代國家即為奉行瓦哈比運動教義的沙烏地阿拉伯。以偷竊為例，沙烏地阿拉伯在實施伊斯蘭刑法後到 1970 年為止平均一年發生不到兩宗的偷竊案例。¹²⁶此外，基於防範罪案的效果，以及古蘭經對通姦懲罰的行刑過程必須公開展示之規定，傳統上伊斯蘭法學者（稱“*Fuqaha*”）皆主張伊斯蘭刑法的行刑過程必須公開執行。¹²⁷

總而言之，伊斯蘭刑法 (*Hukum Hudud*) 來自於古蘭經和聖訓所明確規定之懲罰，因此以原教旨主義的觀點而言，一個堅信古蘭經為天啓的穆斯林並沒有權利拒絕或懷疑伊斯蘭刑法的正當性。而由於其來自於天啓，故而伊斯蘭主義者皆稱之為阿拉之法 (*Hukum Allah*)。

（二）伊斯蘭黨實施伊斯蘭刑法的相關理念與問題

伊斯蘭黨實施伊斯蘭刑法的決心可從現實面和道德面來思考，從現實面而言，其相信伊斯蘭刑法能有效遏止罪案的發生，而從道德面而言，其卻是一種信仰的使命，藉由此建構連繫今生和後世的神聖世界。因此，若然將「胡督」的實施視為一種絕對堅定的信仰和神聖的使命，則伊斯蘭黨對實施「胡督」一事就極難有轉圜的餘地。

因此伊斯蘭黨在 1982 年原教旨主義化後就開始主張伊斯蘭刑事法應在馬來西亞實施。但

¹²¹ Abdur Rahman I Doi, *Syariah: The Islamic Law*. Kuala Lumpur: A.S. Noordeen. 1996, p. 211.

¹²² Muhamad S.El-Awa, *Hukuman Dalam Undang-undang Islam-Satu Kajian Perbandingan (伊斯蘭法律中的判決——一個比較的研究)*, p. 2.

¹²³ 古蘭經第五章 (Surah al-Ma'idah) 第三十八節：「偷竊的男女，他們的手當被割去，以作為他們行為的報應，以作為真主阿拉的懲戒判決。」轉引自：Abdul. Latif Muda. *Ulum Syariah (伊斯蘭法概要)*. Kuala Lumpur: Cahaya Pantai (M) Sdn. Bhd. 1995, p. 331.

¹²⁴ 鄭玉波著，黃宗樂校訂，《法學緒論》，第十三版（1971 年 1 版），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第 181 頁。

¹²⁵ 所謂「事實主義」，就是指刑法的刑罰既以犯罪之事實為對象，並非以犯罪者之人格為對象；不過此主義亦不僅單純著眼於犯罪行為，仍將行為意思作為犯罪責任之基礎。則仍認為犯人之犯罪係基於自由意志而然，則犯人本身即應負道義責任，故也謂之「道義責任論」；見前引書，第 182 頁。

¹²⁶ S.El-Awa, Muhamad, *Hukuman Dalam Undang-undang Islam-Satu Kajian Perbandingan*, p.45.

¹²⁷ 至今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等實行伊斯蘭刑法的國家仍然奉行公開行刑的制度。見 *Ibid*.

要等到 1990 年 10 月伊斯蘭黨控制吉蘭丹州州議會，掌握州的行政和立法資源後，伊斯蘭黨才有機會落實其伊斯蘭化的主張。根據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統計，伊斯蘭黨在執政一週年（1991 年 10 月）之際，已先後陸續推行了多達六十二項的新政策或指示，其中絕大部份乃為伊斯蘭化的主張。¹²⁸而隨著一系列的伊斯蘭化政策成功落實之後，1991 年 5 月 30 日伊斯蘭黨州政府首次公開其準備在吉蘭丹州實施伊斯蘭懲罰法—即伊斯蘭刑事法的訊息，該黨所屬的伊斯蘭刑法研究委員會（*Jawatankuasa Pengajian Hukum Hudud*）主席哈迪阿旺（Hadi Awang）明言縱然伊斯蘭刑法和聯邦憲法相 2u3t，伊斯蘭黨仍要盡力在吉蘭丹州實施伊斯蘭刑法，以完成阿拉的旨意，若伊斯蘭刑法的實施受到中央政府的阻礙，由此也可以向人民證明世俗化的中央政府和聯邦憲法是為伊斯蘭化的絆腳石。¹²⁹尤有進者，哈迪阿旺在 2000 年 1 月執政丁加奴州（Terengganu）之後，亦於 2002 年 7 月仿造吉蘭丹州的執政經驗通過了伊斯蘭刑法。

那麼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刑法版本和馬來西亞已實施的伊斯蘭法又有何種區別呢？其區別正如下表所示：

圖表 2 伊斯蘭黨伊斯蘭法版本（按：未落實）與巫統的伊斯蘭法（以聯邦直轄區伊斯蘭法為例）版本（按：已落實）之比較

伊斯蘭法範圍	巫統政權版本（即現行版本）		伊斯蘭黨政權版本（未施行）	
伊斯蘭刑事罪（Hudud）	伊斯蘭法院負擔的權責	最高刑罰	伊斯蘭法院負擔的權責	最高刑罰
通姦事項（al-zina）				
男女通姦（Zina）	有	三年有期徒刑兼五千元罰金兼六次鞭笞 ¹³⁰	有	死刑（投扔石頭至死）
男男性行為（Liwat） ¹³¹	有	三年有期徒刑兼五千元罰金兼六次鞭笞	有	同上
女女性行為（Musahaqah）	有	三年有期徒刑兼五千元罰金兼六次鞭笞	有	同上
人獸性行為（Ittiyan Albahimah）	無	無	無	五年監禁
姦屍行為（Ittiyan albahimah）	無	無	有	五年監禁
其他刑法項目				
偷竊（al-sariqah）	無	無	有	初犯：截斷右手，再犯：截斷左腳，二次以上：監禁一段時間直至悔改。 ¹³²

¹²⁸ 〈丹人陣（即人民陣線-Gagasan Rakyat）政府執政一年，六十二項改變傾向「回教化」〉，《星洲日報》，1991 年 10 月 21 日。

¹²⁹ 〈丹逐步實施回教懲罰法〉，《中國報》，1991 年 5 月 31 日。

¹³⁰ 此為憲法賦予伊斯蘭法院（即地方的法院）最高的刑罰額度。

¹³¹ 以通過肛門的性行為來判定之。

¹³² *Kelantan Syariah Criminal Code (2) Bill 1993, no. 6 (a) - (b)* .

偽造通姦的指控 (al-qadhif 或 al-Qazaf)	有	三年有期徒刑兼五千元罰金	有	八十下的鞭笞 (Eighty Lashes of whipping)。
飲酒 (al-syurb)	有	三千元罰金兼兩年監禁	有	八十下的鞭笞。
搶劫 (al-hirabah)	無	無	有	處死並釘十字架示眾 (Death and Thereafter Crucified) ¹³³
叛教 (al-riddah) ¹³⁴	有	三年有期徒刑兼五千元罰金	有	處死並沒收其所有財產
反叛伊斯蘭政權 (al-baghy) ¹³⁵	無	無	無	無
伊斯蘭刑法以外的其他罪行				
伊斯蘭侵害罪 (Qisas or Qisas)	無	無	有 ¹³⁶	死刑或終身監禁 (蓄意謀殺)、監禁十四年 (半蓄意謀殺) 以及監禁十年 (誤殺和其他傷害罪)。
其他罪行「Ta'zir」	有	三年有期徒刑兼五千元罰金兼六次鞭笞	有	三年有期徒刑兼五千元罰金兼六次鞭笞。 ¹³⁷

資料來源：‘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Federal Territories) Act 1997{Act 559}’, in: *Federal Territories Syariah Laws*,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Law Book Services, 1997; ‘Kelantan Syariah Criminal Code (2) Bill 1993’, in: Rose Ismail ed. *Hudud In Malaysia-The Issue At State*, Kuala Lumpur: SIS Forum (Mal) Berhad, 1995.

從上表的懲罰對比來看，伊斯蘭黨版本的伊斯蘭刑法不論是在懲罰方式和懲罰的項目上，皆與目前政教分離體制下現行的伊斯蘭法版本有著極大的差距：畢竟「三年有期徒刑兼五千元罰金兼六次鞭笞」（按：目前馬來西亞伊斯蘭法的最高刑罰額度）仍然遠輕於處死的懲罰；而若以當代人道主義的標準而言，在眾目睽睽之下截肢、公開遊行，投扔石頭至死或釘十字架的處罰方式無疑是不人道和殘忍的，而且也給予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一個怵目驚心的體會。是故之於長期處於世俗化體制下的穆斯林，基於其和世俗化的法律和觀念的巨大落差，伊斯蘭刑法將帶給馬來西亞穆斯林生活較為重大的壓力和心理負擔，之於非穆斯林，透過其所展示的血淋淋的懲罰方式（按：伊斯蘭刑法之行刑過程必須是公開地在公眾面前執行），極可能讓其產生對伊斯蘭的負面觀感。正如馬來西亞伊斯蘭姐妹會 (Sister in Islam) 所言，伊斯蘭刑法是一項負面的宣教政策 (A Negative *Dakwah* Policy)，其不單破壞了馬來穆斯林原本平和的社會結構，更影響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和平交流以及阻滯伊斯蘭的拓展：「沒有人會說：我願意加入一個因為各種罪行而鞭笞男女生，向其投扔石頭或截斷肢體的宗教」。¹³⁸

(三) 對伊斯蘭黨伊斯蘭刑法的相關批判意見

在即有的文獻上，全國所有非穆斯林的文教、工商、福利以及宗教等的團體，以及所有的非穆斯林政黨領袖，不論在朝或在野皆強烈反對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刑事法的政策。聶阿茲事後基於非穆斯林群情激憤的反對壓力而將伊斯蘭刑法實施在全體州民的主張改變為僅實施

¹³³ 其他處罰由輕而重依序為：監禁一糾段時日；截去左腳和右手，並須對受害者作金錢補償（按：稱“Diyat”或“Irsy”）；死刑並沒收財產；死刑沒收財產並釘上十字架示眾。見 *Kelantan Syariah Criminal Code (2) Bill 1993*, no. 9 (a) - (d)。

¹³⁴ 所謂叛教即是更改宗教信仰，如由信仰伊斯蘭改為信仰基督教等。

¹³⁵ 即包括穆斯林向穆斯林散佈異端邪說，或鼓吹穆斯林脫離伊斯蘭規範以及伊斯蘭的信仰。

¹³⁶ 按照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刑法版本，伊斯蘭的人身侵害罪可分成蓄意謀殺 (qat-al-‘amd or Wilful Killing)、半蓄意 (qati-syibhi-al-‘amd or Quasi-wilful Killing) 謀殺、誤殺 (qatl-al-Khata’ or Killing without intention) 以及一般造成傷害的人生攻擊。見 *Kelantan Syariah Criminal Code (2) Bill 1993*, no. 24-38。

¹³⁷ 由於伊斯蘭黨並無在其他罪行 (Ta'zir) 的項目另訂法律條文，因此此項罪行的判決額度仍然接受聯邦憲法的規範，即最高的刑罰不超過三年有期徒刑，五千元罰金以及六次的鞭笞。

¹³⁸ ‘Organise a Public Forum on Hudud Laws’, by sister in Islam, *News Straits Times*, 16th May, 1992.

在穆斯林身上，非穆斯林可基於本身的意願自由選擇接受伊斯蘭刑法的制裁。惟穆斯林方面的反對力量也不遑多讓。

我們回到同是穆斯林政黨--巫統的觀點來看，綜合在伊斯蘭刑法實施議題上和巫統立場一致的穆斯林學者以及巫統各主要領袖，加上先前第三章馬哈迪個人對伊斯蘭刑法的反對觀點的敘述，總結起來馬來穆斯林反對伊斯蘭刑法實施的論述主要可分成下列數項：

首先，伊斯蘭法學家 Mohammad Hashim Kamali 和 Salbiah Ahmad 等認為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刑法版本缺點眾多，問題處處，不適合作為一個實行的法律。此種說法最具說服力，因為其是以伊斯蘭法學的觀點來指陳伊斯蘭黨伊斯蘭刑法版本的弊病。縱觀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刑法版本，其一共有以下幾種的問題，其一是該版本的伊斯蘭刑法對強暴和通姦的舉證極其困難使此項罪行幾乎不可能成立；¹³⁹其二是其歧視女性，如該版本的伊斯蘭刑法第四十二條之二規定未婚懷孕的女性若不能證明其是為強暴的受害者則視同為觸犯通姦罪，在強暴的舉證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使未婚懷孕的女性必須面臨通姦罪的死刑處罰；¹⁴⁰其三是 Kamali 指責該伊斯蘭刑法完全因循（Taqlid）近千年前的夏非法學家 Hasan al-Mawardi（?-1072）的伊斯蘭法版本：*Kitab al-Ahkam al-Sultaniyya*，而完全不考慮其在當代的調適問題，加上其中的判決過於嚴厲，且刑罰的範圍也過於廣大（他認為除古蘭經所明確規定的四項確定懲罰——通姦、偷竊、偽造通姦的指控和搶劫之外，其餘刑罰如通姦罪者的實施有待商榷。），是故該伊斯蘭刑法注定無法作為一個當代的法律，也不會被國內大多數穆斯林所接受。¹⁴¹因此正如馬哈迪所主張，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刑法只是根據伊斯蘭黨自己的狹隘詮釋，而非真正的伊斯蘭法律，因此巫統不是反對伊斯蘭刑法，而是反對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刑法。¹⁴²

其次是主張馬來西亞目前並沒有實施伊斯蘭刑法的客觀環境。關於此項，Siddiq Fazdil 明確地指出伊斯蘭刑法的實施必須要顧慮到馬來西亞穆斯林僅佔半數人口的多元族群的社會環境，伊斯蘭政體並未在馬來西亞成立，同時非穆斯林並沒有成為伊斯蘭政體中的被保護者（Dhimmi），因此目前伊斯蘭刑法無法在本國實施。¹⁴³而安華也認為實踐伊斯蘭刑法並不是當前穆斯林社會謀求發展的優先考慮事項，穆斯林應著重於經濟的成長，消除貧窮；促進資訊改革和社會的公義，而非急迫地將伊斯蘭刑法加以實踐。¹⁴⁴另外馬哈迪也主張在多元信仰族群國家實施伊斯蘭刑法會造成法律對不同信仰族群有雙重標準，如此不單極度違反公平原則，更造成社會的混亂，因此不能冒然實施。¹⁴⁵

其三是認為政治和宗教需加以分離，現代化的國家根本不應該實施伊斯蘭刑法；此為較為西化的馬來學者如 Syed Hussin Alatas 和 Chandra Muzaffar 等所主張的論調，同時亦為巫統黨要如馬哈迪者所擁護的主張。以倡導用相對主義觀念來詮釋伊斯蘭法的 Syed Hussin Alatas

¹³⁹ 如吉蘭丹伊斯蘭刑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必須要有四位現場目擊證人，通姦罪方能成立。

¹⁴⁰ 以上見 Salbiah Ahmad, *Zina and Rape under the Syariah Criminal Code (2) Bill 1993 (Kelantan)*, in: Ismail, Rose ed. *Hudud In Malaysia-The Issue At State*, pp. 13-21.

¹⁴¹ Kamali, *Islamic Law in Malaysia: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pp. 128-147.

¹⁴² Mahathir Mohamad, "Speech at the Arab Language Centre in Nilam Puri," in Ismail, Rose ed. *Hudud In Malaysia-The Issue At State*, pp. 63-76.

¹⁴³ Sharifuddin Abdul Rahman. *Kunci Mahathir: Kegemparan Baru, UMNO Tawan Kelantan, PAS Gugat Terengganu (馬哈迪之鑰：新的震盪，巫統奪取吉蘭丹，伊斯蘭黨進軍丁加奴)*, Kuala Lumpur: Tinta Merah. 1995. p. 84.

¹⁴⁴ Anwar Ibrahim, *The Asia Renaissance*,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6, p. 114.

¹⁴⁵ Mahathir Mohamad, 'Speech in Arab Language Centre in Nilam Puri', Kelantan, 3rd March 1994, reprinted as English translation: 'Islam Guarantees Justice for all Citizens', in : Rose Ismail, ed. *Hudud In Malaysia-The Issue At State*, Kuala Lumpur: SIS Forum (Mal) Berhad, 1995, p. 69.

為例，他主張伊斯蘭注重的是信仰的價值，而非經典的文理解釋；即使伊斯蘭政體沒有成立，穆斯林仍然可以依循伊斯蘭規範而成爲一個虔誠的信徒，而古典的伊斯蘭法的執行方式也必須順應時代的變遷而作調整。由此他更主張由於成立伊斯蘭政體並非發展伊斯蘭的必要條件，加上伊斯蘭政體的概念仍然需要作更多的了解與辨證，因此即便未來馬來西亞穆斯林佔人口的九成以上，馬來西亞仍然不適宜成立一個政教合一的政體，更遑論目前穆斯林僅佔半數的情況。¹⁴⁶而 Chandra Muzaffar 也主張穆斯林在政治上應注重的是如何落實公義(Keadilan)的價值，而非伊斯蘭法的執行方式，因此伊斯蘭刑法應被拒絕。¹⁴⁷

其四是主張巫統早已在實施伊斯蘭刑法，所以根本沒必要提實施伊斯蘭刑法的問題：此種論調乃是攫取現有刑法和伊斯蘭刑法相似之部份以爲論證，主張伊斯蘭刑法所制裁的罪行和聯邦法律的一樣，且其懲罰的方式也大多一樣，如殺人者死刑；現有的聯邦法律僅僅和古典伊斯蘭刑法不同之處是其並沒有投擲石頭至死(Hukum Rejam)和斷肢的懲罰方式，但這並不能代表巫統不實施伊斯蘭刑法，而是該種懲罰方式必須在全國人民有充分接受它的心理準備之條件下方能夠實施。¹⁴⁸

基於伊斯蘭黨刑法違憲的事實，¹⁴⁹其始終未能獲得中央政府和國會的認可，因此最終伊斯蘭黨的刑法條文只成爲一紙宣傳文宣，而沒有任何實踐效益。但其在伊斯蘭黨以至伊斯蘭主義在馬來西亞的鬥爭史上，卻有莫大的象徵意義。

七、結論

透過以上的分析，顯然地，伊斯蘭黨理念和政策所極端偏重的，就是信仰和道德的實踐問題。伊斯蘭黨認爲天啓古蘭經明確地規範了人類生活方式的標準，而不去實踐神的意志即爲對阿拉的踰越，人類生活只有回歸天啓和依循天啓的實踐(即穆罕默德聖訓)，並以之作爲神恩，才能通向永生。伊斯蘭主張個人今世的生活態度即爲後世境遇之唯一參照依據，而古蘭經即爲人類今世生活態度的參照依據，並爲人類的今世和後世建構了一個完整的生活途徑。是故伊斯蘭黨相信以天啓宗教機制建構下的理想社會(即穆斯林社會)即爲導引人類通往幸福永生的必經之路。

是以伊斯蘭黨秉持世界伊斯蘭改革觀的伊斯蘭化責任，對國家政體優劣的評估、社會文化的評斷以至社會成員個人行爲的衡量皆立基於其自身的伊斯蘭屬性(Islamicity)，以作爲其檢視標準。以伊斯蘭黨的觀點而言，伊斯蘭即代表個人以至集體生活的全部，而非一般脫離集體生活實態，成就個人靈修的宗教信仰。因此其主張所有的政治議題皆爲伊斯蘭的議題，沒有所謂宗教與非宗教之分，伊斯蘭法也必須包含社會的所有層面。此項主張反映在吉蘭丹州政府所頒布的種種規範以及其實施古典伊斯蘭刑法的政策上。雖頒布伊斯蘭刑法是屬違憲之舉，但伊斯蘭黨仍一意孤行，所揭示的就是其對法律全面伊斯蘭化，推翻世俗化政體的決心。

¹⁴⁶ New Sunday Times, 8 May 1988. 轉引自 Abdul Rahman Haji Abdullah, *Permikiran Islam di Malaysia*(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思想), p. 209.

¹⁴⁷ 'PM: No Need to go Hudud', *The Sunday Star*, 11 September 1994, retake in : Abdul Rahman Haji Abdullah, *Permikiran Islam di Malaysia* (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思想), p. 218.

¹⁴⁸ 主張此種論調的爲巫統的教育部長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即第二任首相 Tun Razak 的兒子)，見“BN Sudah Lama Laksana Syariat Islam (國陣早已在實施伊斯蘭法了),” *Berita Harian*, 27, November 1999.

¹⁴⁹ 馬來西亞聯邦憲法附錄九第二條之第一項規定州政府的立法範圍，而刑法不在其例。是以州政府無權訂定刑法條文。

在馬來西亞的所有政黨，沒有一個像伊斯蘭黨那樣將宗教價值裡二元對立的世界觀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其具體的展現就是將「Kafir」和「Imam」，「Halal」和「Haram」¹⁵⁰的類化範圍加以無限地擴充，而以世俗化的西方文明產物構成的他者就為伊斯蘭黨的伊斯蘭主義提供一個現成的反面論述，當然世俗化的文明的產物在個人和集體的層面而言包括了非伊斯蘭的道德思想、行為和體制。因此非伊斯蘭的生活方式和體制一日未除，即社會仍然需要伊斯蘭化，伊斯蘭黨的鬥爭就永遠不息。

另一方面，雖然伊斯蘭黨標榜它的伊斯蘭化政策皆是施予穆斯林的政策，對非穆斯林並沒有任何影響，惟事實上其乃是以強化與鞏固穆斯林的特徵和習性為政策目的，透過種種對穆斯林激烈而又強制性的社會規範政策，一面讓穆斯林在多元社會中得以隔絕違反伊斯蘭的罪惡（*Maksiat*），使其具有「虔誠的習慣和正確的信念」，另一面卻在隔離部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生活表象之餘，也間接地對非穆斯林生活表徵的善與惡作出權威的判決並加以規範（如以地方政府禁酒令的實施明確地向非穆斯林宣示飲酒乃是一種罪惡。），從而達致讓非穆斯林的生活秩序亦能納入伊斯蘭的群體生活中，教化非穆斯林步入伊斯蘭正道的目的。惟基於其宗教道德的絕對性，集宣教和政治功能於一身的伊斯蘭黨在現實主義掛帥，講求權力鬥爭但又瞬息萬變的政治環境裡經常受到其自身宗教二元對立的絕對觀所牽絆，其過度神聖化的政治觀點往往封殺了政策的妥協和討論空間而經常予人產生過於激進的負面印象。

在此我們必須要了解，信仰是人類精神層面的追求層次，發展至極，不是外在道德和法律所能規範，因此伊斯蘭法的全面落實固然能強制性地使個人服膺於伊斯蘭信仰的外在規範，但個人對信仰的外在規範之臣服並不能等同於其內心對信仰的虔信。對此古蘭經就清楚地指出了人群中許多表面（按：或基於壓力，或基於尋求特定之利益）遵循伊斯蘭規範，內心卻堅決抗拒伊斯蘭信仰的偽信者—穆那菲（*Munafik*）。¹⁵¹

再者任何社會皆存在著遠離公共文化符號體系的私人生活，若由公權力以一種宗教信仰價值來訂定和規範公共符號、倫理，制度和意識形態等等的集體因素來決定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無疑是否定了人類適應文化的能力和自我調適的智慧；而透過其對私人領域空間的壓縮（如將未婚男女在公開活動場所作「適當」隔離的措施無疑是對男女自由交往空間的壓制），更是對個人生活方式選擇自由之箝制。

是故，個人對信仰的依附情感並不建立在法律的強制約束上，而是道德性的教化。但若我們以法律強制某一道德成為普世標準，非但不能藉此形塑群體性格單一的道德理想社會，更往往會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多數暴力，引致其餘信仰群體的反彈。

在一個多元信仰的社會，信仰價值的孰優孰劣乃是基於個人唯心的抉擇，並無任何客觀和合理的衡量基準，更不適合作為一個可供辯證的公共議題。是故，一個對應社會全體大眾，具有法律強制效果的公共政策，若提升到單一宗教信仰的層次，則無異對宗教之優劣作出了無情的判決，亦抹煞了它的討論空間。以伊斯蘭刑法的實施為例，縱然其是阿拉之法（*Hukum Allah or Allah's Punishment*），但伊斯蘭黨在未經深入諮詢馬來西亞社會各界對全面伊斯蘭化的態度以及讓廣大世俗化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對伊斯蘭有更進一步認識的情況下，就會促地以實施的伊斯蘭刑法政策作為一個建構伊斯蘭道德社會的指標，結果不單引起幾乎所有朝野各黨的反彈，而進一步使所有非穆斯林政黨和伊斯蘭黨劃清界線，同聲譴責伊斯蘭黨的強勢

¹⁵⁰ 它們的中文釋意分別依序為：「不信者」、「虔信者」、「允可」和「禁止」。

¹⁵¹ 根據古蘭經的說法，阿拉對不信者和偽信者皆將施以地獄的極刑，唯偽信者的處境將比不信者更為悲慘。見古蘭經第四章（*al-Nisa'*）第一百四十五節：「偽信者必墮落地獄的最底層，你將會發現他們沒有任何的援助。」轉引自：Abdul. Latif Muda, *Ulum Syariah (伊斯蘭法概要)*. Kuala Lumpur: Cahaya Pantai (M) Sdn. Bhd. 1995 p. 37.

作為，更增加了非穆斯林對伊斯蘭黨激進的刻板印象，引起非穆斯林不必要的恐慌。

伊斯蘭政體的原始設計—麥地那模式 (Medinah's Model) 即是立基於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甚至多元信仰的前提下，理論上非穆斯林在伊斯蘭政體內有明確的地位與保障，但在生活習性乃至於權利義務的層面上仍必須對伊斯蘭政體的權威作出若干讓步，除去權利義務的爭議上 (如在伊斯蘭政體裡頭非穆斯林不能當國家的重要官僚或領導人，也不能服兵役，更不能管理穆斯林，同時也要繳交特別稅—Kharaj 等的規定)，非穆斯林享有自由奉行其信仰、文化與風俗習慣的空間。但這種的政治領導方式的古老設計在價值多元，信仰多元，資訊多元的時代裡，則必須要對行動的相關後果，作出一個認真和長期性的考量與評估：因為縱然一黨的信仰固然重要，但作為多元信仰社會的執政者，必須要擁有對全民所肩負的責任倫理。而不顧一切地將信仰價值訴諸實踐，則違背了公共政策必須追求全民最大公識性的原則。畢竟，以宗教信仰全有全無的思維模式來面對世界，則不單拒絕承認價值多元但權力平等的客觀現實，也是在的一個多元共存的公共領域中自我形塑一個信仰的對立面 (即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權利義務上的分隔)，無助於宗教信仰群體的和平共存。因此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伊斯蘭黨的伊斯蘭化主張面臨最大的困難和挑戰並非其理念本身，而是其實踐的方式。

最後我們若回頭以伊斯蘭化的觀念檢視之，就會發現伊斯蘭化的最終目的是塑造一個伊斯蘭高度虔信的社會，而遵循伊斯蘭法是為伊斯蘭化的責任，亦是達至伊斯蘭虔信的必要途徑。以此觀點而言，伊斯蘭因伊斯蘭法的實施而具有完整的社會化，但伊斯蘭法也必須因伊斯蘭的信仰而獲得其權威性和神聖性。伯爾曼 (Harold J. Berman) 曾言道：「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 ..，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信仰的信仰卻將蛻變為狂信。」¹⁵²因此伊斯蘭法必須和伊斯蘭信仰相互支持，不可或缺。是故伊斯蘭法的實施必須以伊斯蘭信仰為預設前提，即對伊斯蘭的虔信態度必須先於伊斯蘭法而存在。

再者對於不信者而言，伊斯蘭法只是一個教法，而非普遍性的法律。先知穆罕默德在頒布麥地那憲章 (Carter of Madinah or *Al Dustur al-Madinah*) 以作為實施伊斯蘭法的合法依據之前也同樣地必須先取得當地非穆斯林的諒解與同意—而事實上麥地那憲章本身也就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達成諒解並共同參與擬定的一個協定。¹⁵³因此在一個客觀條件上尚未成立烏瑪社群—高度虔信的穆斯林社群的國家，就難以具備實施伊斯蘭法的環境。基於伊斯蘭尊重個人信仰自由，反對強迫信仰的要件，¹⁵⁴一個高度虔信的烏瑪社群的建構必須先於伊斯蘭法的全面推動，如此伊斯蘭法才能因其獲得普遍性的認同而具備其最高權威性，否則若伊斯蘭法先於伊斯蘭社會的形塑而實施，則不但會有褫奪不同倫理和價值的自由表達權之爭議，也會產生強迫未伊斯蘭化的社會成員順從伊斯蘭價值的壓制行為，而形成宗教威權的領導體制；此舉即違背了伊斯蘭的民主協商原則，更違背了伊斯蘭反對強迫信仰的本意。此即為伊斯蘭黨伊斯蘭化政策的最大瓶頸。

惟伊斯蘭黨雖歷經數十年的變動，但仍然堅持其體制內的抗爭與社會改革的方式，仍然服膺於世俗化的憲法，是為全球原教旨主義改革運動的一個和平抗爭的示範。

¹⁵² 伯爾曼著 (Berman, Harold J.)，梁治平譯，《法律與宗教 (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北京：三聯書店 (London: SCM Press Ltd. 1974)，1991年，第15和第64頁。

¹⁵³ 關於麥地那憲章頒布的過程和其全部的內容，請參考：Thaib, *The Notion of State in Islam*, pp.

¹⁵⁴ 此記載於古蘭經第二章 (Surah al-Baqarah) 第二百五十六節：「對於信仰，絕無強迫；因為正邪確已分明了。誰不信惡魔而信真主，誰確已把握住堅實的、絕不斷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聰的，是全知的。」引自：《古蘭經中文譯解》，第廿七頁。因此由此可證在伊斯蘭的觀念下，人們有選擇信仰的自由。

參考資料

中文參考資料

- 《古蘭經中文譯解》，台北：中國回教理事會，1997年。
- 王銘銘，《社會人類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
- 艾布里阿爾·茂都迪（Abul Ala Maududi）原著，Khurshid Ahmad 譯（英文版），佚名譯，《瞭解伊斯蘭（Understanding Islam）》，科威特（Kuwait）：國際伊斯蘭學生會聯盟（International Islamic Federation of Student Organization），1989年。
- 伯爾曼著（Berman, Harold J.），梁治平譯，《法律與宗教（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北京：三聯書店（London: SCM Press Ltd. 1974），1991年。
- 海伍德（Heywood, Andrew）著，楊日青等譯，《政治學新論（Politics）》，台北：韋伯文化事業，1999年。
- 鄭玉波著，黃宗樂校訂，《法學緒論》，第十三版（1971年1版），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
- 薩托利（Sartori, Giovanni）著，雷飛龍譯，《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台北：韋伯文化事業，2000年。

英文參考資料

- Constitutions of the State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Law Book Services, 1991.

- Federal Territories Syariah Laws*.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Law Book Services, 1997.
- Ayubi, N. *Political Isla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Arab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1.
- Berger, Peter L. Ed.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1999.
- Caplan, Lionel ed, *Studies i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87.
- Doi, Abdur Rahman I. *Syariah: The Islamic Law*. Kuala Lumpur: A.S. Noordeen. 1996.
- Eliade, Mircea. Ed.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Volume 5, 1995.
- Esposito, John L. *Islam and Politic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Hashim Makaruddin. Ed. *Islam and the Muslim Ummah: Selected speeches of Mahathir*.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0.
- Haynes, Jeff. *Religion in Global Politics*. London: Longman, 1998.
- Hefner, Robert W. and Patricia Horvatic. Eds. *Islam: In an era of Nation-Stat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 Hodgson, Marshall G. S. *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 Ibrahim Abu Bakar. *Islamic Modernism in Malay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Sayid Syekh al-Hadi 1867-1934*.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94.
- Ismail Noor and Muhammad Azaham. *The Malays Par Excellence - Warts and all: An Introspection*.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 2000.
- Ismail, Rose. Ed. *Hudud In Malaysia - The Issue At State*. Kuala Lumpur: SIS Forum (Mal) Berhad, 1995.
- Kamali, Mohammad Hashim. *Islamic Law in Malaysia: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Kuala Lumpur: Ilmish Publishers. 2000.
- . *Principles of Islamic Jurisprudence*. 2nd Ed. Kuala Lumpur: Iimiah Publishers Sdn. Bhd, 1998.
- Langer, William L. Ed.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rdern , chronologically arranged*. Boston: Houghton Mufflin Co. 1968.
- Lukman Thaib. *The Notion of State in Islam*. Kuala Lumpur: Quill Press, 1990.
- Mahathir Mohamad. *Islam: Misunderstood Religion*. Kuala Lumpur: Afro-Arab Centre, 1996.
- Mahathir Mohamed, *The Malay Dilemma*.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70.
- Mawdudi. S.A.S. *The Islamic Law & Constitution*. Lahore: Islamic Publication, 1967.
- Merkel, Peter H., & Ninian Smart.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ohamed, Alias. *PAS' Platform-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51-1986*. Kuala Lumpur: Gateway Publishing Hous, 1994.
- Muhammad Mumtaz Ali.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Islamic Research: A Few Milestone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5.
- Mutalib, Hussin. *Islam and Ethnicity In Malay Polit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auf, Muhammad Abd. *UMMAH: The Muslim Natio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1.

- Norhashimah Mohd, Yasin. *Islamization / Malaynisation - A Study On The Role Of Islamic Law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1969-1993*. Kuala Lumpur: A.S. Noordeen, 1996
- Ongkili, James P.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 1946-1974*. Singapor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Othman, Norani. Ed. *Shari'a Law and the Modern Nation-State: A Malaysian Symposium*. Kuala Lumpur: SIS Forum (Malaysia) Berhad. 1994
- Perry, Michael J, *Religion in Politics: Constitutional and Mor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osenthal, Erwin I. J. *Islam in The Modern National Stat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 Safie bin Ibrahim. *The Islamic Party of Malaysia: Its Formative Stages and Ideology*. Kelantan: Nuawi bin Ismail. 1981.
- Sardar, Zianuddin. *The Future of Muslim Civilization*. London: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87.
- Suffian, Tun Mohamed., Lee, H.P. & E. A. Trindade. Eds.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Its Development: 1957-1977*.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Tunku Abdul Rahman. *Contemporary Issues on Malaysia Religious*.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 1986.
- Wu, Min Aun. Ed. *Public Law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Kuala Lumpur: Addison Wesley Longman Malaysia Sdn. Bhd. 1999.

馬來文參考資料

- Ab. Aziz Mohd. Zin. *Pengantar Dakwah Islamiah (伊斯蘭復興的傳播)*. Kuala Lumpur: Penerbit Universiti Malaya. 1997
- Abdul Ghani bin Haji Idris, *Bagaimana Islam Berpolitik Memerintah(伊斯蘭如何在政治上扮演統治的角色)*, Kuala Lumpur: Al-Hidayah Publishers, 1999.
- Abdul Rahim Awang. *Dosa-dasa Besar (重大的罪行)*. Kuala Lumpur: Ara Communications Sdn. Bhd. 1999.
- Abdul Rahman Haji Abdullah, *Permikiran Islam di Malaysia (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思想)*,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dan Pusat Pendidikan Jarak Jauh, 1998.
- Abdul. Latif Muda. *Ulum Syariah (伊斯蘭法概要)*. Kuala Lumpur: Cahaya Pantai(M) Sdn. Bhd. 1995.
- Abu Bakar Hamzah, *Kafir Sebab Perlembagaan (因為憲法而成為不信道者)*. Kuala Lumpur: Media Cendiakawan Sdn. Bhd, 1992,
- Abu Bakar Hamzah, *Ke Arah Perlembagaan Islam (邁向伊斯蘭憲法)*. Singapore: Pustaka Nasional PTE. LTD. 1983
- Abu Bakar Hamzah. *Parti PAS dengan Akalut Syasinya (伊斯蘭黨和其策略聯盟的主張)*. Kuala Lumpur: Media Cendiakawan. 1992.
- Ahmad Ibrahim. *Al-Ahkam Jilid 4 Islam Dalam Perlembagaan (憲法中的伊斯蘭)*.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4.
- Ahmad Lutfi Othman, *Menyanggah Fatwa-fatwa Mahathir (反對馬哈迪的裁決)*.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Pemuda, 1998.
- Fadzil Mohd. Noor, Hj., Haji Abd. Hadi Awang. *Perpecahan Bangsa dan Penyelesaian(民族的分*

- 裂和其解救之道) . Kuala Lumpur: Dewan Pemuda PAS Malaysia. 1988.
- Hasyim, Ibnu. *Konflik UMNO PAS: Satu Penyelesaian menurut Islam* (伊斯蘭黨和巫統的衝突：一個以伊斯蘭為依據的解決之道) . Kuala Lumpur: Brother Press Ltd. Part. 1993.
- Ibrahim Ahmad. *Konflik UMNO—PAS Dalam Isu Islamisasi* (伊斯蘭黨和巫統在伊斯蘭化議題上的衝突) . Kuala Lumpur: Buku Sdn. Bhd. 1990.
- Jamal Mohd Lokman Sulaiman, *Biografi Tuan Guru Haji Nik Abdul Aziz* (尊敬的導師哈芝聶阿茲傳) . Kuala Lumpur: Sulfa, 1999.
- Mahayudin Haji Yahaya. *Tamadun Islam* (伊斯蘭文明) . Kuala Lumpur: Penerbit Fajar Bakti Sdn. Bhd., 1998.
- Mahmood Zuhdi. Abd Majid. *Pengantar Undang-undang Islam Di Malaysia* (伊斯蘭法在馬來西亞的傳播) . Kuala Lumpur: Pernebit Universiti Malaya..1997.
- Maududi, Abul A'la Al, *Gerakan Tajdid Islam* (伊斯蘭復興運動) . suntingan dan terjemahan oleh Abu Akhyar dan Elias Ismail (Abu Akhyar 和 Elias Ismail 校訂與翻譯) , Alor Star: Pustaka Ikhwan, 1987.
- Mohamed S. El-Awa. *Hukuman Dalam Undang-undang Islam—Satu Kajian Perbandingan* (伊斯蘭法律中的判決——一個比較的研究) . 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9.
- Mohamed S. El-wa, Anshori Thayib penterjemah (Anshori Thayib 譯) , *Sistem Politik Dalam Pemerintahan Islam*(伊斯蘭政權裡的政治制度). Kuala Lumpur: Penerbit Penamas Sdn. Bhd. 1984.
- Mohd Sayuti Omar. *Kelantan Selepas Pantang* (被抵制後的吉蘭丹) . Kuala Lumpur: Tinta Merah, 1991.
- Nik Abd. Aziz, Tuan Guru. *Peranan Utama Dalam Politik* (烏拉瑪在政治上的角色) . Kuala Lumpur: GG Edar. 1994.
- Nik Abdul Aziz bin Haji Nik Mat, Dato' Haji. *Koleksi Ucapan Rasmi YAB Tuan Guru Dato' Haji Nik Abdul Aziz bin Haji Nik Mat, Menteri Besar Kelantan* (吉蘭丹州務大臣，尊敬的導師哈芝聶阿茲曼開幕慶禮演講集) . Kota Bahru: Dian Darulnaim Sdn. Bhd. 1999 .
- Nik Abdul Aziz Nik Mat. *Asas Pentadbiran Islam* (伊斯蘭的統治原則) . Kelantan: Pusat Kajian Strategik Negeri Kelantan, 1995.
- Perlembagaan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 Pindaan 1993* (伊斯蘭黨黨綱—1993 修正版) . Kuala Lumpur: Parti Islam seMalaysia. 1996.
- Sharifuddin Abdul Rahman. *Kunci Mahathir: Kegemparan Baru, UMNO Tawan Kelantan, PAS Gugat Terengganu*(馬哈迪之鑰：新的震盪，巫統奪取吉蘭丹，伊斯蘭黨進軍丁加奴) , Kuala Lumpur: Tinta Merah. 1995.
- Suria Janib Ed. *Pertagungan Sengit Kali ke-10* (第十次的激烈對峙) .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Hemah, 1999.

期刊與報章

馬來文期刊

1. Tamadun
2. Detik
3. Harakah

英語期刊

1. TIME
2. Newsweek

中文報章

1. 南洋商報
2. 星洲日報
3. 中國報

馬來文報章

1. Utusan Malaysia (馬來西亞前鋒報)
2. Berita Harian (每日新聞報)

英文報章

1. New Straits Times
2. Straits Times

網址：

馬來西亞伊斯蘭黨官方網址：[Http://www.parti-pas.org/](http://www.parti-pas.org/)

東南亞政經大事記（1900-2000）

新加坡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00 年	* 康有為抵新加坡提倡保皇立憲論。 * 英馬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British Malaya）在倫敦成立，繼承原先的海峽殖民地協會（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ssociation）。 8.17 林本空（Lim Boon Kong）成立海峽華英協會（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以支援英國統治爭取華利益。
1901 年	* 新加坡華人組織保安團，以維持治安。
1903 年	* 英國政府完成鐵路系統建設。
1905 年	* 新加坡醫事學校成立，以培養馬來各邦所需合格醫師。
1906 年	* 阿哈迪（Sayyid Al-Hadi）在新加坡創刊馬來語報 “The Religious Leader” 。 * 新加坡成立華僑商人協會（簡稱華人商會，The Singapore Chinese Commercial Association）。 2 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抵達新加坡建立「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
11.13	閩粵華人因船隻相撞引發衝突，械鬥持續 5 天，共約 300 人被捕。
1907 年	* 英國成立鴉片委員會，以管制新加坡鴉片的產銷。 * 阿布都拉（Mohammed Eunos bin Abdullah）創刊 “新加坡自由人報（Utusan Melayu）” 。
1908 年	* 鴉片委員會調查統計，每名 15 歲以上華人男子，平均一年吸食生鴉片半公斤。
1910 年	* 海峽殖民地政府從鴉片委員會手中接管鴉片的銷售。
1912 年	* 在中國國民黨提供資金下，新加坡成立中文學校。 12. 林本空將星州同盟會改為中國國民黨分部。
1914 年	* 禁止契約華工移民。
1915 年	2.15 印度兵反抗英國官員，造成 39 名歐洲人死亡。 2.18 英國靠法、俄、日海軍協助鎮壓印度兵暴動，事後處決 47 人。 5.31 印度裔回教徒曼瑟（Kassim Ali Mansor）準備運兵前往土耳其助戰，被判有罪。
1918 年	* 海峽殖民地政府禁止海南島中國女性移民新加坡。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1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為抗議日本於巴黎和會對中國提出不平等要求，新加坡華人發起「拒買日貨運動」。 * 新加坡開始中等教育，但因支援國民黨與共產黨兩派意識形態對立，對教育造成影響。
192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為因應「1902年英日同盟條約」之廢止，英國以新加坡北部柔佛軍港為中心，強化當地軍事設施。
192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加坡設立拉福茲學院（Raffles College），開始高等教育。 * 南洋共產黨（Nanyang Communist Party）在新加坡成立。
192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印度人協會在新加坡成立。 * 連結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柔佛通道（the Johor Causeway）開通。 * 英國開始建設新加坡為海軍基地。
192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加坡馬來聯盟（the Singapore Malay Union，KMS）成立，為第一個馬來人政治組織，主席為阿布都拉。 * 英國高等參事官吉勒瑪（Laurence Guillemard）將司法委員會成員擴大到26名。
192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南洋總工會在新加坡成立。 * 新加坡經柔佛連絡馬來西亞之鐵路開通。
192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奧本豪（Aw Boon Haw）開設英庵堂藥鋪分店，其後成為聞名東南亞的“虎標”藥品公司。
1927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 新加坡發生首次罷工。 3. 出席孫中山逝世紀念會的海南島籍國民黨支持者間發生衝突，7人被殺。
192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加坡設置馬來村。 * 中國共產黨成員建立南洋總工會（Nanyang General Labour Union）。
192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馬來亞華人開始以方言發表南洋風味的文學作品。
193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因經濟惡化，英國限制華工移住。 * 馬來亞共黨（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在新加坡成立。
193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6. 新加坡警察逮捕馬來亞共產黨幹部，該組織因而式微。
193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海峽殖民地首度任用非歐洲人擔任官吏。 * 克萊門蒂（Lecil Clementi）總督取消對華人及淡米爾（Tamil）學校的政府資助。
193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中國、馬來亞、社區具有歸屬意識的華人作品，形成南洋華文文學或馬來亞華文文學。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3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婦運領袖佛達 (Shirin Forda) 向國際聯盟遞交亞洲婦女條款 (the causes of Asian women) 。 * 居住新加坡的越南人賴德 (Lai Teck) 成爲馬共 (MCP) 書記長。 * 印度裔領袖阿布都拉逝世。
193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後擔任總統的王鼎昌 (Ong Teng Cheong) 出生。
1937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海峽馬來聯盟在馬六甲和檳城設立支部。
193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新加坡軍港完成。
193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8. 第一屆新加坡馬來聯盟大會召開。
194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1.13 英軍於新加坡設置「遠東軍司令部」。 12. 泛馬來會議在新加坡召開。
194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9.25 英國容許美軍使用新加坡基地。 11.8 日軍轟炸新加坡，其後登陸馬來東部的亞庇、辛哥拉 (Simgora) 和北大年 (Pattani) 。 12.25 英殖民地政府要求華人組織抗日義勇軍，由陳嘉庚 (Tan Kah Kee) 領導。
194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軍限制馬來青年聯盟 (the Union of Malay Youth, KMM) 活動，並於6月加以解散。 1.31 波西瓦 (Percival) 將軍領導的英、澳、印軍放棄馬來亞，退至新加坡，並炸毀連結新馬的柔佛通道。 2.8 日軍開始發動對新加坡的進攻，新加坡華人抗日義勇軍激烈抵抗。 2.15 日軍佔領新加坡，將該島更名為昭南 (Syonan) 島，並於3.15設立昭南特別市。 2.16 日軍攻佔新加坡共損失1,714人，俘虜盟軍13萬人。 5. 流亡日本的印度獨立聯盟 (India Independence League) 創辦人拉許·波瑟 (Rash B. Bose) 重返新加坡，並建立其馬來亞支部。 5.15 昭南興亞訓練所開設。 6.25 日軍強制華人捐獻5000萬美元。 7. 日本強制各級學校以日語教學取代英語。
194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前印度國會議長沙哈斯·波瑟 (Subhas C. Bose) 自德國抵新加坡，建立反英的印度國民軍 (Indian National Army) 。 2. 英政府開始檢討戰後馬來亞政策，並於年末發表新加坡不加入馬來聯邦，另成立直轄殖民地的計畫。 10. 樟宜戰俘營的盟軍偷襲新加坡港，並炸沈7艘日艦。日軍於事後將戰俘16人凌虐至死。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44年	*	日本在新加坡成立南方軍給水部隊，實際上從事細菌戰研究。
1945年	8.15	日軍宣布投降，撤出新加坡。
	9.5	英軍重返新加坡，實施軍政統治。
	10.10	英國宣布馬來聯邦計畫，但以新加坡為遠東戰略基地，將其仍直屬英國政府。
1946年	1.	英政府發表白皮書，新加坡殖民政府受總督及行政會議、立法議會管轄。
	1.29	共黨控制的新加坡總工會發動罷工24小時，共17萬勞工參加。
	3.31	英國結束對新加坡的軍政統治，改由高等參事官直轄。
	4.1	馬來聯邦（Malayan Union）成立，新加坡另成英國直轄殖民地。
	12.	陳禎祿（Tan Cheng Lock）成立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爭取非馬來人的利益。
1947年	7.3	「立法會議（Legislative Assembly）選舉法」通過，規定由總督（governor）擔任會議主席。
	8.	由海峽華英協會支援，蔡建丹（Chye Cheng Tan）成立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
	8.	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更名為全馬聯合行動委員會（All-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AMCJA）。
1948年	2.1	英政府廢除馬來聯邦，改為成立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新加坡為直轄殖民地。
	3.20	舉行立法議會選舉，22名議員中有6位由人民直選產生。4.1新加坡召開第一屆立法議會。
	5.31	立法議會通過法案，強制泛馬來貿易聯盟（Pan-Malay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解散。
	6.23	因馬共活動猖獗，新加坡總督宣布緊急狀態，並將其列為非法組織。
	9.1	瑪吉德（M. Majid）成立新加坡勞動黨。
1949年	2.27	馬華公會（MCA）成立。
	10.8	馬來亞大學於新加坡成立。
1950年	4.28	馬共暗殺新加坡總督吉姆森（Franklin Gimson）未遂。
	4.30	警察因暗殺事件逮捕馬共所有新加坡成員。
	8.1	李光耀自英國返回新加坡。
	12.	馬共新加坡市委會會址遭毀壞。
	12.11	最高法院判決一名歐亞混血女嬰須被帶離其養父母，導致回教徒包圍法院進行示威。因與軍警發生衝突，導致18人喪生。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51年	<p>* 華人要求擴大公民權。</p> <p>1. 警方攻擊反英聯盟 (Anti-British League)，並逮捕其成員，包括納爾 (C. Devan Nair) 和普朱切利 (James Puthuachary) 均被監禁於聖約翰島 (St. John's Island)。</p> <p>4.10 立法議會進行9個民選席位選舉，勞動黨取得兩席。</p> <p>4.10 行政評議會的非官派成員由4人增至6人。</p>
1952年	<p>2. 計畫創立南洋大學。</p>
1953年	<p>* 杜進才 (Ton Chin Chye) 強化進步黨組織。</p> <p>2. 政治運動團體 (主要為反英聯盟成員) 聯合成立社會主義團體 (Socialist Club)，並出版機關雜誌 “Fajar” 。</p> <p>12. 立法議會通過國民役務法。</p>
1954年	<p>4. 馬歇爾 (David Marshall)、湯瑪斯 (F. Thomas) 和林有福 (Lim Yew Hock) 組織新加坡社會黨 (Singapore Socialist Party)。</p> <p>4.25 林有福領導發動罷工。</p> <p>5.13 900名學生進行示威遊行，反對強制軍事訓練</p> <p>5.28 8名學生因在 “Fajar” 為文批評政府而被捕。</p> <p>11.21 人民行動黨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成立，杜進才任黨主席，李光耀為秘書長。</p>
1955年	<p>2 華人商會成立民主黨 (the Democratic Party)。</p> <p>4.2 依「林德憲法」(Rendel Constitution) 舉行大選，PAP贏得3個議席，馬歇爾領導的左翼勞工陣線 (Labour Front) 贏得10個席次。</p> <p>4.5 馬歇爾聯合華巫聯盟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 The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組閣，自己出任首席長官 (chief minister)</p> <p>4.6 華人計劃開辦中文大學—南洋大學 (Nanyang University) 失敗，但於翌年正式成立。</p> <p>5.11 因支援公車司機罷工，數千中學生與警方發生衝突。</p> <p>6.11 6名工會和學生領導人因支援共產黨被捕。</p> <p>10.12 實施「公共安全維護法」(Preservatio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加強取締共黨。</p> <p>12.28 馬共總書記陳平 (Chen Ping) 與馬來亞聯邦首席長官拉曼、新加坡首席長官馬歇爾在華玲 (Baling) 會談，但因拉曼堅持馬共解散而破裂。</p>
1956年	<p>3. 20萬人連署要求新加坡獨立。</p> <p>4.17 馬歇爾率領制憲代表至倫敦參加新加坡憲法制定會議。</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5.15 馬歇爾率各政黨代表至倫敦要求自治，並展開為期3周的交涉。
	6.7 新加坡發生華人暴動，英國關閉學校，並以此為藉口延緩自治。馬歇爾因未能達成自治辭職，由林有福繼任。
	9.24 因學生抗議政府解雇5名左翼中學老師，政府下令解散華人中學生聯盟。
	10.25 政府侵入校園驅散學生引發暴動。事後，政府逮捕PAP秘書長，林清祥（Lim Chin Siong）、方水雙（Fong Swee Suan）與納爾等人。
	10.10 華人中學生與親共工會成員發動靜坐抗議。
	11.2 華人學生進行示威運動。
1957年	3.11 林有福率領第二批制憲代表團至倫敦談判，達成1958年取得自治的協議。
	4.12 馬歇爾解散勞工陣線。
	8.31 馬來亞聯邦獨立，新加坡被排除在外。
	10. 實施新公民權法。
	11. 通過教育法。
	11.1 馬歇爾成立勞工黨（Workers Party）。
	12. 新加坡舉行首次市議會（City Council）選舉，PAP在30席中贏得13席。
1958年	3. 李光耀與共產黨地下組織領袖方壯璧（馬共全權代表）進行第一次秘密會談。
	5.12 新加坡制憲代表團第三次到倫敦談判，5.28雙方協議新加坡自治憲法，但防衛與外交由英國與馬來亞聯邦控制。
	8.1 英女皇批准「新加坡自治法」（The State of Singapore Bill）。
	11. 公佈「新加坡自治法」。
	11. 林有福成立新加坡人民聯盟黨（the Singapore People's Alliance Party）。
1959年	4. 制訂「創辦產業法」與「擴充產業法」。
	5.30 立法議會選舉，PAP在51席中贏得43席。
	6.3 新加坡升格為自治政府，由李光耀主政，外交和國防由英人掌管，內政治安則由3名英人、3名新加坡人和1名馬來人共同管理。
	6.4 反英聯盟領袖林清祥、方水雙和納爾獲釋。
	6.5 PAP秘書長李光耀出任自治政府第一屆總理，杜進才為副總理。
	10 國會通過「內部安全法」，成立「內部安全局」，政府可不經審判即逮捕人民，並拘禁2年。
	12.3 英國指派馬來人伊沙克（Tun Yusof bin Ishak）為國家元首，李光耀公佈國旗、國徽。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6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貪汙防制法」(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 通過。 2.1 政府成立住宅發展委員會。 6.10 王應官 (Ong Eng Guan) 被解除內閣職務，6.17更遭開除黨籍。 7.1 政府成立人民協會 (People's Association)，以發展社區和基礎教育。
196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4. 實施第一次工業開發五年計畫；設置經濟發展局 (EDB)。 5.27 東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呼籲馬來亞、新加坡和婆羅洲地區在政治和經濟上建立密切合作關係。 6. 王應官成立聯合人民黨 (the United People's Party, UPP)，反對併入馬來西亞。 7.26 人民行動黨分裂，左翼人士在李紹祖醫師領導下，另組社會主義陣線 (簡稱社陣，Barisan Sosialism)。 8. 東姑阿都拉曼與李光耀達成合併協定。
196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新加坡反併吞派在吉隆坡召開馬來亞社會主義者會議。 5.21 華語學校因反對教育政策而罷課。 9.1 新加坡舉行是否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公民投票，72% 支援政府案。
196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2 警察突襲社陣總部，宣稱一批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在「冷藏行動」中被逮捕。 7. 新加坡與馬來亞簽署合組聯邦協定。 7.12 聖納尼 (Pulan Senany) 島發生暴動。 8.11 議會投票表決同意倫敦協定。 9.16 新加坡正式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Federation of Malaysia)，僅保有教育和勞工自主權。 9. 印尼因反對汶萊併入馬來西亞聯邦，派人滲透新加坡，煽動馬華種族衝突，並進行「對抗」行動。 9.21 新加坡舉行衆院大選，PAP獲得壓倒性勝利，在51席中取得37席，並在全部三個以馬來人爲主的選區中擊敗新加坡巫統。
196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 PAP派出9名候選人參加馬來西亞大選，只得1席，PAP與聯盟黨政府的關係惡化，迫使其與在野黨結合。 7.21 回教穆罕默德誕辰紀念日發生華人與馬來人種族暴動，造成23人死亡。 9.4 因聯邦意圖掌控新加坡政治、經濟權益，新加坡發生第二次種族暴動，造成12人死亡，馬來西亞全境進入非常狀態。 11. 馬來西亞發佈增稅，新加坡表示反對。
196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PAP嘗試推動修改憲法，並選出伊沙薩克爲首任總統。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5.9 PAP召開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組織大會，宣揚「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概念。
	7.25 東姑阿都拉曼在倫敦決定新加坡必須退出馬來西亞聯邦。
	8.3 馬來西亞參眾兩院決議新加坡脫離聯邦。
	8.9 因巫統不廢除以種族為重心的政治形態，新加坡宣布退出馬來西亞聯邦。
	8.10 英國、紐西蘭、澳洲及日本政府宣布承認新加坡為獨立國。
	9.21 新加坡加入聯合國。
	10.15 新加坡宣布加入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
	12.22 新加坡改國號為「新加坡共和國（Republic of Singapore）」。
1966年	* 實施第二次工業開發五年計畫。
	6.25 菲律賓正式承認新加坡。
	8.3 新加坡成為IMF和世界銀行的第104位成員。
	10.10 親中國之社會黨利用「美國侵略」為藉口，與學生進行反政府示威運動。
	10.25 新加坡與日本就二次大戰期間之「血債問題」獲得解決。
1967年	3.13 新加坡政府宣布禁止基礎產業罷工。
	6.12 正式發行新加坡幣。
	8.8 新加坡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
	9.21 日本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簽訂血債協定。
	9.7 新加坡與印尼恢復正常邦交。
1968年	1.16 英國宣布將於1971.3.31前撤退蘇伊士運河以東所有駐軍，其中包括駐新加坡英軍。
	4.13 PAP參加獨立後第一次大選，奪得全部58個議席，總得票率為84.43%。
	6.8 新加坡宣布與蘇聯建交。
	8. 為因應政治上的危機，新國會成立後通過「就業法」（Employment Act）、「工業關係法」（Industrial Relations Act）、與「勞資關係調整法」，通稱「反經濟衰退計劃」。
	8. 裕廊地區創設國家營運局及貿易公司。
1969年	2. 首任蘇聯大使到任；新加坡發表與馬來西亞建立部分共同市場構想。
	5.31 馬來人與華人發生嚴重衝突；爆發「中國銀行信用狀事件」。
	5. 新加坡限制國內貿易公司與共產圈貿易。
	6. 新加坡自以色列購進戰車。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8. 臺灣貿易代表處成立。 9. 裕廊地區設置兩個自由貿易區。 10. 制訂「住宅統一管理法」；新加坡宣布與以色列建交。 12.22 新加坡政府廢除陪審員制度。
1970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新加坡強化徵兵制；放寬馬來西亞居民移入限制。 2. 放寬土地管制。 3. 「統一國民黨」(UNP) 成立。 3. 政府改革行政組織，成立「總統評議會」。 8. 裕廊發電廠開始運作。 11. 雪爾斯 (Benjamin H. Shearse) 總統就職。 12. 通過「公制法」、「護照法」及「海水污染防制法」。
1971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新加坡與日本簽訂「防止雙重課稅協定」。 5.2 南洋商報主管遭逮捕，5.29前鋒報停刊。 9. 港灣局向亞洲開發銀行貸款810萬美元。 10. 蘇聯貿易代表團來訪，同時舉辦商展。 11. 與英澳紐馬簽訂五國防禦措施。 12. 英國軍隊完成自新加坡撤退，英軍駐新加坡遠東司令部宣布解散，僅留一營兵力駐紮。
197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 勞工部宣布設立「勞工評議會」(NWC)。 3. 東協外長會議召開。 3.22 新加坡李光耀總理首度訪問馬來西亞。 8.23 新加坡大選，PAP奪得全部65個議席，總得票率為 69.2%。 10. 國營新加坡航空 (SIA) 啓航。 10.29 修憲案通過，若欲與他國合併或成爲聯邦，須國民三分之二同意。 11. 新加坡發表控制人口新措施。
197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南洋商報社長遭逮捕。 3. 新加坡政府發表獎勵提升工業技術水準及引進外資新政策。 6.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成立。 7.28 李光耀總理強調新民族精神。 9.10 新政府宣布只有新加坡公民才能無限制取得不動產。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7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英軍完全撤出新加坡。 1.10. 日本田中首相訪問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起示威抗議運動。 12.16 新加坡學生回應吉隆坡學運。
197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教育部長負責重組南洋大學，改用英文為教學媒介，並與新加坡大學合班上課。 1. 政府依譏謗名譽罪名逮捕人民戰線總書記。 2. 新加坡學生聯盟主席陳旺彪（Tan Wan Piow）因批評政府被判刑1年。 3. 外交部長第一次前往中國進行友好訪問。 5. 8,000名越南難民抵達新加坡。 7. 為改善環境，向世銀貸款2,500萬美元。 9. 英海軍完全撤離新加坡。 12. 新加坡實施軍警聯合維持國內治安演習。
197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 李光耀總理首次出席東協高峰會議。 3. 樟宜國際機場（Changi Airport）動工。 4.10 李光耀訪問中國，並與中國領導人會談。 6. 新加坡以自來水水壩計畫向亞銀與美國銀行聯合貸款2,860萬美元。 6.16 新加坡政府逮捕自由人報總編輯及副總編輯。 11. 新加坡發表地下鐵興建計畫。 12.23 新加坡大選，PAP奪得全部69個議席，總得票率為72.4%。
1977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7. 紐西蘭宣布陸續撤出全部駐新加坡軍隊。 8. 新加坡石油化學公司成立。 10. 4名越南人劫持一架國內班機飛往新加坡，劫機犯其後遭逮捕，並送往監獄。
197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 李光耀宣布南洋大學實施英語教學。 2. 新加坡完成對美紡織品談判，雙方並締結新協定。 6. 新加坡全面廢止外匯管制；IMF再度認定新加坡是開發中國家。 11.4 中國鄧小平副總理正式訪問新加坡。 12. 制訂外籍勞工的新勞動許可證制度。
197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 新加坡新設「商工部」。 4. 以色列外長來訪。 4. 吳作棟（Goh Chok Tong）成為最年輕閣員。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5. 林奇翁 (Lim Chee Onn) 被選為全國職工總會 (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總書記。
	6.1 新加坡推展「禮貌和生產力運動」(Courtesy and Productivity Campaign)。
	6. 全國職工總會主張進行「第二次產業革命」。
	11. 新加坡政府提倡「華人講華語運動」。
	12. 新加坡與東協及澳洲簽署航運協定。
	12. 新政府取消新民報 (中文報) 的出版執照。
1980年	2. 新加坡實施第二次交通量管制措施。
	5. 新加坡展開人口普查工作。
	10. 紐澳馬新四國舉行聯合防空演習。
	12.23 新加坡大選，PAP奪得全部75個議席，總得票率為75.55%。
1981年	3.17 李光耀發表「注視東方 (Look East)」演講，主張「學習日本」。
	5.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成立。
	6. 包含新加坡等五個防衛協定國在南中國海舉行聯合海上演習；發給外籍勞工的勞動許可證放寬為兩年。
	7. 全國運輸工會 (NTWU) 成立，為特定產業組織工會的先聲；樟宜國際機場首度啓用。
	10.23 納爾 (C. Devan Nair) 被議會選為第三任國家總統。
	10.31 安順 (Anson) 進行補選，工黨 (Worker's Party) 傑雅瑞南 (J. B. Jeyaretnam) 當選，為1963年以來在野黨首次取得議席。
1982年	* 政府在學校開辦宗教課程，強調儒家倫理。
	4.20 新加坡政府重整新聞界。
	11. 發表「整備民間防衛三年計畫」及「第一次全國生產力月」。
1983年	5. 擴大守望相助制度。
	6. 開始實施師法日本的派出所制度；與日本簽訂生產力提升計畫技術合作協定。
	11. 全面修改「民間防衛法」。
1984年	3. 美國宣布新加坡排除適用普遍性優惠關稅制度，新加坡對此與美方展開談判。
	4. 與馬來西亞召開國界劃定會議。
	12.4 國會舉行大選，PAP獲得77席。工黨傑雅瑞南與民主黨張希洞 (Chiang See Tong) 取得在野黨僅有的二席，但已震驚PA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2.10 政府控告傑雅瑞南選舉舞弊，但法院判決無罪開釋，政府上訴。
	12.31 李光耀宣布組成新內閣。
1985年	* 全球不景氣，新加坡首次遭遇嚴負成長。
	1.2 改組內閣以準備世代交替，12名部長中只有3位為舊世代，並設置經濟委員會檢討負成長和開發計劃。
	2.28 納爾總統辭職。8.28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提名前新聞記者黃金輝（Wee Kim Wee）為新總統。
	9. 李光耀總理訪台。
	10.8 李光耀總理訪美。
	12. 財政部長暗示公營企業應轉讓民營。
	12.2 新加坡宣布停止股市交易，12.5恢復。
1986年	1.16 李光耀總理訪問緬甸。
	4. 美國通過撤銷部分對新加坡的優惠關稅。
	6. 吳作棟副總理發表言論，駁斥有關批評政府政策自由的信函。
	8.23 李光耀總理訪問馬來西亞。
	9 高院判決傑雅瑞南入獄1個月，罰星幣5000元，同時喪失國會議員和律師資格。
	10.14 新加坡李光耀總理訪問日本。
	11.18 以色列總統訪問新加坡，引起大馬責難。
	11.28 「馬來西亞人民行動委員會柔佛分會」在新山舉行反新加坡示威活動。
	12 新加坡與大馬進行「水資源協定」的交涉。
1987年	1. 政府經濟發展局（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發佈「經濟開發援助計畫」。
	5. 因密謀顛覆政府，新加坡大量逮捕基督徒。
	12.30 新加坡解散國內亞洲基督徒組織（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1988年	* 國會通過「小組議員法案（Team Members of Parliament Act）」以及「集體選區法案（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 Bill）」。
	1. 新加坡政府抗議美國排除亞洲新興國家適用普遍性優惠關稅之決定。
	1.26 新加坡與印尼達成協議，新加坡將可使用印尼機場進行空軍訓練。
	2.10 新加坡與澳洲簽訂新軍事協定，以使新加坡軍隊在澳洲接受訓練。
	5.7 新加坡政府以干涉內政為由，要求美國撤換其駐新國外交人員。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6.27 李光耀總理訪問吉隆坡會晤馬哈迪首相，雙方就天然氣、飲用水、渡輪服務與第二道聯繫橋梁達成協議。
	9.3 新加坡大選，PAP大勝。
	9.14 李光耀訪問中國。
	10 傑雅瑞南上訴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案宣判，指其為未觸犯之罪蒙羞，應恢復律師資格。
1989年	* 紐西蘭撤出駐新加坡的步兵營（共740人）和直升機單位。
	1.16 新加坡修正「內部安全法」(Interior Security Act)，規定內部安全案件不得上訴英國樞密院。
	1.25 國會三讀通過內部安全法及憲法修正案，確定內閣在內部安全問題上擁有絕對權力。
	3 新加坡國會立法禁止遭取消律師資格者上訴英國樞密院。
	3.23 新加坡與印尼簽訂陸軍協定，規定每年至少舉行兩次聯合演習，且可使用印尼場地訓練。
	5. 臺灣李登輝總統到訪。
	7. 新政府宣布給予2萬5千戶香港家庭永住權。
	8. 新加坡發表「宗教白皮書」。
	9. 發表「赤道第一都市發展構想」。
	12 政府加強實施「反毒品法」。
1990年	1.4 李光耀總理訪問臺灣。
	1. 新加坡修憲，通過官派議員 (Nomina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制度，另外設立6席非選區 (nonconstituency) 國會議員，由至少獲得選區內10% 選票的6位高票落選人擔任。
	4. 新加坡與臺灣簽訂投資保障協定及貿易協定。
	7.30 中國與新加坡就建交問題進行談判。
	8.10 中國李鵬總理訪問新加坡。
	8.13 中國要求新加坡今後不得在台進行軍隊操練。
	10.3 新加坡宣布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11.13 新加坡與美國簽署軍事協定，同意美國海、空軍擴大使用新加坡軍事設施，維持美軍駐留東南亞。
	11.28 吳作棟接任總理，李光耀轉為擔任高級部長 (senior minister)。
1991年	1.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將新加坡列為已開發國家。
	1.3 國會通過修憲案，將虛位總統改為具實權之總統。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5 新加坡政府發表「形塑國民共同價值觀白皮書」(White Paper on Shared Value)。
	1.16 政府解除1950年代共產黨領導人的入境禁令
	1.17 新加坡政府表示支援多國部隊在波斯灣的空襲行動。
1991年	1.20 新加坡政府派遣醫療部隊前往波斯灣。
	2 為阻止傑雅瑞南參選，政府宣布提前二年(於1991.8)舉行大選。
	2.6 新加坡與印尼政府雙方同意耗資63億新元開發巴潭島。
	2.19 湯瑪斯(Thomson Consumer Electronics)公司進駐巴潭島，為該開發計劃第一宗成功案件。
	3.9 新加坡開始配備美製戰鬥機。
	3.22 在野的國民團結黨(National Solidarity Party)，提議採行「二人議員制度」。
	5.9 通過國會選舉法修正案，將候選人的最高選舉費用，由6,000新幣提高為12,000新幣。
	6.19 新加坡政府成立「華語檢討委員會」，檢討華語教育。
	7. 席愛美(Seet Ai Mee)成為首位女性閣員。
	7.1 成立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該校前身為南洋大學。
	7.29 國會通過「總統選舉法(Presidential Elections Act)」，規定總統由民選產生。
	8.31 國會大選，人民行動黨當選77席，在野黨得4席，PAP總得票率為61%。
	10.11 與美簽署「貿易與投資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1992年	3. 第四次東協高峰會議召開。
	9.28 新加坡李光耀高級部長訪問中國。
	11. 李光耀辭去PAP秘書長職位。
	12. PAP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吳作棟擔任秘書長。
1993年	6. 張希洞辭去民主黨秘書長職務。
	8.19 新加坡第一屆民選總統開始競選活動，兩位候選人為王鼎昌與蔡錦耀。
	8.28 新加坡舉行首次民選總統選舉，前副總理、全國職工總會秘書長王鼎昌當選。
	9.1 王鼎昌就任總統職位。
	12.21 內閣改組，更動外交、內政等部長。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94年	1.1	宣布撤銷406項產品關稅，使得無關稅進口專案達到5,736項，占全部進口專案96%。
	1.23	吳作棟總理前往印度進行投資外交。
	2.26	吳作棟總理訪問中國會見李鵬總理，雙方並就共同開發蘇州工業園區簽署協議書。
	3.3	地方法院裁定18歲美國青年因惡作劇行為判處拘禁四個月，並鞭刑六下，罰金3,500元新幣，引發美新國際問題。
	3.22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簽署連接兩國橋樑議定書，該計劃建設費用共四億新幣。
	6.	為增進「族長政治」機制，立法規定成年人負有扶養父母的法律責任，未婚母親無住宅津貼等。
	6.19	新加坡政府為促進國人重視家庭倫理價值，決定創設「家庭價值振興基金 (Family Values Promotion Fund)」。
	7.5	新加坡民主黨內的非主流派人士決定脫黨，於11.21另組「新加坡人民黨 (Singapore People's Party)」。
	8.28	日本村山首相訪問新加坡，並於日軍犧牲者慰靈碑前獻花致意。
	9.29	吳作棟總理與蘇哈托總統簽署「觀光合作協定」與「航空服務協定」。
	10.13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政府歷經十四年交涉談判，終於對柔佛海峽雙方國境達成協議。
	11.9	中國江澤民主席訪問新加坡。
	12.17	新加坡、印尼與馬來西亞簽署「成長三角計劃備忘錄」。
	12.28	吳作棟總理表示將逐步放鬆政治管制。
1995年	1.11	新加坡政府向WTO控訴大馬實施石化製品的輸入限制，7.19 兩國達成和解。
	1.17	新加坡與大馬同意召開「國防論壇」(Defense Forum)，簽署「軍火產業合作協定 (Agreement on Defense Industry Cooperation)」。
	5.11	吳作棟總理訪問中國會見李鵬總理，雙方就南沙問題進行協商。
	6.1	重開停擺二十年的駐柬埔寨新加坡大使館。
	7.	因雷申 (Nick Leeson) 引發霸菱 (Baring's) 銀行破產事件，國會修憲限制總統財政權限。
	7.10	召開「新加坡經濟論壇 (Singapore Economic Forum)」。
	8.7	布蘭加 (Pedra Branca) 島領土爭議解決，新馬決定簽署「永久確定海域境界定協定 (Delimit Precisely the Territorial Waters Boundary)」。
	9.1	新加坡政府成立「陸上運輸局 (Land Transport Board)」。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0.4 李顯龍副總理訪問中國，視察蘇州工業園區。
	10.20 民主黨與新加坡統一馬來機構（PKMS）協議於次年大選中共同合作。
	10.24 吳作棟總理於聯合國大會提議設置「新美商業協議會」（Singapore-USA Business Council）。
	11.9 吳作棟總理出席於紐西蘭舉行的「大英國協高峰會議」。
	12.13 吳作棟總理參加於曼谷召開的東協高峰會議，新加坡對於AFTA構想表示支援。
	12.15 吳作棟總理會見馬來西亞總理與越南總理。
1996年	1.2 發表「陸上運輸遠景」（A World Class Land Transport System）白皮書。
	1.11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國防部雙方同意進行陸軍武器現代化合作事宜。
	4.11 新加坡國立大學美國學者林格（Christopher Lingle），因謾罵李光耀被科處罰金。
	5.23 吳作棟總理表示今後官員取得不動產必須向總理報告。
	6.7 李光耀表示若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皆採「能力主義」，則雙方可能再度統一。
	6.9 吳作棟總理表示從未考慮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再度統一的可能性。
	8.30 馬哈迪表示，新加坡並非真正希望新馬統一，而僅是以此做為管制國內社會的手段。
	11.17 人民行動黨召開第二十四屆黨大會，會中發表選舉政策綱領「新加坡廿一」，並選出本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1.29 吳作棟總理訪問印尼，出席「第一屆ASEAN非正式元首會議」。
	12. 新加坡主辦WTO第一屆大會。
1997年	1.2 新加坡舉行國會大選，PAP獲得大部分席位（83個議席中有47席不必投票即由PAP取得），吳作棟連任總理。
	8. 東南亞金融風暴造成新加坡經濟萎縮，金融管理局主動改組，由李顯龍親自掌舵。
	12.19 新加坡勝安航空一架班機於印尼蘇門達臘上空失事，機上乘客全部罹難。
1998年	1.19 新加坡管理學院（SIM）宣布將升格為新加坡管理大學（SIU），成為第一所私立大學。
	2.27 政府向國會提出增加 14.6% 歲出的預算案，以刺激景氣。
	4.1 勞工部改人力資源部（Ministry of Manpower），以配合發展知識產業。
	4.20 吳作棟總理發表總額達 50 億美元的「對印尼相互貿易金融保證計畫」。
	5.8 印尼棉蘭發生排華暴動，華人避難新加坡。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7.24 政府合併開發銀行 (DBS) 與郵貯銀行 (POSB), 總資金 93 億新幣, 為世界第 65 大銀行。
	8.1 因國際鐵道車站移轉問題, 新馬關係惡化。馬來西亞拒絕參加 8.27 五國聯合軍事演習。
	8.13 貨幣廳重申新幣非國際化政策不變。
	9.16 李光耀回憶錄出版, 馬哈迪批評其歪曲事實。
	9.18 因與新加坡交惡, 馬國撤銷新加坡空軍通過領空特別許可, 9.21 更禁止其海軍以任何理由進入馬國領海。
	11.6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訪美, 簽署美軍使用新加坡基地協定。
	12.12 新加坡參加 ASEAN 高峰會, 對柬埔寨加入問題持慎重態度。
1999 年	1.20 新加坡外長在國會表示與馬國關係不易修復。
	1.24 人民行動黨舉行幹部會議, 選出新中央委員。
	2.6 印尼總統批評新加坡人種歧視。
	3.5 與印度海軍聯合演習。
	5.17 發表溫和的金融改革方案, 開放外國人投資金融市場。
	6.3 內閣改組。
	7.12 馬國外長來訪, 表示只要解決用水問題, 兩國關係即能改善。
	8.18 吳作棟總理反對王鼎昌連任總統。9.1 納丹 (S. R. Nathan) 就任第六任總統。
	10.13 吳作棟總理在國會表示擔憂人才流出國外和出生率低落。
	10.31 李顯龍副總理表示短期內對美關係難以改善。
	11.25 吳作棟總理表示下次選舉後將退休, 並宣布繼承人為李顯龍。
2000 年	1.13 吳作棟總理訪問雅加達, 發表 12 億新幣的投資印尼獎勵政策。
	2.21 國會通過國防科學技術廳 (DSTA) 設置法案。
	3.21 新加坡宣稱將實施中央政府權限下放的分權計畫。
	4.1 通訊市場完全自由化。
	4.9 吳作棟總理訪問中國, 4.11 與江澤民會談發表共同聲明。
	5.27 吳作棟總理反對公務員周休二日制。
	6.26 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陳慶炎 (Tony Tan Keng Yam) 訪台, 隨即撤離星光部隊。
	8.14 李光耀 10 年來首次訪問馬來西亞, 翌日與馬哈迪會談。
	9.23 李光耀訪台, 教育部長卓奇印 (Teo Chee Hean) 同行。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0.9	國會通過義務教育法，1996 年以後出生者，義務教育至小學 6 年級為止。
10.21	吳作棟總理赴漢城參加亞歐會議（ASEM），並與印尼總統會談。
10.31	新航客機在臺灣桃園機場起飛失敗燒毀。
11.24	吳作棟總理提議設置東亞自由貿易區和東亞高峰會。
12.15	經濟開發廳（EDB）公佈，臺灣聯華電子投資新加坡 36 億美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辦公室報導

壹、九十二年度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碩士論文獎助計畫

本年度提出申請者有二十六名，初審通過十九名，各送二位專家評審，並要求審查人考量以到東南亞或東北亞從事田野工作者排列優先順序。經審酌各審查人之評審結果及考量亞太專題中心未來之發展性，並依其優先順序給予不同之獎助待遇，茲將獲獎名單臚列如下：

- 一、續培德（淡大東南亞所）：印尼亞齊地區穆斯林社群認同之研究－經院教育、伊斯蘭與信仰生活之脈動
- 二、陳珣勳（台大人類所）：流傳千年的饗宴－日本「花見」(Hanami)之研究
- 三、陳志毅（政大中山所）：泰國學生運動發展之研究（1973-1992）
- 四、李拓梓（台大國發所）：香港社會的政治變遷與認同政治轉移（1968-2003）
- 五、莊韻慧（淡大東南亞所）：泰國鄉村女性遷移與城市勞動參與－以曼谷台商 CEI 工廠為例
- 六、黃光世（暨大東南亞所）：新興政黨的執政之路－泰國「泰愛泰黨」(Thai Rak Thai) 的發展策略研究
- 七、陳育章（暨大東南亞所）：泰國勞工輸出仲介網絡之研究
- 八、蘇文平（暨大東南亞所）：冷戰後印尼對中(共)政策之政經分析（1990-2002）
- 九、黃慧敏（政大民族所）：峇峇文學的研究
- 十、陳雅莉（暨大東南亞所）：後蘇哈托時期雅加達地區華裔印尼人教育選擇之研究－「在地化」、「原鄉化」、「國際化」

本獎項的審查人包括王宏仁、朱雲漢、吳玉山、林美容、章英華、莊英章、黃登興、黃智慧、張翰璧、蔣斌、蕭全政（依筆劃順序）等教授，感謝他們的協助，謹此致意。

貳、最新出版品

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

- No.62 Rosey Wang Ma: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 No.63 黃蘭翔：麻六甲（滿刺加）王國的創立與東南亞都市雛形之出現
- No.64 Garth N. Jones: Indonesia Raya: Istana and Umat in an Obscuring Imperial Order

參、午餐研討會

一、九十二年度午餐研討會系列（二）：

時間：92年7月25日（週五）

地點：社會所新館 2319 會議室

主講人：孔復禮教授（Prof. Philip A. Kuhn, 哈佛大學教授兼東亞語文暨文明系主任）

主題：華人的社會經驗中一些適應於移民活動的特點

二、九十二年度午餐研討會系列（三）：

時間：92年9月15日（週一）

地點：社會所新館 2319 會議室

主講人：Prof. Robert Barnes (Asian Studies Centr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主題：The Communist Uprising in East Indonesia in 1950s and Its Consequences

三、九十二年度特別專題演講系列（一）：

時間：92年9月29日（週一）

地點：社會所新館 2319 會議室

主講人：石井米雄教授（Prof. Yoneo Ishii，
原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所
長，現為日本神田外語大學校長）

主題：The Kyoto Experience in Establishing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Japan

八、12月9日（週二），舉辦九十二年度午
餐研討會系列（七）：Dr. David W. F.
Huang & Dr. Cédric Dupont / On
Institution Building of APEC and EFTA。

九、12月19日（週五）—12月20日（週六），
舉辦「亞太首都城市：首要和多元」國
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Capital Cities in Asia-Pacific:
Primacy and Diversity”）。

肆、活動預告

今年 10~12 月將舉辦的活動如次：

- 一、10月13日（週一），舉辦九十二年度午
餐研討會系列（四）：麥留芳／馬來世界
集體記憶的機制：演義與宗教書院。
- 二、10月24日（週五），舉辦九十二年度午
餐研討會系列（五）：王宏仁、藍佩嘉／
越南、印尼的勞務輸出仲介田野調查報
告。
- 三、10月31日（週五）—11月1日（週六），
舉辦「亞太中產階級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rioritizing the Middle Class Research in
Asia-Pacific”），邀美、日、韓、香港、馬
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學者來台與會。
- 四、11月12日（週三），舉辦「馬來世界的
宗教與文化：衝突？融合？」研討會
（Symposium on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the Malay World”）。
- 六、11月26日（週三），舉辦九十二年度午
餐研討會系列（六）：Prof. Kenneth Hall
／ Regional Identities and Islamic
Conversions: Islamic Legitim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 1300-1600。
- 七、12月5日（週五）—12月6日（週六），
與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等合辦「時代變局
與海外華人的族國認同」國際研討會。



7月23日・「台灣與南韓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鞏固」國際研討會

前排左起：王甫昌教授（本院社會所副研究員）、范雲教授（本院社會所助研究員）、蕭新煌執行長、朴允哲教授、曹喜昫教授、李允卿小姐

後排左起：艾琳達小姐（本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何明修教授（南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劉華真小姐（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候選人）、張茂桂教授（本院社會所研究員）、李南周教授



7月25日・九十二年度午餐研討會系列（二）

前排左起：陳永發教授（本院近史所研究員兼所長）、孔復禮教授、蕭新煌執行長



9月15日・九十二年度午餐研討會系列(三)
左起: Prof. Robert Barnes, 蕭新煌執行長



9月29日・九十二年度特別專題演講系列(一)
左起: 石井米雄教授、蕭新煌執行長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rioritizing the Middle Class Research in Asia-Pacific

Oct.31- Nov.1 2003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Venue: CAPAS Conference Room 2319, Institute of Ethnology Bldg., Academia Sinica

Tentative Program

Oct. 31 (Friday)

09:00~09:30 Registration

09:30~09:40 Welcome: *H. H. Michael Hsiao*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09:40~11:10 Session I: Overall

Chair: *H. H. Michael Hsiao*

Presenters: *Hagen Koo* (Dept. of Sociology, Univ. of Hawaii, USA)
The Asian Middle Classes: New Research Agend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lvin So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Middle Class Research in Asia-Pacific: A Critical Review

11:10~11:25 Coffee Break

11:25~12:30 Session II: Japan

Chair: *Abdul Raham Hj Embong*

(Institute of Malay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IKMAS,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Presenters: *Shigeto Sonoda* (Dept. of Sociology, Chuo University, Japan)

Does Academic Career make any sens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levant Structure of Credentialism between Japan and urban China

Yoshimichi Sato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Letters, Tohoku Univ.,
Japan)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SSM Project:
Searching for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Long-standing Topic

Response: *Ming-Chang Tsai* (Dep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

12:30~14:00 Lunch

- 14:00~15:30 Session III: Hong Kong and Korea
Chair: *Cynthia Bautista*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 Philosophy, Univ. of the Philippines)
Presenters: *Tai-Lok Lui* (Dept. of Sociology, The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Research on the East Asian Middle Class:
Some Hong Kong Reflections
Jonghoe Yang (Dept. of Sociology, Sung Kyun Kwan Univ., Korea)
Korean Middle Class Since 1990: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1997
Response: *Chin-Fen Chang* (Inst.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 15:30~15:45 Coffee Break
- 15:45~17:15 Session IV: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Chair: *Alvin So*
Presenters: *Abdul Rahman Hj Embong*
Malaysian Middle Class Studies: A New Research Agenda
Cynthia Bautista
Exploring the Middle Classes in the Philippin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oward a Research Agenda
Response: *Hongzen Wang*
(Dept. of Marketing, National Chung-Hsin Univ., Taiwan)
- Nov. 1 (Saturday)
- 9:30-10:30 Session V: Taiwan
Chair: *Jonghoe Yang*
Presenter: *Hongzen Wang*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ies and Middle Class in Taiwan
Response: *Yu-Hsia Lu* (Inst.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 10:30-10:45 Coffee Break
- 10:45-12:00 Session VI: Future Research Agenda
Chair: *H. H. Michael Hsiao*
- 12:00~ Lunch

爲準備開會資料，採預先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 月 27 日下午 5:00 止。
敬請本院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同仁，踴躍參加。
地址：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電話：(02) 2782-2191 傳真：(02)2782-2199 email：capas@gate.sinica.edu.tw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網站：http://www.sinica.edu.tw/~capas

「馬來世界的宗教與文化：衝突？融合？」研討會

時間：2003年11月12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第三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議程

9:00~9:30	報到		領取會議資料	
9:30~9:40	致詞		王汎森主任&蕭新煌執行長	
時 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議 題	評論人
9:40~ 11:30 第一場	劉翠溶	蔡源林	從「伊斯蘭」的公共論述看馬來西亞族群疆界的建構	古鴻廷
		蔡維民	蘇門答臘華人基督徒宣教初探	曾慶豹
11:30~ 13:00 午餐				
13:00~ 14:45 第二場	陳祥水	李豐楙	衝突與合作：馬來亞道教的聯合問題	胡其德
		陳美華	馬華的漢傳「移民」佛教：傳入、紮根與流變 (Diaspora of Chinese Buddhism in Malaysia: Imported, Grounded, and Transformed)	張 珣
14:45~ 15:00 茶敘				
15:00~ 16:45 第三場	蔣 斌	蔡宗德	印尼伊斯蘭宗教詩歌——音樂型態與演出環境	林長寬
		邱炫元	印尼華裔穆斯林的歷史發展概況	鄭月裡
16:45~ 17:30 座談討論	王汎森	李豐楙 蔡源林 陳美華	前瞻未來：馬來世界宗教與文化研究的可能與開展	

報名方式：請至本專題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後聯絡本專題中心

地址：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電話：(02) 2782-2191 傳真：(02)2782-2199 email：capas@gate.sinica.edu.tw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網站：<http://www.sinica.edu.tw/~capas>

2003 年 10~12 月
亞太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

十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8	Workshop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in Post-Crisis Thailand	<p>地 點：Singapore 主辦單位：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聯 絡 人：Ms. Karthi 聯絡地址：ISEAS 30 Heng Mui Keng Terrace, Pasir Panjang Singapore - 119614 電 話：+65- 6870-2413 傳 真：+65- 6775-6264 電子郵件：karthi@iseas.edu.sg 相關網址：http://www.iseas.edu.sg/</p>
10-12	Coping with Globalization: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p>地 點：Montreal, Quebec, Canada 主辦單位：East Asia Council and Southeast Asia Council, University of Montreal 聯絡地址：CCASLS SB-115 c/o Concordia University 1455 de Maisonneuve O. Montréal, Québec, Canada H3G 1M8 電 話：+1-514- 848-2280 傳 真：+1-514- 848-4514 電子郵件：casa@concordia.ca 相關網址：http://canadianasianstudies.concordia.ca/</p>
17-19	ASEASUK 2003 (21st ASEASUK Conference)	<p>地 點：Leeds, United Kingdom 主辦單位：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K) 聯 絡 人：Prof. Duncan McCargo 聯絡地址：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K) ASEASUK 2003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eds LS2 9JT United Kingdom 電 話：+44-113-343-6865 傳 真：+44-113-343-4400 電子郵件：d.j.mccargo@leeds.ac.uk 相關網址：http://web.soas.ac.uk/aseasuk/</p>

十一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2-5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minar on Murukan-Skanda	地點：Kuala Lumpur, Malaysia 聯絡人：Mr. Paramasivam or Mr. Kubiran 聯絡地址：Secretariat Third International Arulmigu Murukan Conference Malaysia 2003 Temple Office, Sri Subramania Swami Temple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電話：+ 60-3-6184-1544 傳真：+ 60-3-6185-4290 電子郵件：thirdmurukanconference2003@yahoo.com 相關網址：http://murugan.org/
21-24	15th New Zealand Asian Studies Socie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ia: Images, Ideas, Identities	地點：Auckland, New Zealand 主辦單位：NZ Asian Studies Society (NZASIA) 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聯絡人：Dr. Xin Chen 聯絡地址：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Private Bag 92019 Auckland, New Zealand 電話：+ 64-9-373-7599ext86936 傳真：+ 64-9-308-2312 電子郵件：x.chen@auckland.ac.nz 相關網址：http://www.nzasia.org.nz/
27-28	Vietnam Update 2003: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Vietnam	地點：Canberra, Australia 主辦單位：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Canberr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聯絡人：Ms Beverley Fraser 聯絡地址：Dep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RSPAS, ANU, Canberra ACT 0200, Australia 電話：+61-2-6125-4790 傳真：+ 61-2-6125-5523 電子郵件：beverley.fraser@anu.edu.au 相關網址：http://rspas.anu.edu.au/polSOC/Vietnam/

27-29	Ethnicity in Multicultural Asia - Theory and Findings	地點：Hong Kong 主辦單位：Sou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聯絡人：Ms Angel Ho 聯絡地址：R6153, Amenities Build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194-2352 傳真：+852-2194-2353 電子郵件：seangel@cityu.edu.hk 相關網址：http://www.cityu.edu.hk/searc/
十二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17-19	Traditions of Knowledge in Southeast Asia	地點：Yangon, Burma 主辦單位：Universities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re Yangon University SEAMEO Regional Centre for History and Tradition 聯絡地址：Traditions of Knowledge Conference Universities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re Amara Hall, Yangon University Campus Yangon 11041, Myanmar 電子郵件：uhrc@uhrc-edu.gov.mm

亞太研究論壇 第二十一期 2003.9

主 編 蕭新煌
編輯顧問 嚴智宏 王宏仁
編 輯 簡心怡 林淑慧
發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地 址 115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電 話 (02) 27822191, 27822195, 26516862
傳 真 (02) 27822199, 26516863
網 址 <http://www.sinica.edu.tw/~capas/>
電子郵件 capas@gate.sinica.edu.tw

亞太研究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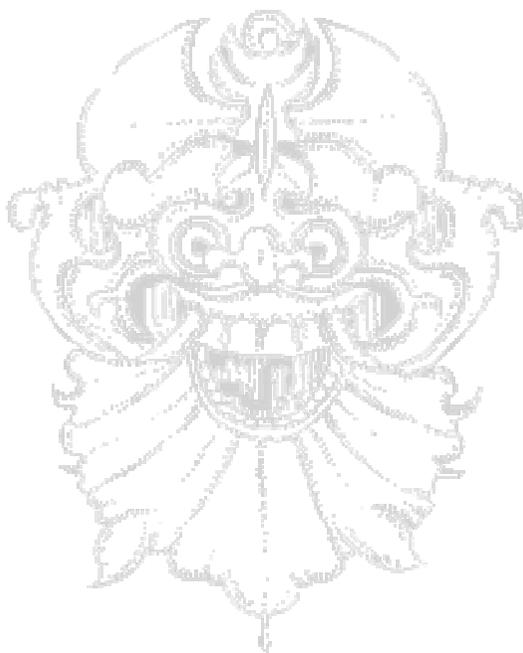
ASIA-PACIFIC FORUM

21

SEPTEMBER 2003

ASIA-PACIFIC FORUM

21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ISSN 1729-2980